

國家圖書館



0024325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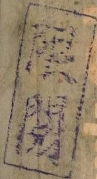
#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

第一輯

第一卷 第四五期合刊

神州國光社出版

中央航空學校  
政治訓練處  
圖書



空軍	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0000107
類號	

# 讀書雜誌

第四五期合刊

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



- 第三版卷頭言.....編者
-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王禮錫
- 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朱新繁
- 在“戰場”上所發見的“行尸走肉”...殿靈峯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偉章
- 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 .....鏡 園
- 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 .....陳邦國
- 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 .....劉夢雲
- 中國農民問題之史的敘述 .....熊得山
- 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 .....朱伯康
- 中國社會史短論 .....王宜昌
- 封建制度論 .....王亞南
- 中國官僚政治的殞落 .....戴行軺
- 對於“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 .....周紹濤
- 編者的話 .....記 者
-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出版以後——  
通信十一則

## 第三版卷頭言

編者

論戰專號第一輯 出版僅十日就已銷盡兩版，  
這使我們如何的得到意外的鼓勵與歡欣！

現在已不是單純的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式的農  
民暴動可以奪取統治權的時代。

同時現在也不是焚書坑儒獨夫專暴式的統治  
可以鎮壓革命的時代。

現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經碰壁，而革命的潛力  
又不可以消泯於暴力的鎮壓之下，正需要正確的  
革命理論指導正確的革命的新途徑的時候。“沒有  
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句名言指出  
了“革命理論”在這革命茫無前途的時候是如何地  
重要！

要探索革命的正確前途，有一個先決問題應

國家圖書館



002432534

當解答：“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麼階段”？這個問題得了解決，正確的革命前途的探索，就不費多大氣力了。

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是對於這問題的各方面的試解。就‘問題重要’這一點，已經夠博得多量的讀者而無疑。

在這一輯中，共計十三篇文章。其中‘立’的也有，‘破’的也有；代表組織的意見也有，書齋中個人探索而得的‘試解’也有。總之，凡一兩年來曾經參加這論爭的無不有，還有幾種沒有發現過的意見可以給讀者在這裏發現。

在過去，這個論爭為幾個‘幫口’所壟斷，自然，某一集團的刊物沒有發表他人意見的義務，於是許多無幫口的‘試解’，只好“讓蟲鼠去批判”。在這一輯中不少的‘讓蟲鼠去批判’的意見公開給讀者去批判。這也許是這一輯在十天內銷行兩版的理由吧？

我們希望這論戰不是無結論的爭辯，所以要求論戰的各方及廣大的讀者對這問題努力試解的誠意。

希望論戰的各方，要以客觀決定主觀，不要以主觀決定客觀，去思考，去求證，去試解，去寫作。

希望讀者要以客觀決定主觀，不要以主觀決定客觀去讀，去了解，去批判。

“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多不同的意見”。(拙著序幕)讀者要接受或反對這許多不同的意見，必得先置身於作者的階級意識中去切實理解其試解的意義，然後跳出其階級意識的牢籠之外，加以純客觀的體認，然後才不虛讀，然後才可得到有價值的批判。當第三版付印之時，謹以此義貢獻於論戰的各方及廣大的讀者。

日本田中忠夫先生等正收此輯提要介紹於彼

邦，還有幾個日本朋友準備全譯以餉其邦人，我們很盼望這個論戰能夠從國內的擴大到國際的。這全在各方面對於革命有熱誠者的幫助。

還有一點附告：最後附錄的通信是本輯出版以後，得到讀者的意見及編者的答覆在讀書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上發表的，爲着讀者的便利，再附刊於此。最後有兩封信是第六期上所沒有的。

一九三一，十一，十二。

還有一點聲明：很抱歉的，因爲編者生活的無秩序，和印刷上的攔礙，以致本誌亦犯了一般雜誌的毛病——脫期，我們在兩三期內務必設法趕上，庶幾對得住讀者。

#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

王禮錫

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現在已經逼着任何階級的學者要求答覆。任何階級的學者爲着要確定或辯護他自己的階級的前途，也非解答這問題不可。

普羅利塔利亞學者固然很早就注意這個問題，自第三國際的盲動政策碰頭以來，對於這個問題更迫切的要求解答。現在四分五裂的各派，正各自提出一個見解在各種公開

的或祕密的刊物上刀鎗相見。就像馬玉夫爲脫離幹部派加入反對派時發表的一封給他們全黨黨員的信就有這樣的話：“我和史大林派中央及其下級執行者所爭論的主要的是如下幾個問題：‘一，中國現在社會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二，經過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的中國革命究竟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可見中國共產黨分裂的原因，主要的就在對於這個問題認識的不同。所以馬玉夫在所提出的七個爭論的問題中，首先便要求對於這個疑問的解答。

中國國民黨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很熱烈的辯爭，在前進與新生命上，很早就發表過陶希聖公孫愈之梅思平諸人的意見。

九月三日至九月七日的申報對於這個問題竟有長篇的時評，或許有人認爲是一個意外的奇蹟。其實這不過表示這問題的嚴重化與普遍化，使布爾喬亞代言的報紙，也感到對於這問題的重要，以爲在這‘根本問題未得解答之先’，其他‘幣制問題，金銀問題，關稅及各種稅收問題’皆如‘不附幹之枝葉，漫無歸宿，而其討論之結果，亦將終歸於蹈空，無補於中國經濟之前途’。並且向中國經濟學社提出了下面的六



個根本問題：

一，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及其前途

二，資本主義之整個性

三，中國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之地位及其關聯

四，中國經濟之變遷與現狀

五，中國經濟之特質

六，中國往何處去

這問題已經成爲如何嚴重與普遍，老邁與遲鈍到申報都已經感到，而且感到得很深刻了！

本來，經濟的結構，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礎的結構，要理解中國一切精神文化的結構，必須澈底的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所以，要理解中國的整個社會，決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礎，然後能把握其整個。

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必須從流動的生成中去理解，而不能專作無機物的靜的分析。從流動中去理解中國經濟的結構，必須從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的演變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闡明其規律性並擷住其特殊性。

爲什麼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要找出中國社會的前途’就是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的前途’

的總問題中，隨便拈出幾個問題來考察。

一，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到來？

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革命？抑是社會主義革命？

三，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否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

.....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就得了解革命的條件是否具備？

要解答第二個問題，就得了解中國現在是封建社會，抑是資本主義社會。

要解答第三個問題，就得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與封建勢力是不是存在。

總之，我們要知道應當如何推動社會，就應當把握社會的動向；要把握社會的動向，就應當理解社會的結構，尤其是其基礎的結構。

這樣，就算很簡單的說明了這問題的重要性。

但這問題的重要性，是怎樣的被暴露呢？

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而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的一個國家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的革命。自一個可怖的事實的礁石，打轉了這不可一世的理

想的潮頭，於是捲起了失望與懷疑的漩渦。‘我們的動向是錯誤了嗎’？這個問題便在一般革命的人們的腦子裏旋轉。‘帝國主義根本不足以阻礙中國的發展，中國根本就沒有封建勢力’。在革命時代噤若寒蟬的學者也就很武斷而有力地發表他的極端的反對的論調。這不能不使一般有思考工具——唯物史觀——的人，沉入於更深刻的思考，從行動動向的懷疑，而考察社會的動向；從社會的動向，而考察社會的本質；從社會的本質，而就流動中考察社會的史的生成。堅認其行動的絕無錯誤者，亦從這步驟與方法去作他們的辯護。

於是，中國社會史的問題，遂逼着各階級各黨派的學者爲着牠以鬥爭的姿態在思想的戰場上出現。

## 二

自帝國主義的外力在中國社會發生作用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兩個激烈的戰爭——人生觀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一個是過去了，一個正在造着鎗林彈雨的混戰。

這兩個論戰的接踵而來，是表示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迅疾。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幾個不同之點，認識這兩個論戰在經

濟的變革上是什麼意義。

一，人生觀論戰，一方是科學，對手方是玄學；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這兩個對手方都不存在，因為到現在科學已成為常識的‘真’，玄學已成為常識的‘幻’。

二，在哲學觀點上，人生觀論戰，一方是極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極端的唯物；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

三，人生觀論戰是以普遍的真理為研究的對象，各有可根據的現成的理論；中國社會史論戰是以中國的實際的動的社會為研究的對象，沒有可抄襲的藍本。

四，在方法上，人生觀論戰一方面是以形式邏輯做武器，（雖然他們也以形式邏輯為不足，但終跳不出形式邏輯的圈子。）一方面是以玄想做武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五四以後，中國資本主義抬頭，資本主義的武士——科學，自然披掛着全副武裝——形式邏輯——出現於思想的戰場，來掃蕩封建的魂魄——玄學鬼。封建的屍體早已僅僅剩下些殘骸，而封建意識便成了無所依歸的野鬼，其脆弱自不禁科學的一擊。所以這

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一方是封建殘餘勢力，一方是新興資本主義勢力。

當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際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恰恰與資本主義國際相對立的國際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中國社會本身的變革亦正在這車輪中旋轉，爲着兩個外力的加入，而這變革也就因而加速。各各爲要辯護自己階級的前途，便對於中國社會加以不同的分析。所以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多不同的意見。

因此，這個問題是由世界革命，中國革命而發生，其論定亦將影響於中國革命乃至於世界革命的前途，而其力量則不但調動廣大的各階級的鬥士，並且調動世界的革命理論家參加這個戰鬥。這是何等偉大的一個論戰！

但是，這個論戰是不像人生觀論戰的容易得着結論的。地球不是方而是圓的，不是日出於扶桑沒於若木，而是地球繞日，是已有科學的證明；輕二養一化合成水，這也是可以當面實證，誰都不會加以懷疑的。但是關於中國經濟的統計是缺乏得很。而所有的統計，又得估量他的可靠的成分；研究近代的東西幾乎要像研究古代的東西一樣去做一番辨偽

的考據工夫。即或是可靠，而對於材料所得到的認識又各自不同。像任曙在他所著的中國經濟研究引了歷年輪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數字上告訴我們輪船多於帆船，並且輪船逐漸加多，帆船逐次減少。他的認識是‘帆船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帆船是封建的表徵，輪船是資本主義的表徵’，然後得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的結論。而嚴靈峯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却對於這個統計得出不同的認識。他很俏皮地說：‘牛是商品呢？耕種工具呢？食品呢？看牠所處的條件如何而定。人是叛徒呢？反動派呢？革命家呢？看他所處的生活條件如何而定。不錯，帆船如果在封建制度下專門為領主們運輸自然品的貢稅，奴隸，兵士，牠當然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但是，在今天，中國的帆船的作用已經不是這樣，牠同樣是運輸資本主義制度下唯一生產對象的商品了。難道今天在帆船上所載的商品，便變為封建時代的領主和農民滿足自己的生產物嗎？……在目前中國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把輪船和帆船的載量來比較，並不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倒是把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罷了。……其實，應該用作表示資本主義勢力



向上發展的趨勢，和生產集中的趨勢’。這是這論戰不容得着結論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歷史是大不容易明瞭，就歷史的開始已經把握不住端倪，有以為和歐洲的情形一樣，有以為‘與水鬥爭’應當寫在中國歷史的第一頁。其發展也很特異，長期間的停滯，不能依着歷史的律規發展到工業資本的階段。而這‘長期間’是封建時期？或者是商業資本時期？這‘停滯’，是為什麼原因？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藉外力走上工業資本的階段，換句話說，中國是不是自己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發展？這些都是現在爭論着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對於這奇異的國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對於社會的形式，他特別舉出一個‘東方式’的名詞。‘東方式’這個謎的提示，現在正迷亂着多少人們。

此外還有許多麻煩：像歷史的浩繁與蕪雜，現在經濟的多層，不容易找出其領導的生產力等等，都是阻礙着這問題不容易得到結論的原因。

### 三

像這樣嚴重，繁雜的問題，一面應當從鬥爭中鼓動思想



界的研究熱，一面應作有組織的合作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效率。在這個大問題之下，分爲若干問題，每人或每組對於其中的一個問題或幾個問題負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審查，以及對於這些材料的組織與問題的試解的責任，然後由大家加以細密的討論。這樣才可以免除‘流於空疏’的毛病。這樣思想研究的合作組織，到處可以有，尤其在學校裏面最方便於這樣的組織。

從前梁任公述他自己讀書的經驗，‘爲著作而讀書，則分外感到興趣’。爲究研問題而讀書，其興趣自然又更甚於爲著作而讀書。若爲着要解決個人行動的方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社會的動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世界的動向問題，那會更如何的迫切地緊張地實際地去讀書！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發展的研究是解決個人，全社會，全世界的動向的問題，像日暮途窮迷惘於深山大澤中的時候，對於問路是如何地迫切啊！在整個問題中得到一部分的光明，應當比天文家發現一顆星球還能獲得更高的歡欣。我們可以預料着將有一個更熱烈的研究空氣會爲這個論戰所誘發。

現在爲着研究的便利起見，有系統的爲這個研究的對象提出許多問題，也許可爲研究這問題者的一個幫助吧！

一、歷史上的幾個大關鍵：

1. 原始共產社會在歷史上的根據。

從史的常識來證明，中國歷史的第一頁，應當為原始共產制所佔據，但幾千年前是否曾遺留這樣的事實下來給我們有憑有據的寫在歷史上呢？郭沫若以為有很多史料：

“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者血族羣婚的母系社會”（古代社會史研究第十頁）

‘二嫂使治朕棲’（孟子）‘眩弟並淫’（天問）明明表示‘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同上）

“我們在堯典中看那些‘四岳’‘十二牧’，……不是一些各姓的酋長軍長在開氏族會議，在推選新的酋長或軍長的嗎？”

.....

這些他都拿來作原始共產制度的證明，但對於這些材料的來源，一些也不加以考證。‘這些材料是靠得住的嗎’？解答了這個問題，才能夠引用而無弊。對於無史時代的史的敘述，自然只能根據傳說，而不能根據真的史實，不過就是傳

說亦必需證明其為傳說，因為還有‘托古改制’的故意造作史實，這樣的材料是還不及傳說之可靠。像關於舜聚堯二女的事，如果是民間的傳說，自然純粹民間文學的詩經應當有不少的可尋之跡。但是，一點也沒有。堯舜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來作史前的根據，那未免太孟浪了。

他並且以為“商代的社會必然還是一個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而其根據是從甲骨文中看出，其卜辭中用牲之數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的耕器還顯然是蜃器或者石器，所以農業在當時很幼稚的。

商代的社會是原始共產社會呢？是封建社會的初期呢？這也是需要加以詳細的研究的，因為這是中國有史之始。

## 2. 中國的封建制度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開始崩潰？

郭沫若歷舉尚書中對殷民的賤稱，和左氏定四年傳：‘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門氏尾門氏。與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琦氏樊氏饒氏終葵氏’以證明周以殷為奴，推定周代是奴隸社會。而以秦始皇為‘在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的光勳’。直到最近百年內帝國主義

在中國發生作用，封建經濟才分解。

却同時陶希聖以及其他許多人，則承認周代的大封同姓和井田制度是封建的最盛時代，而春秋時封建制度便開始分解。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毅然決然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社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

對於中國同樣史實的考察生出這樣極端不同的見解，我們贊同那個見解，或者都不贊同？

歷史的史實是勝於雄辯的。周代的史實使我們知道，無論從土地制度看，或是從統治的形式看，毫無疑義是封建的黃金時代！秦代焚書坑儒，建立法治的專制統一的帝國，廢封建為郡縣，集中富豪於都市，這都明白的證明是商業資本的代表者。秦始皇的真父呂不韋就是用經商的方法把天下買來的。漢朝的大封諸侯，重農賤商等等史實，顯明是秦朝商業資本政權的反動，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晉南渡以後，南方經濟漸次開發，到六朝時代，南朝的商業資本已占經濟的領導地位，這勢力漸次的侵入到北方，隋代開發運河，商業資本遂得到統一的統治。在歷史上展開這些史實，似乎是不容易加以否認的。但在這裏主要的是提出問題，所以用不

着多量的引證來證明自己的意見。

### 3. 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在共產黨的幹部派的理論是根本否認中國社會史上有商業資本主義的一個時期（前資本主義時期）。史實所詔示於我們的確是這樣呢？或者要辯護他們的行動然後造作這樣的理論呢？

商業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作用也是很可研究的，牠在社會史上是不是可以發生領導作用？牠是否可以使社會變質？牠和土地資本結合是會發生怎樣的作用？牠在中國社會史上若沒有其他阻力是不是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達到工業資本的階段？這都是需要費力研究的問題。

不過我們研究商業資本的問題，首先要明瞭商業資本的性質，牠的性質不是建立在生產工具的變更，而是在生產關係的變更。這就是說，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的方法依然是和封建時代相差不多，蒸汽還未發明。其與封建經濟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封建生產的目的是在自給，商業資本是為商品而生產’。所以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僅僅是封建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橋梁。這橋梁時代何以在中國會這樣長？這却另外是一個問題。

4. 什麼原因使中國不能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

拉狄克把這個原因歸之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郭沫若歸之於沒有發現蒸汽機。此外還有各種的歸咎。

我以為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固然是一個原因，但為什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呢？這原因是為中國在地理上是便利於統一，就是割據也是各以希求統一的目的去割據，這就是說，中國地理上不能形成幾個對立的獨立國家，所以競爭着向海外發展不是十分必要的。

又中國經過幾度低級文化民族的侵入，將商業資本主義所建立的文明踏得粉碎，雖然低族文化的民族始終會被高級文化民族所同化，但在經濟上又得走過一度回頭的路。每次恰好有發展到工業資本的希望，又給遊牧民族打回頭了。

因為以上兩個原因，商業資本的累積便無其他出路，只是與土地資本結合，造成農村經濟的崩潰，造成間歇期的農民暴動。我們相信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是能按照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外力的阻礙。決不會像郭沫若所說中國民族是天然的不能‘發明蒸汽



機'，沒有發明蒸汽機是各種外力阻礙的'果'而不是'因'。

關於這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應當加詳慎的研究，上舉的兩個理由不過是隨意拈出，作為關於這問題的研究的一點意見而已。

此外像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幾個農民暴動的問題，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出的亞洲地租形態問題等等，也是應當加以詳細的研究。

這些問題之中，就像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因為各人的認識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意見。

陶希聖提出這個問題時，表示對這問題特別的重視，中國社會結構的特色，陶先生完全歸之於這個階級。他說'秦漢以後，中國已經由封建制度進入於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

對於士大夫階級有許多人提出過相反的見解。我也覺得士大夫不能成為一個有特殊經濟基礎的階級，牠只是做各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已。自然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

## 二，現在中國經濟性質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們的論戰的目的。如果得到了解決，那我們的行動就有了極有力的根據。對於歷史上的研究，亦不過



爲着要使這個問題更容易得着結論而已。關於現代中國經濟性質，簡要的提出下列的幾個問題：

一，現在中國的社會有若干經濟層級？以何種經濟佔領導的地位？

二，帝國主義的外力對於中國經濟發生了什麼作用？將來還會發生什麼影響？

三，封建勢力是否還遺留於中國社會中？其作用如何？

四，中國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

五，農民暴動的前途如何？

六，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否有前途？

七，產業工人力量的估量。

八，中國需要什麼性質的革命？

要研究現在中國經濟的性質，其結果自然得涉及中國革命的性質，這個問題所以嚴重與普遍在此，所以能誘發思想界鬥爭的興趣與活氣亦在此，因爲這不僅是書獃子書齋中的事業。

三，中國歷史上意識形態之發展的研究

研究中國社會的史的發展，自然應當從生產力的轉變，生產關係的轉變研究其最基礎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同時應

當從意識形態的上層文化的發展以證明其符合與否而使此分析得更堅確的信念。好像

一，中國政治形式的史的發展；

二，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發展；

三，中國文學的史的發展；

.....

.....

等等都應當分門別類作分工合作的研究。

#### 四

最後將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和散在各雜誌中的論文，就手邊所能查考的寫下一個目錄，以為研究這問題者之一助。

一，關於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的書籍

書名	作者	出版處
中國社會史的分析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封建社會史	陶希聖	南強
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社會研究拾零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社會史研究	熊得山	崑崙
中國社會之結構	周谷城	新生命
中國社會之變化	周谷城	新生命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	新生命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	聯合書店
中國經濟的研究	任曙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偉章	(不日出版文 見本誌本期)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朱新繁	聯合
中國產業革命概觀	李達	崑崙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郎著 朱家清譯	光明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馬札爾亞著 陳代青彭桂秋譯	神州國光社
中國革命運動史	拉狄克	光明
支那土地制度研究	長野朗著 謝友仁譯	神州國光社 即出版
中國農民戰爭的史的研 究	龍山	神州國光社 即出版
中國經濟史概論	貫因	聯合書店
中國產業革命概況	李達	崑崙
中國產業組織和資本主 義的發展	伊藤武雄著 黃逸羣譯	樂羣
民族革命原理(譯)	列甯	華興書局
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 (譯)	布哈林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與反對派	史達林等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陳獨秀等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	李立三編	布爾塞維克社
我們的政治意見	陳獨秀等	無產者社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彭述之	中共
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瞿秋白	中共
中國革命與中共	瞿秋白	中共
中國經濟基礎現狀及危機	李麥麥	滬濱書局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社會科學研究社
物觀文學史叢稿！		
南北朝文藝與社會	王體錫	神州國光社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	神州國光社
李長吉評傳	王禮錫	神州國光社

二,散見各雜誌中的論文

篇	名	作者	冊	名	出版處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	動力	第二期	神州國光社	
中國經濟研究(一)	任曙	全一冊		滬濱書局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全一冊		社會科學研究社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李立三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No 2/3	中國共產黨	

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錯誤	吳良賦	全上	中國共產黨
反抗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	問友	全上, No.6	中國共產黨
一九二九年之中國	潘東周	新思潮第一卷 No 2/3合刊	新思潮社
中國經濟問題專號	潘東周等	全上, No 5.	新思潮社
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	潘東周等	社會科學講座 No 1.	光華書局
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	沈澤民	布爾塞維克(?)期 1931.5月出版	中國共產黨
中國經濟的性質	伯虎	全上	中國共產黨
關於“金貴銀賤”問題	澤民	全上	中國共產黨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根本問題	潘東周	世界月刊第一卷 創刊號	世界學會
中國鐵路現狀	垂雲	全上, 第一卷 創刊號	世界學會
中國對外的貿易問題	潘東周	全上, 第二號	世界學會
中國航業現狀	垂雲	全上, 第二號	世界學會
中國工業問題	潘東周	全上, 第三號	世界學會
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	胡浪恆	大道月刊第一期	大道月刊社
陶希聖的商業資本的魔手	逸廠	社會科學戰綫 第一期	社會科學戰綫社
中國社會史的分析及中國革命的階級	丘旭	摩登青年第一/二期	摩登青年社
中國經濟的性質是什麼?	思雲	讀者第一期	讀者月刊社
中國糧食問題	王道	世界月刊第二卷 第二期	世界月刊社
中國貨幣的考察	成信	全上	全上

中國經濟的性質是什麼	恩雲	讀者第一期	全上
關於中國古代史研究法	王洵	讀者第一期	讀者月刊社
論中國的封建制度	陶希聖譯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產業革命與中國農村經濟之崩潰	高鏗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政治思想底社會的基礎	莊心在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國民革命與社會階級	胡祥麟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失業問題之特殊性的探討	李宗文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社會發展的概略	梅恩平	新生命一卷十一期	新生命書局
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	方岳	新生命二卷一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社會構造史的觀察	黎際濤	同上,二卷五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和中國的危機	何思源	同上,二卷五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的社會基礎	梁園東	同上,二卷六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之封建的勢力	葉兆英	同上,二卷七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階級之史的考察	維持福 維格爾	同上,二卷八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的家族制度及其崩潰	實君	同上二卷一〇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社會之封建的考察	朱伯康	同上三卷一〇,一一,一二號	新生命書局
(新生命中所載陶希聖各文,因輯成專書,不錄)。			
前期封建社會之中國農村社會	剪伯贊	三民半月五卷七八九期	三民半月刊社
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史的階級發	剪伯贊	同上,六期	三民半月刊社



- |           |            |        |       |
|-----------|------------|--------|-------|
| 關於中國的封建制度 | 朱其莘<br>陶希聖 | 本誌第一期  | 神州國光社 |
| 中國宗法社會的將來 | 潘 菽        | 北新四卷七號 | 北新書店  |
| 中國社會之分析   | 朱伯康        | 本誌第二期  | 神州國光社 |

## 科學的故事 (上下兩冊)

法布爾原著 宋易譯 實價各四角

法布爾是近世第一流的昆蟲學者，同時也是個第一流的自然科學者。他生平最謙惡艱深難解的學問，常說學問這東西，決不是道貌岸然名叫“學者”的那種人，關在名叫“研究室”那種地方所能解決的。在現世界的習慣，對於學問是過分尊視了，對於一般普通人是相隔得太遠了。大家都以為，對於無論何種研究，只要吃這一路裏飯的學者知道，別人不知道也無妨，或者是無知道的資格。這是非常錯誤的。除了非常專門非常困難的研究以外，一切普通的學問，無論是孩子大人都應該知道的。於是他以故事的體裁，寫了他的世界名著“昆蟲記”之外，又為法國的，不，為世界的孩子少年成人寫了十幾大卷的“科學知識全集”。這本科學的故事就是該全集的一個序論。茲由宋易先生根據英日兩種譯本譯出來了。宋易先生以翻譯童話之筆，而譯這部科學知識名著，其簡明流暢自無待言了。

上海 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 廣州



神州國光社印行經濟史書目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二	版初	版初	版二	版初
債票投機史	印度獨立運動史略	法國大革命史	第一國際史	國際運動史	社會進化史綱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上中下册)	社會鬥爭通史(四册)	農業問題論	世界貨幣問題	中外貨幣政策	德意志經濟之復興
伍光建譯	袁學易著	克魯泡特金著 劉鏡園譯	STENJOFF著 吳樹仁張伯箴譯	張雲伏著	鄧初民著	庫斯聶明著 高素明譯	馬克皮爾著 葉啓芳譯	考茨基著 章子建譯	加塞爾著 王希夷譯	彭學沛著	安琪爾著 曹盛德譯
實價一元	實價三角	實價三元	實價二元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五角	上中下册 實價七角五分 實價七角五分 實價七角五分	第一册七角五分 第二三四册各七角	實價六角	實價五角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一元四角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參考書的最高峯！

# 關於中國社會之 封建性的討論

朱新繁

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中國封建制度何時開始崩潰？封建勢力在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佔何種作用？這些都是關於中國社會見解的爭論的焦點，而是我們解剖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所必須理解的。

首先我們要問：中國封建制度是否還存在？如果說已經破壞，那末破壞開始於何時？

現在差不多有很多人一致承認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周末秦初)已經破壞，尤其是陶希聖先生主張此說最力。

陶先生肯定地說：“我的答案：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勢力還存在着。”(陶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二六頁)至於封建制度在什麼時候就已不存在了呢？陶先生一再說：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社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同上書第四頁)

“封建制度在春秋時已經崩潰，所以中國早已不是封建的國家。”(同上第二六一頁)

“貴族政治在春秋時代，起了動搖。三家據魯，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這些事實證明了舊貴族的權力逐漸移於官僚。至侯封與侯封之間，經過了許多的戰爭，戰爭的結果，一方面弱者被併於強者，他方面因為權力集中於治者而形成中央集權，破壞了舊日的封建制度。”(同上第五三——五四頁)

“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為商人資本的發達，灌溉農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沒有存在的餘地。”(陶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九六頁)

“封建制度不過是現物地租及徭役勞動，人與人間之隸屬關係，及地主之政治支配，三個要素相與結合而成。

三個要素自公元前六〇〇年後，開始分解。”（同上第一九七頁）

“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變革的時期，社會變革的實際，卻不過封建制度的分解。”（同上第二五五頁）

陶希聖先生上面的見解是不是正確的呢？我們要答覆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什麼是封建制度？

陶先生對於封建制度所下的定義是：

“現在我們先說一說封建制度是什麼？封建制度有兩個特徵：

“1. 封建制度建築在土地制度上面，牠的基礎是農村。

“2. 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領主和掌握治權的封建貴族。因為有了這兩個特徵，所以：

“1. 封建制度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經濟不發達，因為基礎在農村，故沒有都市集中的現象，和發達的貨幣。

“2. 封建制度的時候，沒有官僚，只有貴族，貴族掌握治權，同時，他們又掌握政權。”（中國社會之史的分

析第二五八頁)

以上陶先生所謂封建制度的兩個特徵，都是很曖昧的。所謂“封建制度是建築在土地制度”上面，這尤其是很空洞的。井田制度是一種土地制度，私有土地是一種土地制度，土地國有也是一種土地制度；大約陶先生的所謂土地制度，即指“沒有都市集中的現象，和發達的貨幣”的時候的任何一種土地制度。但無論如何，我總以為對封建制度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妥當的。

“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無償的剩餘勞動，在這一經濟結構中，係由生產者身上壓榨而來——決定了統治隸屬的關係，而此種關係，亦即由生產過程中直接發生出來的……生產工具私有對於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適應於勞動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以及勞動方法的社會生產力的——正就是這一點上，我們常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奧秘……”

“雖然如此，但同一的經濟基礎——同一的主要條件，却因各種不同的實際環境——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能以發生無數的變態和差別相似迷混本來面目，要了解牠，只有藉助於當時實際環境的分

析。”(馬克思)

馬克思以爲當我們研究社會的經濟結構時，要把主要的條件從次要的條件中分開，首先研究這種經濟結構的一般的經濟基礎，然後再來分析那決定某種經濟結構之變態的“當時實際環境”。我以為這種研究方法是很對的。根據這種態度，當我們研究一種經濟制度時，首先要研究這種經濟制度的剝削關係；必須如此，才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奧秘”。所以我們要研究封建制度時，首先要看封建制度的剝削關係。

馬克思對於封建的剝削關係作了如左的說明：

“在一切經濟結構之一，如果直接勞動者仍爲生產工具和勞動方法的佔有者……則所有權關係，必進而爲統治與隸屬的直接關係，直接生產者必成爲不自由者。此種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柔化爲簡單的納稅義務……名義地主只有用超經濟的壓迫，去榨取剩餘勞動。”(資本論第三卷)

馬克思指出這種剝削方法是在於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這種剝削方法就是封建式的剝削，而維護這



種剝削方法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式的所有權……憑之以建立的社會組織，其中與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不是古代的奴隸，而是農奴式的農民。”（馬克思恩格斯文匯第一卷）這就是封建制度的定義。

我們來看，在春秋戰國以後，這種剝削方法——即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的現象，是否還存在呢？當然還存在着。

更進一步說，陶希聖先生所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封建制度崩潰的時候，有下列五個特徵：

“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一個徵象，是等級關係的崩壞。在封建制度之社會，王，公，大夫，士，阜，與，隸，僚，僕，臺（左傳昭十年）的等級關係，力期於差別之明瞭及分割的固定。最良的政治社會組織是：

“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等。（左傳襄九年秦子襄贊晉國之言）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左傳昭二十六年晏子之言）

“春秋以後等級關係頗為紊亂。各國有因嚴守等級

而號召反抗的，例如鄭：

“‘子孔當國，爲戴書，以位序，聽政辭。大夫諸司門子弗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左傳襄十年）

“有貴族降爲阜隸的，例如晉的貴族‘欒，卻，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左傳昭三年）有阜隸解放爲自由民的，例如晉的裴豹，因助范宣子殺欒氏力臣督戎，而爲之焚丹書（左傳襄二十二年）。此外陪臣專政如魯之陽虎，外卿弑君，如齊之田桓，這些現象極爲驚心動目。

“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二個徵象，是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而爲集權國家。戰國的國家都是由‘兼小’成立的。以基礎論，當時的國家如秦，三晉，楚，燕，都是基於土地資本。如齊如越，卻是商業都市國。各種社會力，除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以外，尚有貴族的競爭，平民的分化，都在此時表現於政治紛擾。

“貴族受商業的刺激，或增加對農奴制的剝削，或爲增加富力而行兼併；爲行兼併，於是有國外戰爭與國內交關。國內交關固使貴族階級分裂，國外戰爭亦集大權於少數軍事貴族，因此有貴族階級的分解。莊園破壞，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小規模土地經營爲有利，一方面軍事貴族

爲確定收入，以土地爲標準而課稅（稅畝），於是農奴上升爲自由農民；他方面土地買賣自由，使農民有喪失土地的事實。於是農奴分解爲自由農民及無業而售身的奴隸。

“所以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是社會紐帶的鬆懈。

“商人資本即 $M—C—M$ 及 $M—M$ ，一方面促進土地買賣的自由，欲使土地加入交換過程，他方面促進農民及地主的破產與土地的兼併。商人資本的作用是剝削獨立小生活者以取利潤，而不直接參加生產過程。所以，商人資本只有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而不能促進新生產方法。

“所以封建制度的分解，第四個徵象是個人及社會階級對社會再建之無力。

“然而戰國時代封建制度的分解，是由於農業生產力之增加。農業生產力的增加，一方面使國家經濟力增大，他方面促進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國家經濟力大，可以雇用官僚。自由地主階級成立，可以供給官僚的材料。自由地主入商業都市，可以變爲士人，士人干祿，可以加入官僚組織。韓非子描寫得好：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牟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乘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半。（外儲說）

“所以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五個徵象，是士人階級的勃興及官僚制度的成立。”（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二五五——二五八頁）

爲了要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詳細研究起見，不惜時間篇幅，引用了這一大段文章。現在我們來對於陶先生所指出的五個徵象，一一加以研究。

陶先生以爲“等級關係的崩潰”，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一個徵象。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等級關係的崩壞，是不是封建制度崩壞的徵象？第二，在春秋戰國時代，等級關係是不是已經崩壞？

如前所說，我們對於一種社會制度的觀察，首先應着眼於這種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而不應從社會制度之外表的某種形態爲研究對象，因爲這種外表的形態，並不是構成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主要條件。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徵，在於這個時代是自然經濟佔優勢，而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

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剩餘勞動,而不是在於等級關係。我們只能從經濟基礎上,即是從剝削方法中,才能認識某種社會經濟制度之一般的特徵。等級關係誠然是封建社會中的一個現象,但是等級關係不僅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着,即在一切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都存在着。陶先生以為等級關係是封建制度的第一個特徵,就犯了忽視主要條件的錯誤。陶先生更具體的指出所謂等級關係是指:王,公,大夫,士,阜,輿,隸,僚,僕,臺等。但是像這種等級關係,不僅在封建社會,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時也還存在着,例如為資本主義之祖國的英國,也有皇,公,侯,伯等爵級,在爵級之下,還有種種等級。雖然這種等級的名稱,與陶先生所舉出的王,公,大夫,阜,輿,隸,僚,僕,臺等不同,而其為等級則一;名詞上的分別,自然不能視為原則上的不同。

至於第二點。如上所說,等級關係在一切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都存在着,春秋戰國以後的社會組織中,自然不能消滅等級關係。這種等級關係,無論在漢,在晉,在隋,在唐,宋,元,明,清,都很森嚴地存在着;雖然等級的名稱不一定與春秋戰國時代相同,但如前所述,這種名稱上的區別,決不能視為原則上的不同。所以陶先生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

封建制度崩潰的時期，其所舉的第一個徵象，在我們看來，是絕不能存在。

陶先生認為封建制度崩潰的第二個徵象，是“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為集權國家”。這個理論較之第一個似乎要充分一點，但也決不能以此為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

關於這點，我們也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的併吞而成為集權國家，這並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是封建諸侯為維持其所屬領土內的軍民的生活的滿足及擴大其統治的慾望而起的掠奪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雖然封建領地逐漸兼併而成為集權國家，而社會的經濟基礎根本就沒有變動，所以當一個封建諸侯兼併其他封建領土而建立集權的王國時，他又必須分封其羣下為許多部落的諸侯；陶先生也不否認在春秋戰國以後，還有這種現象的存在，例如：“在中國古代，分封諸侯的典禮，有由天子授與茅土於分封者的儀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後歸受封者的領有。這種禮節到漢代還是照行。”（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三〇頁）第二，我們還該指出，所謂“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為集權國家”，這種現象，並不是開始於春秋戰國時代，遠在夏末商朝周初，都有這種現象。據一般歷史的



傳說，夏末列國三千餘，商朝列國千餘，到周武王建國的時候，還有“大小國凡八百”，可見兼併之風，決不是始於春秋戰國時代。

一般的錯誤，以為在中國歷史上，建立統一的王國，是始於秦始皇，其實周武王建國之初，何嘗不是集權的，統一的？而且秦始皇的統一的政權，維持不到一世紀就土崩瓦解了。陶先生以為“戰國的國家，都是由‘兼小’成立的”。是封建制度的徵象，其實這不是事實，即如前所述，兼併不是始於那時，而且戰國時代，如趙，韓，魏三國，誰都知道是三分晉國而成立的，這不是‘兼小’，而是‘分大’，這又作何解？

總之，這種戰爭與兼併，既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所以無論如何的結果，都不能改變社會之經濟基礎的構造。這是陶先生以為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二個徵象，在我們看來是不能存在的。

至於陶先生以為“當時的國家，如秦，三晉，楚，燕，都是基於土地資本。如越如齊，卻是商業都市國”（見上引用文）及“周的末期，中國國內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各遂其發展。幾個侯封裏面，商業資本主義已發達起來，最顯著的是齊。首先稱霸的，便是這資本主義的齊國。”（中國革命之

史的分析第三四頁)稱春秋時代的齊國爲資本主義國家,固然是錯誤,而以爲如越如齊,都是商業都市國家,也是不妥。關於這點,放在後面等論到商業資本與封建制度的關係時再說。

陶先生以爲“社會紐帶的鬆懈”,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這也是極不妥當。在這裏陶先生所謂的社會紐帶的鬆懈,是指“貴族階級的分裂”及“工農上升爲自由農民”這兩點。其實所謂貴族階級的分裂,原是封建制度的特徵,在封建社會中,貴族決不是始終統一的。因而貴族的分裂,也決不是始於春秋戰國時代。陶先生所謂“貴族受商業的刺激,或增加對農奴的剝削,或爲增加富力而行兼併;爲行兼併,於是有國外戰爭與國內交關。”關於戰爭與兼併,在前面已經說過,此處可以不必再說。至於農奴上升爲自由農民,這一點更不能指爲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因爲在封建社會,農民原本是自由的,在前面我們曾引用過馬克思的說明:“封建式的所有權……憑之以建立的社會組織,其中與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不是古代的奴隸,而是小農奴式的農民。”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更具體的指出奴隸時代的剝削制度與此種封建的剝削制度之不同,他說:

“此種經濟結構（新按：係指封建制度），與奴隸經濟，游牧經濟，都截然不同；奴隸工作，須藉助於他人的生產工具，且不能獨立工作。”

而封建的剝削方法，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剝削對象，不是沒有生產工具，不能獨立生產的奴隸，而是獨立生產者的農民。所以農奴分解為自由農民，不僅不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却相反，這正是封建制度的特徵。——這是陶先生所謂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是不能成立的。

陶先生以為封建制度分解的第四個徵象，是“個人及社會階級對於社會再建之無力”。如果單是看這句話，那是很費解的，好在陶先生已經說明了所謂“個人及社會階級對社會再建之無力”，是指“商人資本只有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而不能促進新生產方法”。這也是不對的。陶先生的錯誤，不僅在於以為春秋戰國時代“商人資本分解了舊社會制度”，即是破壞了封建制度，而且他根本過視了商業資本的作用。商業資本不僅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而且也不能破壞舊的社會制度。馬克思說明了社會進化的定律是：

“社會關係和生產力有密切的關係。人類得着新的生產力的時候，同時改變他們的生產方法；改進他們的生

產方法和謀生式樣的時候，同時就改變他們的一切社會關係。”（哲學之貧困）

這就是說，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築在當時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生產方法又是因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必須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方法纔能改進；必須生產方法改進了，然後舊的社會制度才會發生動搖，適應於新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商業資本只是永久在流通過程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與生產資本不同，他本身並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所以陶先生以為商業資本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是封建制度的分解的第四個徵象，其理由之不能存在，也是很顯然的。

陶先生以為“士人階級的勃興，及官僚制度的成立”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五個徵象，我以為也是不確的。所謂士人階級，我總覺得這根本就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照陶先生的解說，“農業生產力的增加，一方面使國家經濟力增大，他方面促進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國家經濟力大，可以雇用官僚。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可以供官僚的材料。自由地主入商業都市，可以變爲士人，士人干祿，可以加入官僚組織。”由此說來，則地主，官僚，士人，三者有密切的關

連，所以陶先生在別的地方又說：“士大夫身分和地主階級的關係……地主和官僚的關係，也有無限的連鎖。雖有非地主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一入官僚，便成地主。雖有非官僚的士大夫，但對於農村和城市小市民，仍有支配的力量。在朝為官僚，在野為紳士。在鄉為地主，入學從仕則為士大夫官僚。因此，官僚的治理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治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九二頁）

在這裏，陶先生明明指出了“官僚的治理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治理”。可見官僚是地主階級的附庸，決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其理至明；但是陶先生還一再說：“封建制度破壞而有官僚。”（同上第一〇七頁）“官僚政府和農民的統一戰線，顛覆了封建貴族和封建國家。這個過程，發生在戰國爭雄時期，而完成在強秦一統時期。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秦乃是官僚和農民國家，所以能夠一舉而掃滅殘餘封建國家的六國。”（同上第九一頁）

關於陶先生著作中一再提到的所謂士大夫階級（我覺得這個名詞是不對的），在後面還要加以分析。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官僚決不是封建制度破壞以後才有，尤其不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關於這一點，在後面也還要詳論。

陶先生以爲“秦漢以後，中國已由封建制度進入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五九頁）但陶先生又說：“中國士大夫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其個人的生活賴地租，其階級的生存賴賦稅……所以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通的利益。”（同上第五九——六〇頁）

陶先生的根本錯誤，就在以爲地主階級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所以他一再說：“自封建貴族階級破壞以後，地主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同上第十五頁）他把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對立起來，自然要弄出許多奇怪的結論來了。其實地主階級不僅不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而且他本身正是封建制度的柱石。我們曾經一再引用馬克思對於封建剝削方法的說明，是在“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

至於陶先生所謂：“集合戰國時代各國起用庶人爲卿相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封建貴族階級已經崩壞而治權漸歸到新起的官僚。……便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舊封建制度已經破壞。”（同上第六頁）其實起用庶人爲卿相的事實，起原很早，決不是起於春秋戰國時代；不僅春秋戰國時代的寧威



百里奚都是由私人而為卿相，即伊尹太公，何嘗不都是起自庶人？庶人雖然可以僥倖而起為卿相，但他不過是封建貴族的附庸，為封建貴族做事，決不是取封建貴族而代之——更進一步說，即使有起自庶人的卿相，漸漸篡奪政權，但這個時候，他本身就形成為新的封建貴族，並不會建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是顯而易明的事。

以上是簡略的答覆了陶希聖先生的封建制度破壞於春秋戰國時代說的錯誤。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從事實上理論上證明在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以前，中國依然是一個封建國家，封建制度並沒有破壞。為要說明這一點，必須先說明商業資本的性質，及其作用。

一般人對於中國社會封建制度的觀察的錯誤，由於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性質。例如拉狄克，他因為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性質，因而簡直否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他說：

“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主完全沒有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而集中到商業資產階級手中，他們剝削的目的，與封建地主不同，因為後者不知道貨幣經濟，他們的目的，不過是為得黃金，裝飾

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只有商業資本家。”（拉狄克：中國革命史）

如前所述，我們對於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研究，應該從其剝削方法（生產方法）上着眼，拉狄克的錯誤，在於他不從剝削方法（生產方法）上立論而從剝削者的出身及其剝削的目的上立論，所以要着“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的奇妙的結論。

一般的錯誤，就在認為商業資本的發展，足以消滅封建剝削關係，甚至認為商業資本可以代替封建制度而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一切的社會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築在當時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生產方法又是因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必須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方法才能改進；必須是生產方法改進了，然後舊的社會制度才會發生動搖，而適應新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商業資本只是在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與生產資本不同，他本身並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出：

“商業資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展，就是指資本自

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與社會一般經濟的發展，是成反比例的。”

所以商業資本的發展，並不是表現着生產方法有了根本的改變（生產方法的改變，自然可以促進商業的發展），所以牠不能破壞舊的社會制度，自然更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馬克思關係於這點，說明如下：

“商業及商業資本發達，到處使生產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增加，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及其內部的構造如何為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為轉移的，而是以舊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為轉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的發展，常常歸結到奴隸的經濟；又依照這種出發點如何，一種以生產直接生活品為目的的家長的奴隸制度，有時僅轉變為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

的奴隸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展，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由此所得的結論是：此等結果，自身不是由商業資本的發展決定的，但是由種種完全相異的狀態決定的。……

“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中，因地理上的新發見，諸大革命之出現於商業中，並且很迅速的增加商業資本的發達；此等革命在促進由封建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過渡中，構成一種主要的要素，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因為這種事實而產生的種種完全錯誤的見解。世界市場的突然擴大，流通商品的種類增加，歐洲諸國民間，佔取亞洲生產物，和美洲財寶的競爭，以及殖民地制度，對於破壞生產的封建制度，是有重大的幫助的。然而近世生產方法在他的第一時期中——在手工工廠業中——只有在中古時代，已經造出自己發達的條件之處，才存在的，例如試將荷蘭和葡萄牙比較一下。當十六世紀中以及十七世紀一部分時期中，商業突然的擴充和新世界市場的創造，對於舊生產方法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興起，發生一種重大的影響，然而這却是在已經造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出現的。世界市場自身構成這種生產方

法的基礎。在另一方面，以繼續擴大的規模而生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驅策世界市場不斷的擴大，所以此處不是商業不斷地使產業革命，而是產業不斷地使商業革命。……”(哲學的貧困)

在封建時代，自然經濟佔着主要的形式，但是決不能說，在封建時代，沒有商品交換及貨幣流通的現象發生。有許多生活必需品，例如鹽，鐵，木材，藥材等，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出產的，這就是需要一種交換來輔助自然經濟。由這種交換的發展，因而引起城市的發生；這種城市一方面作交換市場的中心，另一方面，即作封建諸侯固守的堡壘。手工工業的發展，使交換的範圍也因之而擴大，即是商業日益發展。商業資本的發展，侵入農村，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發生解體的作用；但是牠不能使生產方法有進一步的發展，所以整個的社會制度沒有走出封建制度的範疇以外。而且商品經濟的發展，雖然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發生解體的作用，可是進展的程度，是非常緩慢，在中國，自春秋戰國時代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最初侵入中國時)，農村中自然經濟還是佔着優勢。

我們要說明在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中

國還是一個封建國家的理由，除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即封建的剝削方式——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剩餘勞動——而外，最好舉出自然經濟之絕對優勢這一點來作證明。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曾一再指出封建制度之特徵之一，即是自然經濟之強大。所以在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封建制度的確沒有破壞。

關於春秋戰國以後，自然經濟強大的優勢這點，陶先生也不否認。他以為“商人資本非獨不能開闢海外市場，非獨不能整理國內市場，非獨不能發達資本主義生產制，並且不能充分發達貨幣經濟以代替自然經濟。”（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四五頁）所以他承認“貨幣經濟復返於自然經濟的情形，在中國是常見的。”（同上）

在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經濟依然是自然經濟佔着優勢；貨幣經濟的不發達，物物交換的盛行，都是顯例。陶先生舉出漢代鑄錢甚多，即武帝至平帝數十年間，“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可是：

“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本紀）



後漢又鑄了許多錢，而：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廢錢用穀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晉朝沒有鑄錢，而：

“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通考載前涼索輔之言）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

（同上）

而同時北朝雖置有錢幣，亦不通行：

“後魏初置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同上）

宣武帝永平三年，雖鑄五銖錢，但：

“京師及諸州境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錢。”

（同上）

“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同上）

至於北齊神武霸政之初：

“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

陶先生雖然舉出“隋唐宋三朝以來，錢量增加，鈔幣發達，銀兩流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四七頁），但同時陶先生又舉出下面的幾個例子，例如唐代：

“儀鳳四年，以天下惡錢轉多，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於市，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又如唐開元二十二年：

“其年十月六日，勅‘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教法之間，宜有變革。自今以後，所有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同上）

由此可見在唐代社會，還是物物交換佔優勢而貨幣流通受到很大的限制。此外，我們還可以在唐宋時末的民間傳說，傳奇，小說，詩歌等各方面，看出在當時是自然經濟佔着極端的優勢。

至於元朝，則：

“所在郡縣，皆以物物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續文獻通考錢幣考）

明朝雖然代有鑄錢，但其數也是很少。

清朝鑄錢的數目，較明朝爲多，然而以人口平均起來，其數目也不能算多。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制錢鑄造額如下：

年 代	制錢鑄造額(文)
1643年(順治元年)	73,663,900
1644年	433,751,760
1645年	624,823,960
1646年	1,333,384,194
1647年	1,449,494,194
1648年	1,682,424,200
1649年	2,097,632,850
1650年	2,521,663,850
1651年	2,488,544,460
1654年	2,413,879,080
1659年	280,394,280
1660年	291,584,600
1665年(康熙四年)	295,879,800
1671年	290,475,830
1676年	231,365,260
1681年	231,398,600

1686年	289,936,700
1691年	289,925,400
1696年	237,063,050
1701年	238,065,800
1706年	238,075,800
1711年	374,933,400
1717年	399,167,300
1721年	437,325,800
1722年(雍正元年)	499,200
1725年	675,160
1726年	723,528,000
1727年	746,304,000
1729年	756,856,000
1730年	1,048,759,660

以上可以看出自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到十八世紀三十年代，這差不多一世紀中，制錢的鑄造額最多的也不過二十五萬萬文，而且自一六五四年以後，反而逐漸減少，至一七二九年以前，這七十餘年中，制錢鑄造最多的也只有七萬萬左右。當時人口即使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計算，即鑄錢

最多的年分，每人平均還不足三文。

自一八〇〇年起至一八三一年，這幾十年中的制錢鑄造數目，每年如下：

北京	899,156,000
直隸	60,666,000
江蘇	111,804,000
江西	41,928,000
浙江	129,600,000
湖北	84,000,000
陝西	87,360,000
陝西(附加)	43,204,000
四川	179,259,000
四川(附加)	14,868,000
廣東	34,560,000
廣西	24,000,000
雲南	94,860,000
雲南(附加)	84,924,000
貴州	94,860,000
山西	17,472,000

伊犁	1,122,000
合計	2,052,219,000

這個數目雖然較一六五四年以後，一七三〇年以前這七十餘年間較多，但反不若一六五四年以前幾年。當時人口即使以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計算，每年所鑄的新錢，每人平均不足七文。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一點，即也許有人以為當時貨幣是以銀兩為本位，制錢不過是輔幣，所以制錢鑄造額雖少，不足以證明貨幣經濟之衰落。此說是似是而實非。因為當時雖然銀錢兩用（銀兩只有碎銀紋銀而沒有銀幣），可是一般通用的單位，是制錢而不是銀兩。舉例來說，當時貨物的價值是以制錢計算的；官吏的新俸，工農商人的薪水，都是以制錢計算，可見制錢實在是貨幣流通中的主要單位。所以制錢流通的數量之少，可以證明貨幣經濟之不發達，而自然經濟之強大。

至於當時主要的剝削形式，完全是如馬克思所說的“名義地主以超經濟的壓迫，榨取獨立生產者（農民）的剩餘勞動”。農民是生產工具和勞働方法的佔有者，但是地主則利用土地所有權，加農民以極殘忍的壓迫，即馬克思所謂“超



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這所謂超經濟的壓迫，具體的事實如：

- 1•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往往超過百分之五〇以上，乃至百分之七〇至百分之八〇；
- 2•租額以外，還有其他各種農民對地主的必需的貢獻；
- 3•徭役制度；
- 4•地主對農民的統治特權；
- 5•等級關係的森嚴。

關於第一點，雖然因為我手頭沒有材料，不能具體的指出春秋戰國以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這二千多年間的中國的租佃制度的詳細情形，但地主對農民殘酷的壓迫，“超經濟”的榨取，是無可否認的，這點陶先生也是承認。陶先生雖然不承認地主階級用“超經濟”的壓迫來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是一種封建的剝削，但他也承認“但在這種私有土地制度成立以後，兼併的現象實屬可驚。”（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一九頁）而且他曾舉出下列各例：

○ “至秦則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前漢書董仲舒傳）

○ “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兼併起，貪鄙生，

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隸之市，與牛馬同欄，…漢氏減校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王莽傳）

“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佔田踰侈，其賦大半官受百一之稅，而入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東漢會要荀悅言）

“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兼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策，視為奴隸，……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月秋收，以至窮餓而無告。”（文獻通考田賦考）

陶先生更進一步的說明：

“此外還有完全封建式的擴大的地租——押租，押租大抵是用現金的。正租還是用現物的多。我們要知道今日的中國，是自明代起通行銀兩以後的中國，是自清代起通用新式錢貨以後的中國，而現物地租仍是通行的方式，則清明以前，遠至秦漢，是全用現物可知。”（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五一頁）

現物地租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在中國，現物地租一直到現在，還普遍盛行於各地，明清以前，自然更不用說了。

以上所引據的種種說明，可以看出在春秋戰國以來，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完全是“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因而完全是封建式的剝削。

陶先生不僅指出了現物地租，而且指出了徭役勞動及特殊的貢納義務，依然存在於春秋戰國以後。他說：

“地主與佃戶的關係，是現物交納的關係，當然與現金地租制度的主佃關係不同。佃戶所負擔者是現金，則其與地主的關係是純粹貨幣的契約關係。佃戶所負擔者是現物，則其與地主的關係，便沒有那樣單純。一定的徭役勞動，特殊的貢納義務，尚存在於主佃之間。因此，主佃之間尚保持有封建的意義。”（同上第二〇二——二〇三頁）

照以上主佃之間的關係看來，可以知道自春秋戰國以來，乃至最近，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完全是一種封建剝削方式，而擁護這種剝削方法的制度，當然是封建制度。陶先生的矛盾，就在一方面承認這種主佃之間的剝削關係，“尚

維持有封建的意義”；但另一方面，又否認封建制度已經分解於春秋戰國時代。

恩格斯更會指出封建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在都市有行會的存在（見“反杜林論”）。我們來看，中國在春秋戰國以後，還有沒有行會的存在？這是事實問題而不是玄妙高深的理論問題。如果我們不否認事實，就該承認自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滿清末，行會制度普遍地存在於中國。這也是可以作為封建制度沒有崩潰的明證。

陶希聖先生的錯誤，不僅在於否認春秋戰國時代封建制度已不存在，而且他很奇怪地把經濟上的與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劃分開來。他說：

“但是封建國家破壞以後……在經濟上，地主階級是此後的統馭階級；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後的治理階級；溝通這兩種人物的，是廣大的士大夫身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九二頁）

陶先生把官僚也看成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而把他與地主階級對立起來。其實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決不能把政治制度與經濟基礎對立起來。官僚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臣僕，決不是外族統治階級的另一種社

會階級。

陶先生不僅把官僚看成是一個階級，而且在官僚與地主之間，還有一個士大夫階級。陶先生的全部的理論，對於所謂士大夫階級特別重視。他又指出了所謂官僚政治的統治者是士大夫階級：

“秦漢以後，中國已經由封建制度進入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五九頁）

在這裏，與前面所引用的陶先生的話，顯然矛盾；在前面，陶先生把官僚與士大夫看做是兩個不同的但可以接近的社會階級；在這裏，他又把官僚與士大夫混合起來。但這些枝節問題，在此地我們可以不必深究；我們所要問的，是構成陶先生的中國社會觀的中心理論的所謂士大夫階級，究竟是什麼東西？

陶先生以為：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身分還不止於一個社會層。自封建貴族階級破壞以後，地主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和士大夫官僚之和，恰與封建貴族階級相等（新按：這句話是十分費解，簡直不懂）。若包括地主

和官僚的兩端，則以士大夫身分爲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亦非錯誤。”（同上第一五頁）

照這樣說來地主階級是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而士大夫階級亦可稱爲社會的基本階級；這是什麼說法的呢？這兩個社會的基本階級是不是對立的呢？照陶先生的說法，不是對立的，而且並立的。那末所謂士大夫階級的經濟基礎究竟是什麼呢？他與地主階級究竟有什麼分別呢？陶先生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來：“何以中國士大夫階級能夠自成一階級呢？”他的答覆是：

“第一，因爲這個階級是一種擴大的身分階級。這個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有門第的超越，有知識的優異，對於庶民擁着一種身分的信仰。

“第二，因爲這個階級的生存和封建貴族的生存是一樣的寄託在農民之上。（一）個人的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農民收取租課以自奉，乃有餘暇以從事於知識的追求和政治的活動。（二）階級的活動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農民收取賦稅，以爲俸祿，乃能運用政權，威臨於勞苦農民之前。（三）階級的保存賴有身分的封鎖。門第不相當者不通婚，而門第相當者相結納。譜牒之學，便是封鎖身分的



武器。(四)階級的流通，又用科舉或選舉制度，以士大夫階級思想的定型，吸收庶民中優秀分子，使加入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三六——三七頁)

我們知道，一個階級的存在，必然有牠的經濟基礎。所謂“門第的超越，知識的優異”，決不能成爲構成一個階級的原因和基礎。陶先生所謂“這個階級是一種擴大的身分階級”這種抽象的定義，不待說，這並沒有把這個階級的基礎說出來，因爲單靠身分，決不能形成一個階級。而且身分必然有其經濟的基礎。據陶先生的解說，又明明是“個人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農民收取租課以自奉。”這明明是地主階級。但陶先生又偏偏要稱之謂士大夫階級，以其和地主階級分開，這實在是太把階級這個名詞濫用了。至於所謂“階級的活動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農民收取賦稅，以爲俸祿，乃能運用政權，威臨于勞苦農民之前。”這又明明是馬克思所謂“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的封建剝削方式。陶先生一方面既認定這種剝削方式是封建的剝削：

“……所以士大夫階級這種觀念生活者便是經濟上的剝削者，在封建制度破壞以後，便自己去統治者——官

僚而現身。士大夫階級的剝削，即是封建的剝削。”（同上第一二頁）

可是另一方面，卻又肯定封建制度已經破壞。由這種奇妙的理論而生出的奇妙的結論，就是“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士大夫明明是一種寄生分子，明明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附庸，但是陶先生一定要把按上一個階級的定名，使牠和封建制度對立或並立起來。

陶先生既不能指出士大夫的獨立的經濟基礎（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所必要的條件）——陶先生所指出的，完全是地主階級的附庸生活——而陶先生所說的士大夫的起源，也十分不妥。

陶先生這樣的說明了所謂士大夫階級的歷史的起源：

“……中國歷史便由此轉入七雄爭長的戰國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間，貴族階級相隨崩壞。到了戰國時代，庶人起而為卿相的事情很多。貴族要保持其地位，也相趨於養士，於是貴族中的進步者與庶人中的優秀者混成一個士大夫階級。這個階級在戰國末期，有突進的勢力，如信陵君的專魏，孟嘗君的振齊，燕太子刺秦，都是這個階級的浪漫的鬥爭史，而信陵平原的勾結，已目無魏趙兩君。

這個階級的成分是貴族，知識分子及遊俠。知識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維持這個階級地位。”（同上第三五頁）

照此說來，所謂士大夫階級者是由“貴族的進步者與庶人中的優秀者”混合而成的。這樣混合而可成爲一個階級，已經是奇談。所謂庶人中的優秀者，這優秀兩字，當然是指智識程度而不是指財產關係，所以這個階級的構成，簡直沒有經濟基礎，僅僅是“知識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作爲階級構成的基礎。不待說，這種階級理論，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是不能存在的。

總之，以爲在春秋戰國以來，封建制度已經破壞這種理論，固然是錯誤，而陶先生毫無根據地指爲封建地主階級之附庸的士大夫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也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不僅是名詞上的不同，而是因爲這種名詞上的錯誤，可以混亂一般對中國社會史的觀察的視線，最重要的是使人重視這僅爲封建地主階級之附庸的所謂士大夫階級，因而反忽視了地主階級的主要作用。所以這個名詞上的錯誤，我們必須要把牠弄清楚才行。

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破壞說的錯誤，已

如上述。那末中國封建制度究竟於何時開始破壞的呢？

我的答覆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即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對中國開始商品侵略以後。但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中國封建制度雖然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已經開始破壞，可是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然佔着主要的作用。

我們說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其理由與事實如下：

自從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商品經濟的侵略，破壞了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雖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商品經濟不能壓倒自然經濟，這是一個事實。農村生活是一種自足自給的形態，農民的日常用品，除了鹽鐵木材藥材這幾項以外，差不多都是由農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舉幾種日常用品來說：米麥雜糧，幾乎是每個鄉村自己都有生產，因而不需要向外購買的。又如衣服的原料，最普遍通行的是棉布。但是因為中國土壤幾乎到處都適於種棉，所以棉花原料幾乎到處都有。例如在浙江，雖然不是著名的產棉區域，但是各縣各地都有棉花種植。原料既到處都有，而“男耕女織”，又是中國的古訓，

幾乎男女人人都能紡織，所以棉布的生產各地都有。其次如綢緞，雖不如棉布之普遍，但在江浙閩粵川魯贛鄂各省，都有絲繭生產，因而都能製造綢緞。又如燃料肥料，以及一切日常用品，以前幾乎各地都能自給，所以能夠維持一種半獨立的狀態。總之，那時是自然經濟優於商品經濟。但是帝國主義商品侵入以後，農村中的經濟關係是轉變過來，成為商品經濟支配自然經濟：外國的棉紗棉布代替了農民自己生產的土布土紗；外國的煤油代替了農民自己製造的植物油燃料（菜油及豆油等）；外國的肥皂代替了農村到處都有的皂筴與農民自己製造的灰鹽；外國的火柴代替了原始的取火方法——火刀與火石；外國的瑣瑣器具代替了一切舊式的陶器磁器木器鐵器這些日常用品；外國的捲烟代替了農村中到處都可種植的粗烟；外國的‘洋紙’代替了原來的粗紙；外國的‘洋糖’代替了甘蔗汁；……總之，外國的商品代替了一切農民自己生產的東西，使農民不得不離開了這自給自足的半自然經濟的樂園，來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供給。

復次，因為帝國主義的侵入，使物質的生產方法也起了很大的變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上海天津這些大都市開始出現。無論牠的基礎如何脆弱，但他總是一種資本主義

的生產方法。因為資本主義工業組織的出現，使社會上除了封建地主階級以外，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發生。資產階級之意識形態的發展，革命運動的興起，給了封建地主階級一個打擊，而使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動，更其主要的事實是無產階級勢力之形成與發展。農村的半自然經濟開始破壞以後，農村的階級分化日益明顯，因而階級鬥爭不僅在都市中，而且在農村中猛烈的發展。這些現狀都足以說明封建制度在這種極端的變革中，的確已經開始破壞。這不必從理論上加以說明，因為嚴酷的事實為我們證明：新式工廠的興起，工業都市的發展，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意識形態的發展，彼此階級對立的森嚴，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不容掩飾的鐵證。所以以為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破壞，固然是絕大錯誤，而以為一直到現在，封建制度還是健全無恙，毫無變動，也是錯誤。

顧孟餘先生完全否認這些事實，他與布哈林所說的那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盲目的說：

“……自封建制度崩潰後直到現在，沒有改變。最奇怪的，就是雖然和西洋通商將近百年，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國的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



改變。”（前進第十四期上公孫愈之文——公孫愈之即顧的化名。顧先生也和陶先生一樣，是肯定中國封建制度是破壞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新註）

顧先生真不愧是“以彼之矛，刺彼之盾”的勇士！他一方面說“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說“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變動”。這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荒謬理論，實在可以不必加以批判。我們現在是要問：中國封建制度既已於帝國主義侵入時開始破壞，然則到現在已經破壞到任何程度呢？

蘇聯反對派的重要領袖之一的拉狄克，他根本否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反對派的領袖托洛斯基，也和拉狄克一樣，以為封建殘餘在中國已經沒有何等意義。

在中國國內，機會主義的領袖陳獨秀先生，他雖然不完全否決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可是他以為：

“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已經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所以現在農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經不是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而是反各種各式的資本主義的鬥爭。”

又說：

“其實中國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的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都是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久已成為他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壘）財政上（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的共同必要。……”

“而且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沒有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意義，因為他已經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就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的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量；封建殘餘在這一轉變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之中，變成殘餘的殘餘；牠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以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國區域內的統

治基礎。”(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二九年)

關於陳獨秀先生文內的所謂“取得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及“資產階級得了勝利”這兩點，當另外作文詳論，現在我們要就本文的範圍內，提出兩點來討論：

第一，陳先生所謂“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已經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這究竟是不是事實！

第二，陳先生以為“封建殘餘……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變成殘餘的殘餘。”又究竟是不是事實！

其實陳獨秀先生所謂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不知是根據什麼理由？如果說一句開頑笑的話，我們還不如說“陳獨秀先生自己在努力資產階級化”，中國地主階級做夢也沒有想到要資本主義化，除非陳獨秀先生自己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地主階級。中國土地的分配，是中小地主佔優勢，這固是誰都知道的，但這不僅不足以說明“地主階級努力資本主義化”，而且地主愈小，對農民的剝削愈加殘酷，愈加是一種封建的剝削。這種殘酷的剝削，完全符合於馬克思對於封建剝削方式所下的定義。下面這些事實可為

明證：

第一，地主階級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〇到百分之七〇，從前歐洲封建地主徵收農民的數目，沒有這樣厲害。徵收農產品，就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歐洲封建時代，極普遍地採用，到了商品經濟發展，才有部分的變為以貨幣代表的形式，現在這種形式，在中國有些地方也發生了（即所謂折租），但還是很少，而是徵收農產品的佔主要形式。

第二，租額以外的貢獻，如廣東的田信鷄，田信米，湖南的年鷄年肉，江浙等處的節禮等，都是佃戶對於地主的不可或缺額外貢獻。遇有新產物收成，無論是黃豆青菜麥子瓜果等，佃戶都要無代價地送一些給地主。

第三，徭役制的殘留，如湖南的應工，江蘇的送工等。現在湖南湘潭的應工，每月八天，江蘇的送工，每月五天。至於四川雲南陝西等處，還有更長期的勞役，並且純粹封建的土司制度，都還存在。

第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也不亞於以前歐洲的形式；地主有民團，保衛團等武裝組織，無法庭，有監獄，可以自由審判，處罰，甚至屠殺農民。

第五，在社會關係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各省通有的一句話，所謂“東佃父子”，把這個關係表現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形，地主與佃戶不通婚姻；地主有婚喪喜慶的事，農民全家都須去服役，不僅沒有絲毫報酬，而且還要送禮。甚至農民到了地主家裏，不能坐在凳上，只能屈坐在地下的情形，都還存在着。

這種現象都是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關係，對農作一種超經濟的剝削。這極顯明的是封建剝削方式；這種封建剝削方式現在在中國各處佔着主要的統治地位。這是不可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可是不幸陳獨秀先生竟也墮落到與顧孟餘先生一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而說“封建剝削已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

再回轉來說，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是單就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一點，決不能就肯定地說是“資本主義化”。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結果，土地依然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地主階級依然是利用他的土地所有權對農民加一種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這何嘗是資本主義化？即使有一部分兼併在商業資本家手中（這當然是一個事實），但他還不是一樣地從農民身上加一種超經濟的壓

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根據上述馬克思對於土地關係的解釋，即主要的是要看土地所有者採取何種剝削方式。現在中國土地雖然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土地所有者對於農民所取的剝削方式，完全是一種封建的剝削方式，所以決不是如陳獨秀先生所說，“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

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在中國除了滿洲一部分地方外，可謂絕無僅有。滿洲的農業經濟比較進步，是由日本的經營，那是又當別論的。

從海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八年這十幾年間，農業機械的進口，有如下表：

年 代	價值(單位海關兩)
1913年	112,700
1916年	204,520
1918年	164,188
1920年	1,004,277
1921年	1,192,404
1922年	695,732
1923年	304,233
1 24年	209,977



1925年	161,288
1926年	511,540
1927年	665,976
1928年	743,364

如果我們不按其內容，單照這個數目看來，每年農業機械的進口，也值數十萬兩，雖然在三萬幾千萬人從事於農業生活的中國，這是一個非常之少的數目，可是也不能說中國絕無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了。但是實際呢？

在這每年進口的農業機械中，有百分之六五乃至百分之七五是輸入滿洲的。如上所述，在日本經營下的滿洲，是當別論的。

剩下的百分之三五，乃至只有百分之二五，其中有一部分是殺牛機器。這些新式殺牛械器，只是在那些大都會中，例如上海天津漢口廣州汕頭青島及其他都市中才有，在農村中是沒有的。像這種只有供都市採用的殺牛機器，無論他每年的進口增加到如何可驚的數目，與整個的農業經濟毫無關係。有一部分是由大學的工科農科及農業工業專門學校買去參加使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有少數幾個農業公司採用。

我們再來看看，這所謂幾家農業公司是怎樣的情形？

只有在江蘇，還有二三家農業公司。這幾個農業公司，在開始創辦的時候，的確是想應用機械生產使農業資本主義化，例如已故的張季直在南通海門等處所創辦的農業公司。但是他們這種企圖，已經由事實證明其失敗。因為在工業不發達，在市場為國際帝國主義所支配的經濟落後的國家，要使農業資本主義化，一定要遇着許多困難，甚至完全不可能。因為第一，要創辦一種以機器生產的大規模的農業事業，需要鉅額的資本，集中鉅大面積的土地。有中國，土地既分割得非常零碎，而資本的積聚的過程，又非常的緩慢；而且投資於農業，比投資於工業，更是沒有把握，誰也不願意以其財產冒險投資於農業經營，這是顯而易明的事。第二，新式的農業經營，其生產工具（新式機械），其技術人材，都必須依賴外國，耗費很大。第三，現在中國市場完全受國際市場的支配，農業生產品也是如此，例如在國際棉業市場蕭條的時候，中國的棉花生產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中國本國的工業不能發展，農業原料的生產，主要的是依賴輸出外國，因而不能不受國際市場的支配，而使農業生產不能充分發展。第四，中國軍閥的橫暴，戰爭之不斷的發生，土匪的殘

酷的騷擾，使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安寧，自然是農村中比都市中更危險。農村的安寧，在中國是沒有一點保障的。如果在農村中經營了一個廣大的農場，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有受戰爭，土匪，軍隊的蹂躪，以至完全破壞的危險。第五，因為中國目前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勞動者；因而勞動力的代價非常低廉，用鉅額的貨幣去購買新式農業機械以從事生產，也不足與廉價勞動競爭，所以農業機械化就受了絕大的障礙。

因為這許多原因——自然還有其他比較次要的原因——使一般擁有財產的人，覺得與其投資於危險而不可靠的新式農業經營，反不如投資於收買土地，佃給農民，收取田租，及放高利貸之為有利而可穩妥。所以地主階級一有餘資，即用來收買土地，租給農民，或放高利貸，而不願意投資於提高農業生產。

理論與事實是完全符合的。上述的這些困難，使除了滿洲以外的中國少數幾家農業公司，均遭了慘酷的失敗。

第一是因為沒有集中的鉅大面積的土地，所以進行非常困難。張季直利用他的政治勢力，藉封建軍閥（如當時齊燮元孫傳芳）的掩護，很強暴的無理的強奪了許多民田。這

種方法已經完全是封建式的兼併，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文明辦法了。又因為上述的種種困難，使這些農業公司不能發展起來，現在這些農業公司雖然沒有完全關閉，可是牠已經不是經營機械生產，而是把公司中的大部分的土地——甚至可說是全部的土地，分租給農民，從事一種幾千年傳留下來的舊式方法的生產，而公司從農民收取田租——依然是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加以超經濟的壓迫，而奪取其剩餘勞動。而且這個“公司地主”（這個名詞是非常之適當的）比個人地主更凶暴更殘酷的剝削農民。這個“公司地主”有自己的武裝，有自己的法庭與監獄，可以任意極殘酷的壓迫農民。這純然是一種封建剝削。所以這些農業公司的存在，其意義不過是一種集團的封建剝削，決不是一種資本主義化的農業生產組織。聽說江蘇海門的那家農業公司，在當時開辦時曾以鉅大的代價買了幾架農業機器，後來因為計劃失敗，土地分租給農民，於是這些偉大的機械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苦，所以有的機械已經卸下來改裝作別的工業機械，有的因為不能改裝作別的工業機械，所以只得任其廢擱，現在都已生滿了鐵鏽，絲毫不能轉動，勢將成為廢鐵了。

可見陳獨秀先生以爲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並不是事實——即使有極少數極少數的個人作這種勇敢的嘗試，也是早已失敗了。

至於第二點，即所謂封建殘餘失去了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去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變成了殘餘的殘餘，同樣也不是事實。在這裏，我們不必舉出長篇的理論，只要問：現在的中央政權形式是資產階級的嗎？封建軍閥已經消滅了嗎？封建割據的局面已經打破了嗎？鄉村的政權已經由豪紳地主手中奪過來了嗎？當然不是的！

中國工業的發達，是不用說明就可以知道的。工業經濟的衰弱，就是表示封建勢力之強大。只要不和顧孟餘先生一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就不能否認封建殘餘還是佔着強大的優勢。

在前面所引用的陶先生的著作中，他很明白地寫着“封建制度已經崩潰，封建勢力還存在着，”可是在陶先生最近給我的信上所說，他是更進一步的連封建勢力的存在，也加以否認了。關於這點，在上面答覆陳獨秀先生的見解中已經說過了。

在某種刊物上，我們還看到有人引伊里基爲護符，以爲

伊里基是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的。這真是絕大的荒謬！

伊里基決沒有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正是相反，他在論中國土地關係的時候，指出這種土地關係是建立在封建剝削之上。例如他那篇有名的論文“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中，曾說：

“……在落後的農業經濟的與半封建的中國，在客觀條件上，數萬萬人民生活感受的只是歷史上一種固有形式的壓迫與剝削，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上；在某種形式上，使農民附屬於土地，即為中國封建制度剝削農民的源泉，所有的封建諸侯與君主，都是這種剝削制度的政治表現，而君主是為此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首領。”（伊里基全集第二卷上册）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目前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即是徹底的肅清這種封建殘餘。

〔近來與陶希聖先生討論中國社會之封建性問題，彼此信件往返，總覺得所談不甚詳細。而這個問題又是目前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解剖中重要部分之一，故特抱病寫成此文，以求陶先生及讀者指教。〕



作者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深夜

寫於揚子江盡頭一病院中

## 滿洲國際關係

C. W. Young 著 蔣星德譯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作者曾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教授，應一九二九年太平洋學會之請，而作此書。本書最著的特點：

(一) 根據現存的及以往的關於滿洲之條約或公文，而解釋帝國主義者因侵略滿洲而引起之衝突，以及中國因滿洲被侵略而反抗帝國主義者之行動。他闡明了關於滿洲各種條約之成因，與其結果或影響，帝國主義者對於滿洲的野心，便因此曝露無遺。材料真確，是本書第一特色。

(二) 將滿洲的國際紛爭的歷史，分為四大時期，即 1895-1905, 1905-15, 1915-21, 1921-29，於每個時期中，除開始對本時期作一總述，復各設專章論及各強國在滿洲之地位，再分析本時代之條約協定等，眉目清楚，次序謹嚴，何況首章導言，詳論一九二九年之中東路之事件，在各種討論滿洲問題的書籍，此書成功最近。詳瞻充實，是本書的第二特色。

(三) 特於書末，添設附錄，討論關於各種關於滿洲的祕密條約，且將此項被約完全譯附於內，原文為中文書籍中所缺少者尤多。即素來對於此方面無研究之讀者，讀此書後，亦能了然於心。至於專門研究滿洲問題之學者，得此一篇，更有補益幫助，功用極大。理論精到，解釋詳明，實為本書的第三特色。

上海 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 廣州

# 在“戰場”上

## 所發見的“行尸走肉”

嚴靈峯

——一些“小小”的常識問題，質之於朱其華先生。——

我在讀了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之後，在中間不僅發現了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戰場”，同時在那“戰場”上又發現了“行尸走肉”的理論。

素好文字論爭的我，對此有歷史意義的思想上公開討論，當然是躍躍欲試的；可是，這個“戰場”所交攻格鬥的卻

是歷史問題，而是十分複雜而又困難解決的“中國社會史”問題，“暫時”便不得不迫使我減少了奔赴“戰場”的勇氣。因為，我當前正在從事於研究和寫作“資本主義以前各時期的中國社會”一本小冊子的努力之中，在我個人未得肯定的結論之前是不願意輕率將事和隨便發表意見的；這樣，與其說，我要“養鋒蓄銳”，毋甯不客氣地說，我是由於“膽怯”！

因此，我只得提出一些於我所不能了解的“小小”問題，質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家的朱其華先生：

聽朱先生說，他“根據社會科學分析與估計，則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問題，可得如下結論：

- (1) 中國封建制度破壞於十九世紀中葉以降；
- (2) 但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封建殘餘佔優勢；
- (3) 因而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地破壞封建勢力；
- (4) 封建制度之主要根源，在於農民附着於土地，而地主得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所以徹底的破壞封建勢力的主要方法，是土地革命。

“這也就是我的見解。

“另外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出來，即自然經濟的優勢是封

建制度的特徵，而中國在漢以降，自然經濟依然還佔着優勢。”（讀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關於中國的封建制度 p. p. 3—4）。

這是“社會科學分析與估計”很難相信的一個“結論”！

然而，不幸朱先生的“論敵”陶希聖先生固然在他自己的方法上對朱先生有個很廣泛的指摘，但始終沒有看到朱先生這個“結論”的一榻糊塗；陶先生可說一拳只打到朱先生的“眉毛”，並不曾打到他的“眼睛”！

我在此地不說，中國封建制度始於何時或開始崩潰於何時，因為，這個會關涉到歷史問題。我卻喜歡在朱先生認為“社會科學”的“結論”中拿些小問題來研究研究。

在朱先生的“結論”中我所發現的：

第一，朱先生承認中國封建制度在十九世紀便已“破壞”了；因為已經“破壞”了的，所以，剩下來的祇有“封建殘餘”；這是我們從朱先生的結論中在邏輯上與以歸納的結果。

第二，在現時中國，這個“封建殘餘”却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佔優勢”！

這個“優勢”是指“數量”而言呢？或是指“質量”而言呢？

抑是還指別的其他而言呢？我以為不管在“數量”上說，或在“質量”上說，或別有其他根據而說；“殘餘”可“佔優勢”，不但在事理上過不去，即在邏輯上也說不通。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既可“佔”了“優勢”，那將不成爲“殘餘”的了！

第三，朱先生認定現時中國革命主要的任務是澈底地破壞封建勢力；若由他的前提，中國封建勢力，只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便已破壞了的“封建殘餘”勢力，那也不外說，澈底地破壞“封建殘餘”勢力乃是“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破壞“殘餘”成爲“革命的主要任務”，那可說是聞所未聞！

第四，朱先生以封建制度主要的根源，是在於地主能夠從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農民在封建制度下是附着於土地，所以，要澈底破壞封建勢力的方法，便是“土地革命”。

可惜，朱先生並沒有向我們明白指出，“土地革命”主要的目的到底是要農民離開於他們所附着的土地呢？抑是使地主再不能從農民身上榨取其所謂“剩餘價值”呢？或者還有其他作用呢？

這裏有個常識問題，即在封建制度之下有否“剩餘價

值”這個問題；假使，在封建制度下，地主對於農民所剝削的是“剩餘價值”，那麼這種“奇怪”的封建社會不但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面，而且建立在“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面；那所謂“自然經濟的優勢”者豈非“自相矛盾”！

我們以為“價值”是個歷史的範疇，不是任何時代都有的；“剩餘價值”也是一樣，牠必需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產物；也只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纔有發展這個“剩餘價值”的概念。朱先生是社會經濟專家，他所研究的經濟理論當然是很淵博，我想這個從封建制度下所榨取的“剩餘價值”，他一定有其理論上的根據(?)嗚呼，哀哉！

土地革命若果只限於解除農民脫離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束縛，這無疑義的，牠的主要任務是“破壞封建勢力”。假使，土地革命可以進到推翻“剩餘價值”的“榨取”制度，那怕，這種土地革命，就不會以“破壞封建殘餘勢力”為其“主要任務”了！

我自從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戰場”上，很不幸的發見了“行尸走肉”的理論之後，竟然欲作三日之嘔！這也是和陳仲子一樣，吃了醜醜之肉以後，又不得不出而一吐之。吐出來的東西僅僅是：



1. “殘餘”可“佔優勢”嗎？
2. “破壞殘餘勢力”可成爲“革命的主要任務”嗎？
3. 封建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榨取農民身上的“剩餘價值”嗎？

這些從胃裏翻出來的髒東西，雖然帶些“酸”味，但我總希望高明的朱先生能夠與以敏捷的化學分解，俾可以使一般人明白，這裏所含的酸素有多少是從“行戶走肉”所反應而來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於上海。

## 文 學 論

夏目漱石著 張我軍譯 實價二元

作者夏目漱石爲日本第一流之文學家，以謹嚴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統觀世界文學，求其共通之原則。立論精確，使讀者不但能明瞭文學究爲何物，其內容如何，且進而引起讀者對於文學作更進一步研究之興趣。此實爲文學研究者及創作者必讀之書。書前有登明先生及徐祖正先生之序文，對此書有真確之評價。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廣州

#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偉章

## 自序

1.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2. 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
3. 中國農村經濟
4. 中國既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怎麼尚有封建勢力呢？
5. 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學批判

## 自序

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現在革命陷於沒有出路，此不是偶然的事情，乃必然的結果。革命的失敗，由於策略的失敗，

策略的失敗由於論理的錯誤。革命理論，基於經濟的分析，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均不免大錯而特錯。或如新思潮派之主張封建經濟，而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則陷於資產階級的意識，而不是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由此一錯誤，遂輕視無產階級革命的能力，不陷於擁護資產階級的右傾的機會主義，即陷於農民意識的左傾的冒險主義，由這一錯誤的結果，以前的革命，是失敗了，現在仍沒有出路。或則如托洛斯基派，把中國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視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資本主義之同一的意義，忽略半殖民地的特徵，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於是在經濟上的理論，固不免有錯誤，在政治上的理論，尤其大錯而特錯。由此一錯誤，遂不免陷於取消主義，右傾的機會主義，革命策略上找不着出路。

中國經濟問題中最大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主張封建經濟者，排除帝國主義而後分析中國經濟，以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此種理論，只算是不懂經濟問題，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知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一樣，仍完全由中國人生產，由中國人消費，其矛盾點，惟在於分配

問題。可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其特殊關係，在經濟上較少，（帝國主義的商業，在經濟上仍有重大的特殊關係）在政治上始有最大的差異。因此而排除帝國主義，以分析中國經濟，以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此不能不算是荒謬絕倫的理論。

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特殊關係雖少，而在政治上的特殊關係，既然很大；倘分析中國經濟，只作統一的普遍的研究，對於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不加以對立的特殊的研究，在經濟上固不免有錯誤，而在政治上，則更不免有荒謬絕倫的錯誤。

著者近年完全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革命，常欲作一翻切實的研究，常覺中國工人政黨，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均不免錯誤，由此在革命上的理論和策略，幾乎完全錯誤。中國革命問題，本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以著者的學識和經驗，本夠不上研究這等重大問題。但所幸者，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只是革命中的一個戰士，完全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從客觀上，作切實的徹底的研究，不拘束於系統和成見。因我具有這種資格，或可適當來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補學識和經驗之不足的缺點。另外，我常覺

得別人錯了，我自己常有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并覺得此種意見，對於革命上，是有相當的貢獻。因此，才大膽地費了兩三月的時間，寫了約近二十萬言的一本書，顏名“麼樣幹”又名“中國革命問題批判”，共計十四章。

第一章“導言”，第二章“世界帝國主義的總危機”，第三章“中國經濟的分析”，第四章“中國統治階級”，第五章“中國小資產階級”，第六章“中國無產階級”，第七章“中國農民和土地問題”，第八章“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第九章“怎樣估計革命高潮”，第十章“武裝暴動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第十一章“中國共產黨”，第十二章“中國共產黨反對派”，第十三章“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第十四章“結論”。

我寫的這十四章，差不多每章都與別人有不同的意見；尤其對於“經濟分析”，“統治階級”，“農民和土地問題”，“怎樣估計革命高潮”，“武裝暴動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這幾個重大問題中，更與別人有不同的意見，更覺得對於中國革命有相當的貢獻。

此書脫稿已多日，惟一時籌不出印刷費，不能出版，只好暫時束之高閣，或如馬克思所說“讓蟲鼠去批判牠”，但完全放棄不理，不獨辜負了我自己研究的辛苦，且對於革命，

也不算忠實，只好先將“經濟的分析”這一章，提前發表，請讀者加以批判。

另外，還有一個聲明，我對於經濟分析這個問題，曾同有幾位富於學識和經驗的朋友，討論了幾次，使我更作深一層的研究，特提出土地問題的研究，他們也幾乎完全贊同我的意見。他們以前是主張封建經濟的，聽說現在將拋棄這種意見，同我研究的方向前進，這也算我的研究，得了一點效果。倘他們更進一步，在政治上的理論和策略，也能採取拙著的意見，那末，在革命的前途，或更有光明的道路。

一九三一，八，二，於上海。

## 1.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中國經濟分析這一問題。以前少有人作澈底的研究，現在始列入議事日程；這一問題，太複雜，太重大，本不是簡單的篇幅，可以研究這個問題的。但此問題，為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一切革命的理論和策略，都建基於此問題，不先將此問題作一個相當的決定，則一切理論問題的研究，均無由着手。且對於此問題的研究，倘稍有錯誤，則其他的一切理論問題，均歸於不正確。故對於此問題的研究，本應慎



重將事，不是簡短的時間和詞意，可以草率從事以研究此問題的。但我所欲研究的問題，必先從此基本問題着手，故不能不先在此作一簡短的研究，至於專門詳細的研究，則俟諸異日。

此問題在中國近一年始有人注意列入研究的範圍，此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故研究此問題者，必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中國現在對於此問題，已成立了兩個判若鴻溝的對立的營壘，即甲方主張中國現在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乙方主張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同處於中國之同一的客觀環境，對於此同一的問題，竟有如此殊異，如此對立的結論，此不能不令人發生疑問，不能不因疑問而從事於研究，以求正確的解決。中國現在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有研究和注意的朋友，仍然對於此問題，抱一種懷疑和偏袒，或各持一是的態度，或謂中國現在當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或謂中國現在絕對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或謂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和封建經濟的兩種混合，同時並立的經濟。除前兩派外，第三派似乎他們對於此問題，尚是一種徜徉不定，莫衷一是的樣子。可知中國一般人現時對於此問題，尚是一種待研究，而沒有決定的態度。此問題關於革命理論，

既如此重要，現尚待研究而沒有解決，那末，宜乎有不少的人，竭全力，用很多的努力，發表很多的意見，來討論此問題。乃自此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以來，迄今雖已一年有餘，然而專門注意研究此問題者，兩方面都只有三數人，於此足見中國人對於革命理論，尚不努力，理論的程度，太幼稚。至於我個人，因革命的責任所在，常留心於此問題，現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的結果，則決然立於資本主義的經濟一方面，認定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了相當的程度，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差不多完全是資本主義在支配全社會的經濟。不過我從資本主義研究的結果，同“動力”的嚴靈峯和著“中國經濟研究”的任曙，他們兩人在資本主義上的理論，又迥然不同。

經濟問題，是一個事實問題，我們應拿事實來證明，由統計材料來證明，惜乎中國統計材料太缺乏，這是研究這個問題最大的困難，雖然缺乏，只要努力去搜集，亦未始無從着手，我此時尚沒有很多的工夫去搜集，只好憑我手中所有的書報等刊物，關於此問題的材料，以作我研究的憑藉。

起先，我仍如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那樣的辦法，將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對比，究竟看那一種的程度佔優勢，

我覺得此方法最好，可以使人一目瞭然，中國究竟是一種什麼經濟。

帆船足以代表封建經濟的交通工具，輪船足以代表資本主義的交通工具，而中國歷年的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一八七五年，為八五與一五之比，至一九二六年，則為九八與二之比。(註一八)可見資本主義摧毀封建經濟之力甚速，交通方面的封建勢力，只殘留百分之二，幾已達於零點了。我們又以錢莊代表封建經濟，銀行代表資本主義，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錢莊與銀行投資本的百分數，一九一二年，為六八與三二之比，至一九二〇年，則為三七與六三之比。(註一九)相距僅八年，封建勢力幾零落了一半，而資本主義則增大一半，兩個勢力的互相消長，更為迅速。我們又以土絲代表封建經濟，以廠絲代表資本主義，而一九二八年，各口生絲出口的百分比，土絲僅佔百分之五，而廠絲和半廠絲則佔百分之九五。(註二〇)出口絲業中，仍為資本主義所全佔，封建經濟將陷於零落的地位。我們又以工廠產品，代表資本主義，手工業產品，代表封建經濟，根據近年四種重要工廠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經過全國各省區海關的國內貿易比較，一九二五年，為九十與一十之比，一九二

六年，爲九八與二之比，一九二七年，則爲九九與一之比。  
(註二一)此於工業中，證明封建經濟的零替，如江河日下，僅二三年，由百分之十，下落而達於百分之一，即謂已達於消滅的地位，亦無不可。此外又可以驛站信行，代表封建經濟，以電報郵政，代表資本主義，現在驛站信行，已完全消滅，交通機關，已完全被資本主義佔領矣。

(註一八)任擇著：中國經濟研究，p. 140.

(註一九)同上註，p. 141.

(註二〇)同上註，p. 143.

(註二一)同上註，p. 145.

我們又由各種經濟組織的統計材料，檢查一下，一九一九年，中國進出口有一二一五一隻輪船，載一〇三，八六三，五八一噸，有鐵路二七線，二萬一千二百餘華里。(註二二)在一九二〇年，有銀行二三七家，七九八個支行，二三六，八五二萬盧布資本。有四，三八一個農業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資本。(註二三)鑛業中有資本一萬四千四百萬元，生產一千一百餘萬噸。(註二四)全國有大小工廠一九七五家。(註二五)紡績廠有一三二家，四〇二百萬資本，紗錠四〇三二千錠。(註二六)全國共有產業工人二，七五〇，〇〇〇人。(註二七)我們

把這些統計的數目看一下，雖不能說與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同日而語，然而亦可配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註二二)商務印書館編，中國年鑑。

(註二三)動力第二冊，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註二四)新思潮第五冊，向省吾著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註二五)工商部編全國工人生活狀況及工廠生產統計報告——此報告不確——著者。

(註二六)同註二三。

(註二七)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

以中國為封建制度，乃是一九一二年以前資產階級的革命黨，對滿清所呼的口號；推翻滿清以後，北洋軍閥，襲滿清的封建政權，於是民粹派又以此口號，稱呼北洋軍閥。但是我們現在，應該把現在的生產關係與二十年前的生產關係，拿來比較一下，究竟是怎樣，是否有不同的狀況呢，若果這兩個時期仍是一樣的，絲毫沒有變更，那末，我們很有理由，說中國現在，仍然是封建經濟的社會。倘現在的生產關係，已大起變化，工業已大有進步，那末，我們仍追隨民粹派的資產階級的尾巴，謂中國現在，仍是封建經濟，那末，無產階級，豈不是受了民粹派的欺騙，故意隱蔽資本主義，使無

產階級沒有立足的基礎嗎？所以這一個問題，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問題。

現在我且把一九一二年以前和最近年間，兩個時期的生產狀況，拿來比較一下，看究竟是怎樣，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僅有工廠一〇一家，至一九二九年，上海共計有大小工廠一七八一家。(註二八)僅十八年間，上海的資本主義勢力，增大了十餘倍，幾乎每年增大一倍，這等突飛猛進，一般封建經濟學者，安能知道呢？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僅有絲廠二〇家，至一九三〇年，則增加到一〇七家，(註二九)僅十九年間，增加了八倍以上，幾乎每兩年增加十分之五。浙江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僅有絲廠一家，至一九三〇年，則增加到二五家，(註三〇)此十九年間，增加二四家，每年增加一倍以上。無錫在一九一三年以前，僅有絲廠六家，至一九二九年，則增加至四五家，(註三〇)此十七年間，增加三十八家，每年增加兩倍以上。由這樣看來，現在的資本主義勢力，比之於一九一二年以前，增加了十幾倍或幾十倍。以前猶可謂資本主義為薄弱，難道增加到十倍以後，仍可謂為薄弱嗎？二十年前的孩子，二十年後仍可稱他為孩子嗎？一九一二年的皇歷，怎能和今年的皇歷同一樣呢？一般機械論者流，固執着一個封



建形式，至死不變，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封建形式，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已經起了絕大的變化，已由量的變化，達於質的變化，已在封建的廢墟上，發展起來壯大的資本主義了，一般封建經濟學者，苟稍留心考察一下，即可大覺大悟了。

(註二八)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312.

(註二九)同上註，p. 165.

(註三〇)同上註，p. 166.

(註三一)同上註，p. 167.

現在爭論中國是否資本主義的國家，似若沒有一定的標準，我們既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即以馬克思的文件為標準，想來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必不致否認這個標準。

驚駭世界資本主義的第一聲，為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建基於共產黨宣言，資本主義的死刑，定案於共產黨宣言。所以列寧常說“我們應該重復的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共產黨宣言為基礎”。(註三二)可見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主義上的價值之重要了。我們現在，且根據共產黨宣言，判斷中國現在，是否資本主義的社會。共產黨宣言，本是以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為對象的，不是以某國的資本

主義爲對象的，至少，是指當時英法德美等國家，爲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自然是資本主義創始的國家，法國次之，德美又次之，我現在且根據中級的法國，與現在的中國，來比較一下，看中國現在究竟是否資本主義的國家。

(註三二)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p. 101.

共產黨宣言草於一八四七年，看當時法國的工業究竟是怎樣呢？我且引一段歷史來證明一下，“法國在一八一五年後，工業革命，始有明顯的跡象可尋，拿破崙雖有提倡工業及保護工業的舉動，然而成績不顯，等到他失敗的時候，全國不過亞爾薩斯地方，棉廠中有一付機器而已。至一八四七年，全國蒸汽機有五千具，棉花的消費，增至五倍，同時紡紗機有十萬多架，紡錠有三百五十餘萬支。到了一八四八年，工業的大都市，已林立於法國，僅巴黎一城，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其餘里昂馬賽列里等，皆著名的工業都市。從此以後，工人逐漸地要組織工黨，什麼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也依次發生了。(註三三)

(註三三)鄭繩石等編譯：法國革命史下編，p. 31.

現在拏法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來同中國比較一下，法國在一八四七年，工業始發展，僅有蒸汽機器五千具，紡錠三

百五十餘萬。中國此時，既不止五千具蒸汽機，而紡錘則已超過四百萬以上。一八四八年，法國最大的工業都市，如巴黎，僅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而中國此時，在上海則有八十萬的工人，其他四十萬以上者，尚有幾省。（註三四）法國此時始有加薪減時，組織工黨和同盟罷工等運動。而中國則過去十年以前，即有此種運動。由此看來，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的形態，無一不遠超過於一八四七年的法國。共產黨宣言已大聲急呼地，認定當時的法國，即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喚起法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八七一年，法國無產階級，果然根據共產黨宣言，起來反對法國的資產階級，成立巴黎公社。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程度，既已遠超過當時的法國，而猶謂為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這還不算是反馬克思主義嗎？放到了今日，猶謂中國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就不客氣地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簡直是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學者的欺騙。

（註三四）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

或謂一八四七年的法國，雖只有紡錘三百餘萬，而人口亦只三千餘萬。今中國雖有紡錘四百餘萬，而人口則有四萬萬，然則中國不能與法國相比，即中國尚沒有發展到資本主

義的國家。此是靜止的機械論的觀察，不是發展的辯證法的觀察。不知道技術因科學的進步而進步，現在的技術，比之於一八四七年的技術，至少必進步數十倍，今姑且以十倍計之，則中國現在四百萬的紡錘，可以當法國當時的四千萬。中國現在的人口，比當時的法國，雖多十倍，而技術的生產力，亦增進了十倍，兩相比較，恰恰相當。而當時的法國，馬克思既認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則現在的中國，凡馬克思主義者，亦應肯定地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倘反對此肯定，即算是反馬克思主義。且吾人爲革命理論，在階級的對比上，而測定資本主義，當時法國的資本主義，如紅日東升，即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大，無產階級的力量小，現在的資本主義，如夕陽西下，即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小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因這種關係，即使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不超過於法國，只等於法國，或不及法國，亦不妨肯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並且當時的蒸汽力，大概用之於輕工業者多，用之於重工業者尙少，中國現在，重工業雖不發達，然比之於當時的法國，總算發達得多。況中國現在，交通方面，鐵路，輪船，電信，電話，飛機等，更要發達得多，或爲當時的的法國所沒有。由這一方面看來。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之

於當時的法國，更要充實完滿得多，更足以稱為資本主義的國家而無愧。

即單以輕工業來說，而現在同一的技術，在中國方面，比世界各國的生產力，要大四倍，我且找一個統計來證明。

一九二八年，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紗錠與用花數量的比較：(註三五)

(註三五)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47.

國 別	錠子		每年用花數量	
	千錠	百分比	千包	百分比
英 國	57,136	35	2,909	11
美 國	35,542	22	5,770	27
德 國	11,153	7	1,585	6
法 國	9,770	6	1,180	5
印 度	8,700	5	2,094	8
蘇 聯	7,311	4	1,864	7
日 本	6,272	4	2,541	10
意 大 利	5,189	3	954	4
捷克斯拉夫	3,663	2	546	2
中 國	3,504	2	2,016	8

其	他	16,860	10	3,141	12
合	計	165,103	100	25,240	100

“這裏要根據整個統計，特別是後半截，每年用花的數量，來認識牠在世界方面的意義，我們看中國紡紗錠子，在全世界總錠數中，不過百分之二，而牠每年用花的數量，竟佔全世界用花總數量的百分之八，這就是說旁的國家，一份錠子，只用一份花，中國一份錠子，每年用四份花，比別人多四倍”。(註三六)由此看來，中國四百萬錠子，要當世界其他國家的一千六百萬錠子，要當一八四七年法國的一萬六千萬錠子，即是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單由輕工業說，比一八四七年的法國，要增高四倍以上，然則當時的法國，既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現在，怎麼又不能算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呢？我們不知封建經濟學者，有何種理由，要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註三六)同註三五，p. 148.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不過百年的時期”，然則在一八四七年以前一百年，即十八世紀中葉，已是資本主義時代了。但蒸汽力用之於紡紗機，在一



七八五年，法國在拿破崙失敗時，尚只蒸汽機一架，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開始於蒸汽機的生產。因生產力的變化，包含有技術和勞動本身，勞動力組織的變化，即是生產力的變化；由手工業變為手工工廠，採用分工制度，即算是生產力的變化，資本生產的萌芽，故手工工廠的生產，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上，亦佔有一個地位。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開始於蒸汽機的發明，在蒸汽機的發明以前，已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所謂歐洲的資本主義時代，不開始於馬克思草共產黨宣言的時期，在發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資本主義的時期。我們在上面以發佈共產黨宣言的時期，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標準，已算是退一步的標準了，已算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了。以中國來說，採用蒸汽機的生產，雖還不到一百年，然而手工工廠的生產，則在數千年以前，即算是數千年以前，已有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不過手工工廠，雖能促進生產力的進化，但進化的程度，很有限度，終不能戰勝經濟上的封建勢力，必待富於生產力的蒸汽機，普遍地用之於生產，始能戰勝經濟上的封建勢力，始算是勢力壯大的，規模完備的資本主義生產時期，故現在的中國，無論如何說，終不能不算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時期，不能不算是一個資

本主義的國家了。

中國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大概都自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倘使對於現在的中國，他主張資本主義嗎？抑封建經濟呢？惜列寧不在世了，但他在一八九八年，因民粹派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註三七)乃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證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駁斥民粹派。我們現在以列寧著此書後的俄國生產狀況，同現在的中國來比較，又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一個證明。“生產集中，就是俄國最近幾十年中，資本主義之重要的特徵，……據一九一二年的正式統計，僱用五百至一千工人的企業，佔工人全數之15.1%，僱用千人以上的企業，佔37.5%，不滿四百人的企業，只佔20%”，(註三八)“千人以下的企業，在中國紡織工業的數目中，是無足重輕的，中國的紡織工業，僱用千人以上的，約佔80%有多，而二千工人以上的企業，又比二千以內的企業，更佔優勢。這同上面俄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戰前的狀況，很顯明地表示出生產的更集中”。(註三九)“論煤之採掘，中國現時的數量，比一九〇五年時的俄國，要高得多，五金製造工業的發生，還不久，可是已經發展到很複雜企業的程度了。例如造船事業，比戰

前的俄國，要發達得多，中國五十三個造船廠中，有幾個，……毫不讓於歐洲的造船業。軍械工業，亦佔很大的意義”。(註四〇)

(註三七)俄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智識分子，因俄國是農業和農奴制度的國家，常有農民的暴動，因而偏重農民運動，忽視工人無產階級，故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請參觀包澂夫所著俄國黨史。p.9 至 128。

(註三八)萬譯：俄國大革命史，p. 13至 14。

(註三九)任著：中國經濟研究，p. 304。

(註四〇)盧實斯坦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見同上註p. 305。

上面這幾段文，已十足地證明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列寧反對民粹派之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還要高得多。列寧當時尚且竭力證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反對民粹派之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現在的列寧主義者，乃欲主張封建經濟，而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不是顯明地在反對列寧主義，而自陷於民粹派的覆轍嗎？放在今日，資本主義已大發展了的中國，而猶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的確是不自覺地陷於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而立於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的地位了。

“電氣工業的數目，於一九一三年，爲十二個，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100個（1927年增至231個——任注）每年平均增加33%。……有兩個製電池的工廠，（是電工業最精細之部門）不僅供給大部分國內需要，並且做出口品。

“在製造工業部門中，我們亦可看見許多企業，按其大小與技術的設置，並不讓於歐洲。……秦皇島所設的玻璃廠，用傅爾落的機械製法，製造玻璃，爲全世界最大而且最好裝置的工廠。上海電氣廠，亦算世界大電站之一。

“宏大的商務印書館，按其技術的設備，不讓於歐洲最好的印刷工廠，而規模且超過之。

“按照紡織業與其中設置看來，現時的中國，比戰前的俄國爲高，每個工廠內工人的數量，（約二千）比歐洲任何國家爲高。

“在大部分的大工廠裏面，機器都是由電轉動的，就在德國英國的紡織工業，還遠不能如此的普遍，這樣看來，中國的紡織工業，（棉織與絲織都是如此）就在國際範圍內，也已是赫赫的數量了。

“大部分工廠的設備，完全都是用新式英國機器的，而在最近幾年來，則紡織機器的輸入，美國差不多已執牛耳

了。”

“同樣的例子，亦可由別的生產部中引來，這些都是彰明較著的，表示出現代的技術，已將中國變成最新式的新工業化的國家，而驟然躍過許多過渡的時期”。（註四一）

（註四一）同上註四，p. 305——308

盧氏在前面所舉的幾種生產，不獨超過戰前的俄國，並可與歐洲先進國的工業並駕齊驅，或更超過之，自然中國不能與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帝國主義，同一程度，然而因原料和地理的關係，有幾種生產，進步較快，這也是國際經濟狀況中常有的現象。但因此，更足以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塞主張封建經濟的口了。

或以爲中國資本主義，是在城市工業，城市中已發展了資本主義，這是事實，無人否認，即主張封建經濟佔優勢者，亦承認城市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潘東周君說：“中國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工業革命的過程，實已經開始，經過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及近幾年的變動，中國工業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確已有相當的發展，並且在農村中，已經孕育了他的種子，就整個中國經濟關係來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了領導的地位，整個發展的趨勢，確已是走向資本主義的

過程”。(註四三)以潘君這一段話來說，差不多已完全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了，與他的全篇文意，完全矛盾，他的全文，是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偏在農村經濟方面，所以中國農村經濟是否受城市資本主義的領導，是否亦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本問題的關鍵，或主張封建制度經濟，或主張資本主義經濟，兩方面的爭點，完全在此，這個問題，稍複雜一點，且待後面去作詳細的研究。

(註四二)新思潮第五卷，潘東周著：中國經濟的性質。

## 2. 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

此外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即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區分？和帝國主義，是否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是否維持中國的封建勢力？因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問題，亦為中國現在經濟問題上發生極大爭論的問題，茲分次討論於下。

第一，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區分。

經濟無國界，自資本主義降世以來，即將各民族的銅牆



鐵壁，完全衝破，將整個世界，構成經濟界之有機的整個結合。任何一個地方，經濟問題，都可影響到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先由一民族的結合，更進而為全世界的結合，如國際中各大托辣斯，就是這種結合，此為帝國主義的特徵。此時各個資本家，各國的資本家，各欲多爭剝削剩餘價值的關係，彼此常發生競爭和矛盾，然又因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性，將使世界經濟關係，成一整個的聯合。此乃資本主義發展中必然的矛盾。因此，無產階級為對抗資產階級，亦結合為整個的國際組織，所有世界上的無產階級，都是同一個階級的人，同一個團體的人，所有世界上的資產階級，都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某一個地方資產階級，只是無產階級整個枷鎖的一環。所以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由無產階級看來，當然無優劣和主客的區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即中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若干成分的資本主義，即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了若干成分。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若干成分，中國無產階級亦必發展若干成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資本主義，中國一切經濟關係，都要發生變化，與民族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變化，無絕大的差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本

主義，發展了若干成分，中國封建經濟，亦必摧毀到若干成分，外國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剝削勞動階級的方法，都是同一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以無產階級對於牠們，無所用其區分，斤斤然區分外國資本家如何，本國資本家如何，此乃資產階級學者的事件，愛國主義學者的事件，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應有的責任。若無產階級革命者，完全把帝國主義除開來研究中國的經濟，此不啻為資產階級在服務，故主張不分中外資本主義，作統一的研究，在原則上是對的。

不過不區分，只是相對的不區分，不是絕對的不應區分，在有些時候，亦有區分的必要。第一，資本家剝削的剩餘價值，照例分割為蓄積或增殖資本，加入複生產，和個人消費的兩部分。若資本是外國人，必將剩餘價值的全部，拿到外國去；即或擴大再生產，將增殖資本的一部分，留在中國，加入再生產，然而個人消費的部分，則必定拿到倫敦，巴黎，柏林，紐約，東京等地方去消費，社會的總生產，分生產工具的生產和個人消費的生產兩部分，外國資本家，既在外國消費，此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上，不無影響，與本國資本家要發生絕大不同的影響，此猶從經濟方面說的。若由

政治方面——階級的成分方面去看，因中外資本家的差異，在政治上，就要發生非常的差異，由這一差異，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迥然不同了。

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的國家上，雖可以由外交的手段，掌握半殖民地國家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但因為半殖民地的國家，為半獨立半主權的國家，帝國主義只能間接地統治，外國資本家決不能直接加入半殖民地國家內去管理政治權，所以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雖已充分的發展，倘外國資本家佔重要和多數的成分，那末，民族資產階級的能力，必異常薄弱，不能獨立管理政權，必與帝國主義妥協，聯合封建勢力，以統治國家。因此，我們在經濟的研究上，雖可不分土資本和洋資本，但在政治的觀察上，不能不注意外國資本和本國資本的區分。

必先將外國人投資於中國的數量，有一概括的觀察，和民族資本相比較，究竟孰強孰弱，然後根據這種結論，以分析中國階級，質言之，測量資產階級的能力，始不致發生錯誤。茲將帝國主義投資於中國的數量及種類，概括地分類地統計於下：——

(1) 列強在中國鐵道借款的數目如下：

國別	款項(百萬)
英國	123
法比	97
日本	59
德國	48
美國	19
荷蘭	13

若把割讓的鐵路加上來，則各帝國主義在中國鐵路方面的投資，實為：

1. 英國	123 + 廣九路的價格16 = 139
2. 日本	59 + 南滿鐵路的價格220 = 279
3. 法比	97 + 滇越鐵路的價格24 = 121
4. 德國	48 + ..... = 48
5. 美國	15 + ..... = 15
6. 荷蘭	13 + ..... = 13
總計	= 615 百萬元

(2) 中外銀行資本：

	額定資本	實在資本
外國銀行	910 百萬元	682 百萬元

中外合辦銀行	150百萬元	104百萬元
本國銀行	375百萬元	158百萬元

(註四三)新思潮第五冊向哲晉著：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3) 帝國主義投入電話電報的資本：

國別	經營數目	款項
日本	4	45.092
英國	3	210.548
德國	2	47(註四四)

(4) 帝國主義與中國經營鐵業的比較：

國別	資本(百萬元)	每年產額(百萬噸)
中國	50	7
英國	22	7
日本	77.5	4.5(註四五)

(5) 帝國主義在中國關於重工業的工廠：

工廠種類	數目
造船廠	22
蒸氣機關	22
鋼鐵及鋼鐵細工	9

此外尚有許多輕工業尚未加入。

至於紡紗業，日本的投資爲200,000,000元，英國爲20,000,000磅(註四六)(中國130百萬元)

(註四四)助力第二冊嚴震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註四五)同上四三。

(註四六)同上四四。

我們把上面一切統計數目看一下，鐵路十之八九是外國資本建築的，現在仍大多數操於外國人的掌中，銀行資本，外國佔四分之三，中國只四分之一，(註四七)電政亦幾乎全屬外國資本，鑛業的外國資本，佔三分之二，中國只佔三分之一，重工業亦幾大半在外國人的掌中，輕工業最重要者爲紡織，亦是外國資本佔多數，中國只在三分之一。此外如交通方面的輪船，自然大多數是外國資本，而每年商品輸出入三十餘萬萬元，亦大多數是外國資本，總計的結果，除外國資本而外，中國資本究竟幾何，所以李立三也說：“因此中國工業多半在帝國主義手裏，如海外航業，完全爲帝國主義所壟斷，內河航業，帝國主義的資本，佔四分之三以上，鐵路純粹由外資直接建築者凡五條，此外多半由政府借外資來建築的，純粹由本國資本家建築者，僅京綏路一條。”(註四八)這也證明外國資本佔最多數，民族資本僅佔一小部分，民族



資本既如此之少。民族資產階級的能力究有幾何呢？除大多數作帝國主義的買辦而外，中國獨立的資產階級，究有幾何呢？所以中國資本主義固然發展了，且已有初高度的發展了；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當然是同時同程度發展的，因此，中國無產階級亦發展了，且已有較高度的發展了。至於中國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均極微弱，此其所以必須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始克暫時苟且地統治中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無產階級發展了，而資產階級則未發展，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大矛盾，此種矛盾，即為半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不明白此種特徵，在階級分析上，定要發生絕大的錯誤。

(註四七)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說：“並且全國一切形式的經濟之最高統治，都在本國的一萬五千萬元以上銀行資本，依賴外國的五十八萬萬元以上銀行資本的支配之下”。

(註四八)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p. 1.

第二，帝國主義，是否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以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為目的，不願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展資本主義，以減少牠的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帝國主義常將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關稅權握着，不使施行保護關稅，即為牠阻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故謂帝國主義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為無理由。不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法則，常違背人類的意志而獨立進行，故馬克思說：“具有牠的生產交換，財產關係的近代有產階級社會，就是惹起這般大規模生產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好像一個術士似的，他念咒召來了魔鬼，現在却不能鎮服陰間的勢力，數十年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產力，對於近代生產方法，對於有產階級所賴以生存和統治的財產關係，謀叛的歷史”。（註四九）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最後階段，不能完全受帝國主義的指揮，使之進而進，使之退而退，不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此帝國主義之意志也；然中國資本主義的大部分，均由帝國主義所發展，此則非帝國主義的意志也；這都是帝國主義發展的矛盾。帝國主義欲運輸商品和原料，不能不建設交通，建築鐵路，採煤及鐵路應需的材料等工業，即應時而起，所以李立三也說：“中國工業的發展，完全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帝國主義要輸入他們的商品，所以竭力發展中國的交通工業，如鐵路輪船等，帝國主義要搜集中國的原料，所以投資鑛山，並製造原料的大工廠。”（註五十）這也

是說由帝國主義的侵入，發展了中國的資本主義。並以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常以輸出資本為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和工資，都比較低廉，投資開發工業，可以多剝削剩餘價值，資本家常爭先投資於殖民地，故金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此時不惟不阻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乃反常欲助成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現在各帝國主義，尤其美帝國主義，黃金滿庫，無地投放，常欲投資中國，開發實業，但牠們對於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稅制度，仍又不願放棄，這又算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大矛盾。

(註四九)共產黨宣言。

(註五十)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p. 1.

第三，帝國主義是否維持中國封建勢力，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維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封建勢力，藉以維持牠的商品市場和原料地投資地的安全，此乃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一貫的政策。中國封建軍閥，常受帝國主義的維持，這是彰明較著的事實，中國軍閥的循環戰爭，為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阻礙，這尤其是的而且確的事實，故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雖不是直接有意地阻礙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間接無意地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至於帝國主義維持殖民地的封建勢力，法人德列易說的最詳，他說以前英法對於非洲等地，常以武力侵略，殊常經數年的戰爭，仍收不到美滿的效果，最後始採取和平侵略的手段，即維持本地的封建勢力，為最良的方法，現在各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都是採取的這種方法，茲將他的話錄一段在此，以作證明：

“在亞洲的國家裏面，沒有某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然而只要不侵犯宗教的迷信，侵略是極易成功的。

“開始，歐洲人經營商業，以西方的珍奇的工業品，交換羊毛；其後，欲使之易於交易，乃建築道路和鐵路。設他們建議自己投資，則此種計劃，更易成功；每種借款或特許的成立，另外，對於大臣，官吏和有關係的人，應附以贈品，——包含於發行費內。

“自然應當支付利息，因此，歐洲人建議設立關稅，在他們自己的商品上，征收捐稅，將收入的盈餘，歸之於君主，所以他也樂於承諾此種制度。設關稅仍不足以支付利息，那末，就應該增加租稅，由氏族繳納；但是，總督經手征收，應留一部分作他的報酬。設氏族要抗稅或反叛，那末，歐洲人

就供給槍彈於君主，以鞏固君主的權力。至於蘇丹，只要他願意，人們將以大砲和開花砲，替他組織衛隊；并供給指揮官，指揮兵士，巧妙地使用槍械。設君主偶然表示了一點獨立的意志，那末，迅速的軍事的遠征，同宮內的陰謀相結合，即足以由他的兄弟或姪兒，即代替了他。君主在歐洲人的新組織裏面，不過為一個副署畫諾的人罷了。

“於是歐洲人不知不覺地，即成為財政，行政和政權的主人了。但他們在表面上，絲毫沒有改變舊有的組織，人民的風俗和習慣，以暴力侵略殖民地，常屬不可能，因而遂代替以和平的侵略”。（註五一）

（註五一）德列易著：兩個歐洲，p. 150—151

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原在於維持商品市場和原料地投資地的安全，在中國封建軍閥的混戰中，其結果反陷於不安全，這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矛盾。

綜觀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阻礙的時候，亦有助長的時候。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固大部分為帝國主義的資本所發展，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程度，尚不止此，倘順其自然發展的程度，無所阻礙，必然比今日高得多。資本主義侵入中國，與日本同一個時代，然日本已發

展到極高的程度，最後階段的金融資本主義，能與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並駕齊驅，比之於中國，不管有上下床之別，這是因為日本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盡其自然的能力，向前發展之故。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幕，與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同一個時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發展的程度，不及現在的中國，此由封建勢力阻礙之故。十月革命後，澈底肅清封建勢力，實行新經濟政策，和五年計劃，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為任何資本主義先進國所不及。故欲使中國生產力盡量發展，必澈底推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質言之，必工農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產力，始有任其自然的生產力盡量發展的可能。

### 3. 中國農村經濟

我們現在來討論農村經濟，此為中國經濟問題爭論的中心點，主張資本主義者，謂城市資本主義可以支配農村經濟，故謂城市即發展了資本主義，則農村的生產關係，亦必定要發生變化。主張封建經濟者，則將中國與國際分開，將農村與城市分開，似若這兩方面，築的有萬里長城一道，彼此絕對地互不侵犯，互不發生關係；帝國主義雖已侵入了，



而農村的封建經濟如故，城市資本主義雖已發展了，而農村的封建經濟如故。究竟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且請馬克思來證明，他說：“我們從此可以曉得，做資產階級基礎底生產和交換的手段，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的；這種生產和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所由生產及交換的狀況，就是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的組織，簡括些說，就是財產的封建的關係，便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相適合，牠們便變成了許多的障物，牠們便不得不崩壞，結局果然崩壞了。”（註五三）我們這裏應注意，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狀況，即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組織，一定要崩壞，決不是城市資本主義發展了，農村的封建經濟，仍然可以保存。馬克思又說：“資產階級現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地開拓了交通的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的牽入文明隊裏，牠那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砲，中國城壁，為牠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為牠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為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生產方法，而將所謂文明的輸入到牠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資產階級，要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註五四）我們在此地應注意

的，即是帝國主義的商品，是猛烈的大砲，中國的城壁，已被牠摧毀，牠努力於這種摧毀的工作，已過一世紀了，中國的封建經濟，仍安然無恙嗎？帝國主義侵入的地方，資本主義的文明，也要跟着侵入，也要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國資本主義是這樣發展了的，中國資本主義由這樣的發展，將近一世紀了，猶可說中國資本主義尚沒有發展嗎？

(註五三)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

(註五四)同上。

由上述的意思看來，凡資本主義發展的地方，就要摧毀封建經濟，凡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的地方，也要摧毀封建經濟，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在一世紀以上，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亦將近一世紀，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已到了較高的程度，而猶謂為封建經濟的社會，這當然不合於邏輯，但是，封建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怎樣區別呢？我們必先知道了這種區別，然後就容易知道中國究竟是那樣的經濟了。

馬克思說：“區別經濟的各時代，不在於生產，而在於由甚麼勞動的工具，怎樣生產，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尺度，並且也是在那社會關係中間，完成勞動的指示器”。(註五五)由這樣看來，區別社會的尺度，在於勞動工

具，所以馬氏又說：“用手推的磨子，產生了封建主的社會，用蒸汽的磨子，就產生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註五六)然則蒸汽力的發明，就算是一件劃時代的事件，未有蒸汽機以前，為手工工場時代，尙未完全脫離封建社會的時代，自有蒸汽機以後，就是工業大革命的時代，即近代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馬氏又說：“於是又有蒸汽及機器出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了手工業的地位，富豪的實業家，產業的總首領，近代的資產階級，便把產業界的中等階級降伏了”。(註五七)這更顯然以蒸汽機的大工業，為資產階級的社會，手工業的中等階級，為封建社會，自有了蒸汽機的大工業，即有了資產階級社會，有了蒸汽機的大工業，即代替了手工業，即是代替了封建經濟，有了有產階級，即降伏了中等階級，即降伏了封建經濟的生產者。中國現在蒸汽機的大工業，已達到如何程度，手工業消滅者幾何？幸存者幾何？能於此作一明瞭的觀察，中國究為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即可容易判別了。

(註五五)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

(註五六)哲學之貧困。

(註五七)共產黨宣言。

封建社會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經濟，即是自然經濟，非商品經濟，所以恩格斯說：“中世紀社會，細碎的小生產，生產機關適於個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為生產者自己所佔有，生產是為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才拿去交換。這個剩餘，用諸交換，就成了商品。不錯，工匠自來即以為交換而生產為職業，但他們大部分，也在直接供給其消費，他們都有一小塊土地，（田地和園圃）他們放家畜於公共的山林內，他們由此採伐供燃料和建築的木材。婦女則紡紗織布等等，可見為交換的生產，商品生產，還在幼稚時代，因此交換有限，市場狹小，生產形式，是停滯不變的。每個集團，在其內部，為着排除其他集團之生產品的生產，組織起來；鄉村中則為馬克，城市中則為行會”。（註五八）這段話的意思，是怎樣呢，謂封建社會的生產者，都是以供自己及領主的消費為目的，生產的東西，既不是商品，以供他人的消費，自己的消費，亦不是依賴他人的供給，必到了有剩餘的時候，才拿去交換，才是商品，但是，亦只很少的一部分，即手工業工匠，雖以交換為職業，然自己消費的東西，亦多由自己生產，所以由他生產的商品，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市

場狹小，有行會的限制，這就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組織。

(註五八)恩格斯著：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把中國農村經濟看一下，是否還是自然經濟，是否被商品經濟侵入，農村中所消費的商品，又是否是手工業的生產品呢？現在中國農村中，不獨火柴，煤油，縫衣針等，完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去供給。尤其是衣著的東西，更差不多完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去供給，所以中國近年紡織的發達，有一日千里的速度；以四川而論，重慶萬縣是大商埠，此兩地均以棉紗商業為第一位。十年前，還可在農村中的農人中，見着種棉花來供自己紡和織的事件，近年則絕少見着這等事件，即或由自己織，而所用的棉紗，必係資本主義的生產品；而織布的工具，雖不免有用舊式的，然也有很多是採用受過資本主義洗禮的新式工具。人類的消費，為衣食住三大項，農人的衣著一項，可說已完全受資本主義的支配。食物自然是農人的來源，然有時也要由市場供給；住室雖常由農人同工匠建造，然也常要需用由機器生產的洋釘。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對於農人的衣食住都侵入了，可謂在農村經濟中，無孔不入了。

除貧農而外，地主自然不消說，中農和富農的男女，都

要穿機器襪子，洗臉要用洋磁盆，洋手巾，肥皂牙粉，牙刷子。出門要用洋傘，有馬路的地方，要坐汽車；有疾病時，也有用西藥的。這一切的情形，尚不可以枚舉，總而言之，現在中國農村自給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完全傾覆，完全由商品經濟代替，完全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故中國現在的農人，非與市場發生關係，即不能生活，不能再生產了。

據金陵大學調查江蘇山西等省，二千餘農家，平均每一家庭，由市場購買各種物品的百分比，(1922——25年)衣服為百分之八一·七；器具設備為百分之九五·一；雜項為百分之九九·二；個人嗜好為百分之九九·七；生活改進為百分之百；醫藥為百分之百；燃料為百分之一一·三；食物為百分之一六·八；總平均為百分之三四·一。(註五九)由此看來，農人的消費，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市場的商品來供給，除燃料食物兩項而外，十分之九的消費物品，都是由市場購買；所謂農村的自然經濟，尚殘存幾何呢？“中國各地農村，如上表的調查，總計由市場購買的份量，在百分之三十四點以上，比起歐美日本的現在，自然相差還遠。美國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的平均數，為五七·二%，日本在一九二四年，為五六%。但我們要知道美日是帝國主義，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來為



革命而測驗資本主義之發展，不應以帝國主義為標準，肯定我國目下還是一種自給的農業。只有資產階級的學者，才想使資本主義發達完全，才醉心於美日的前途；而事實上，在江浙等經濟中心區域，近年農村經濟生活，由市場購買的份量，亦已達到美日平均的程度，更可使我們認定中國農村生活，已發達到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很高程度呢？”（註六〇）

（註五九）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88。

（註六〇）同上，p. 191。

以上是由消費方面說的，現在再由生產方面看一下。農人的生活 and 再生產，都須由市場的商品來供給；但市場的商品，不但具有滿足人類需要的使用價值，牠同時又具有交換價值。農人欲取得商品，必先支付交換價值，質言之，必須支付一定的貨幣數量；然則農人欲取得商品，必先取得貨幣；欲取得貨幣，必先生產有使用價值的商品，與具有貨幣而欲取得此有使用價值的商品相交換。故農人此時，不獨消費方面，成了商品化，而生產方面，亦不得不商品化，以受資本主義的支配。於是農人生產的目的，大部分都不能不是為供給市場而生產，為滿足他人的需要而生產。他們每年牧畜很多的牛羊，種植很多的桐子，桑樹，茶樹，麥子，荳子，棉，蔗

等等，都是爲供給帝國主義原料而生產，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取的原料，不下數百種，都是由中國農人，視其土之所宜而生產的。農人的此等生產，完全不是供給自己的消費，完全是供給市場的需要，質言之，完全是資本主義化的生產。

中國農村中，不獨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生產和消費都成了商品化。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亦日漸發展，中國有一一二八個農業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資本，此固爲資本主義生產的標點。而農業機器的輸入，一九一三年，爲一二，〇〇〇兩；一九一六年，爲二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〇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一年，爲二，〇〇〇，〇〇兩。（註六一）此等數目，每年都有增加，即證明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每年都有進步。

（註六一）動力，第一期，嚴靈峯著：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至於中國農業經濟中，很多地方，都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已實用蒸汽，甚至氣電摩托與電抽水機來灌溉了。在常州一帶，用電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約有稻田四萬餘畝。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機，以煤油和石油爲動力的抽

水機，此種抽水機，在五年前，已開始試用，一九二六年，僅在滬寧路一帶，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幾個工廠，差不多完全為此種抽水機而生產的。

“此外農業企業，亦日漸發展，舂米機器，多係英國產的。在揚子江一帶，尤為推行。產棉區的榨油廠，日益發展，產茶區製茶企業之普遍，沿海一帶，罐頭和煙草企業之日漸發達，都是不可置辯的事實。

“如販賣商人，經營農業的經濟，在產米區最為發達，蕪湖一縣，為中國米糧出入最豐富的區域，那裏有幾十個代辦的商號，在任何鄉村內，都有販米商人的足跡。在城內的穀物交易所內，有米多種，又有一定的價格，與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聲氣，秋收時候，舂米公司，以新式機器舂米，運往上海，芝罘，寧波，廣州各地，轉為銷售。

“最後，荳，棉花，絲茶，桐油等等，銷售尤廣，大部都供應國際市場。

“中國農業經濟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國資本，參加中國農產品的製造，如山東英美煙公司的經營，便是用這種形式投資於農業經濟。此外中國直接投資於農業生產的事情，我們也常可看見，廣州米廠和糖廠，中國

中部等處的棉田，都是列證。……”（註六十二）這更足以證明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為根本消滅封建經濟的利器。

（註六十二）動力，第二冊，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40—41。

我們由上面看來，已證明農村的封建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傾覆了；農村不獨商品化了，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亦逐漸發展了。概括地說，農村已受城市資本主義的支配了，普遍情形，原是如此。不過由反面看來，中國邊遠的區域和交通不便的地方，殘留自然經濟，自然也還不少。但是，此種殘餘的現象，任何國家都不免，不過只有程度之差罷了。我們在巴黎城中，也常見着封建時代的手工工人，法國農村中，仍殘留有自然經濟不少。所以列寧將蘇俄的經濟，分為“（1）家長制的經濟，即大多數農民的自然經濟，（2）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賣穀物的農民，多屬於此類，）（3）私經濟的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五種後，他說：“然則那一種要素最為優勢呢？在小農之中，小資產階級的自然成長性，最為優勢，其中含有不能不優勢的理由，是很明顯的，農業家的多數，或大多數，是小商品的生產者。”

（註六十三）於此使我們發生兩個注意點：第一，任何國家的經

濟，都不是一個生產方法，等二，以最新的生產方法為領導。

(註六十三)列寧經濟學：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p. 5.

馬克思說：“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他又說：“我們將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的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定為社會經濟構成的如許多發展的階段。”由此我們就知道生產方法，經過各階段的進化，雖到了現代，仍有各階段的殘餘。中國現在，雖已進化到資本主義的時代，然資本主義是由封建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當然尚有不少的封建殘餘；不但有此封建的殘餘，而苗民土司中，尚有古代共產社會的殘餘，然決不能因此即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

一個社會的生產方法，既不止一個，究竟以那一個為領導呢？發展了新的生產力，才代替舊的生產力，新的生產力日漸擴張，舊的生產力日漸摧毀，舊生產力暫時的數量，雖或較大，而質量終屬較小，當然以新生產方法為領導；故蘇俄的經濟，雖以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者佔優勢，而以社會主義為領導。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不獨形式上佔了領導的地位，而實質上亦已佔了領導的地位，故一切經濟關係，都應以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說明。馬克思說：“……在資產

階級的社會內，農業漸次成爲產業的一部門，並且完全爲資本所支配，地租也是這樣。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凡土地所有權，處優越作用的地方，自然關係，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資本處優越地位的社會形態中，支配的作用，便轉移於社會的和歷史上所創造的要素。沒有資本，不能夠了解地租，但是，沒有地租，却完全能夠了解資本。資本便是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牠應當造成起點與終點，並且牠的概念，要比土地所有權的概念之先發展的。”……（註六四）由這樣看來，中國現在既是資本主義佔優越的地位，佔了領導的地位，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那末，一切經濟關係，都應受資本主義的支配。農村經濟中如土地買賣，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等等，均應以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說明，才算合於馬克思主義，否則即算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註六十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評導言。

#### 4. 中國既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怎麼 尚有封建勢力呢

我們上面的結論是：中國農村的封建經濟基礎已傾覆，已受城市的資本主義支配。經濟問題，是一種事實，在同



一的事實之下，由同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即應歸於同一的結論，不應發生對立的主張才合於邏輯；怎麼中國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於中國農村經濟，或絕對地主張封建經濟，或絕對地主張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如此南轅北轍，極端相反的主張呢？且主張資本主義者，在統計上，學理上，舉出種種的證據，的確證明合於資本主義理論。而主張封建經濟者，亦列出種種的事實，證明新會上確有種種的封建事實。怎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發生如此奇異的矛盾呢？我們不努力解決這種矛盾，中國經濟問題，無論如何都得不到一個澈底的解決。

中國的封建勢力，的確是一種事實，如季立三所舉地主的剝削：“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二，租額以外的貢獻；……三，徭役的殘留；……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五，在社會關係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另外，他又說：還有許多特殊情形，為西歐所沒有者，第一，土地的買賣，必得須宗族的同意；第二，中國特有豪紳等級，掌握鄉村政權。此係關於地主方面的封建剝削。另外，他又舉出封建軍閥的剝削：“一，強迫徵收農民極重的賦稅；……二，軍事勞役制的殘餘形式的存在；……

三，分區割據的形式；……四，在任何一個軍閥區域，都是極力保護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註六十五）所有這一切情形，都是中國農村中顯然的事實，亦是農民中最大的痛苦；設忽略這些事實，那末，在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兩方面，都不免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

（註六十五）布爾塞維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李立三著：中國革命的  
根本問題，p. 63—78。

因為封建勢力，是中國現在的確的事實，所以就是主張中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也未曾完全否認這種事實，如杜洛斯基是站在資本主義一方面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人，但他仍沒有完全抹殺封建勢力，所以他說：“封建與半封建的關係，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其發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封建時代所遺留的，一部分乃由於生產力發展的停滯，農村人口過剩，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影響等等而新形成的。”（註六十六）杜氏沒有完全抹殺中國封建勢力，比之於中國杜洛斯基派中有一些人，完全忽視封建勢力者，要超人一等。不過他把中國的封建勢力太小視了，所以他對於中國革命問題，遂不免完全陷於錯誤的結論。（此意不在此範圍內，應在後面去研究，）嚴靈峯君亦是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研究中國革命問

題的人，他亦沒有完全抹殺封建勢力，所以他說：“我們假如深入中國農村中去看一看，我們必定可以發現許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陳跡；我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族長社會，純封建式的地主；並且還可以遇見中世紀的人口買賣，大家族之畜婢養奴。此種制度，不僅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殘跡，並且有由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以及帝國主義商品掃蕩了農村之後，使農民趨於極端貧困，不但要出賣自己的田宅家具財產，最後為償還債務，或履行宗族祭祀，還要出賣子女妻兒。許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權慣例；而今日軍閥制度的存在，苛捐雜稅，拉夫，勒索，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遺孽。鄉村中之一切風俗習慣，賽會迎神，械鬥，私刑，以至於雞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等，無疑地都是封建時代的殘餘。僧尼，道士，巫覡，神君，地保，鄉長，祭司，廟祝，舉，貢，生員，翰林，進士，隨處都可以找到。”……（註六十七）嚴氏這一段文，對於封建殘餘，還算形容盡致，他的結論，謂此種殘餘，在經濟上不關重要，不能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轉資本主義一天一天地要摧毀封建殘餘。他這種結論，在經濟學上，完全是對的；不過這種殘餘，多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物，牠現在在中國政治上，尚有很大的關

係，忽視了這種關係，在政治問題上，就不免要發生絕大的錯誤。

(註六十六)杜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p. 70.

(註六十七)動力第二期，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4.3

主張封建經濟者，陳述出種種的封建事實，不能加以否認，主張資本主義者，亦承認封建殘餘，足見封建勢力，為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我們究應怎樣來研究這個問題，才可得正當的解決呢？依我看來，第一，這是農村經濟中的問題，我們應從農村經濟方面去研究，第二，這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問題，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來研究這問題。

列寧說：“馬克思已經指出當資本出現於歷史的舞臺的時候，農業已經有了種種複雜的形態，——封建的，民族的，共同體的，國家的形態了；資本屈服了各種的農業形態，使牠模倣自己的姿容，要理解，要評價這個過程，而統計的表現之者，必須提出各種問題，又須從各種問題，變更其研究的方法，或應從過程的各種形態，而變更研究方法。”(註六十八)他又說：“在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複雜的發展行程，惟有研究了農業的現實的各種特殊性之後，才能把握，然因為牠有許多特殊性，而就說農業決不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者，

完全是不正當的主張。”(註六十九)列甯說農業中有種種的形態，被資本屈服，我們研究農業問題時，須變更研究的方法，始能理解牠的過程；在農業中研究了農業的現實的各種特殊性之後，才能把握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的複雜的發展行程。但農業仍然適用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這是列甯指示我們對於農業問題的研究方法。

(註六十八)列甯著：農業的資本主義。

(註六十九)列甯著：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農業問題，p. 71.

列甯稱考茨基的“農業問題”一書，為“在三卷資本論之後，算是最新經濟學著作中出色的一本。”(註七十)可見考氏對於農業問題的研究，有注意的必要。他說：“農業的運動，完全是特殊的，與工業資本及商業資本的運動，完全不同。”(註七十一)列甯與考茨基，均不外謂農業問題，要複雜些，要特殊些研究，牠的方法，不能與工業和商業，取同一樣的方法，所以我們應該對於中國農村經濟，作一種特別的複雜的研究——此處只研究封建勢力殘存的原因農村經濟的重大的土地問題留在本書第七章去研究——然後才能解決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

(註七十)列甯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版序言。

(註七十一)考茨基著：農業問題，p.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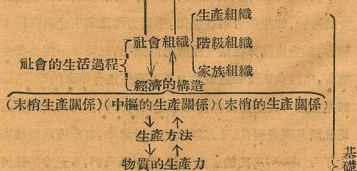
馬克思說：“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構成社會底經濟構造，即發生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並適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之現實基礎。”(註七十二)由此我們知道社會的經濟構造，與法律政治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物，應各有區別；且經濟構造，是根本的，上層建築，是附屬的，現在我們把日人杉山榮對於此區別所製的表，(註七十三)列在下面，可使人容易明瞭。

(註七十二)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判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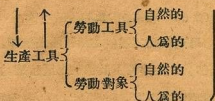
(註七十三)杉山榮著：社會科學十二講，p. 350.

精神生活的過程—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之二)

政治的生活過程—法律及政治制度(上層建築之一)







由此我們知道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社會的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應該謹慎地作嚴密的區別。若忽略了這種區別，那就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所以馬氏又說：“在人類進化的一定階段中，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或則與他們從在內經營所依據之財產關係，——這不過關於同一事物底一種法律的表現，——發生衝突。由於這些關係，變成了生產力底發展形態的桎梏，於是革命的時代就要到來。”（註七四）這一段意思，是馬氏指示我們，社會的下層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有發生衝突的時候，即生產力常在進化，生產力進化到與生產關係不相容，即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進化，此時就一定要發生革命，所以我們應知道社會不可避免地有革命的時代，這即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了變化的時代。馬氏又說：“因為經濟基礎底變化，全部無限的上層建築，也或遲或速地變化了”。（註七五）馬氏的這幾句話，是指示我們，凡社會的經濟

基礎變化了，那末，上層建築，自然也要隨着變化，不過我們在此處最宜注意的，上層建築的變化，不是同一個時候，牠的變化，自然在基礎變化之後，受基礎變化的影響而變化；但是，或則很快地隨着基礎的變化；或則很遲緩，雖下層基礎早已變化了，而上層建築，仍遲延殘存着，尚未變化，自然終不免要變化，但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始全部變化，起先，只少數部分的變化。因此上層建築與下層基礎，常不一致，常成爲兩種各異的形態，經過長期衝突之後，始變化達到一致。馬氏又說：“在考查這些變化的當中，我們應該常常將自然科學的精密，所能證明底經濟的生產條件底物質的變化，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即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並打破這種衝突底意識形態，——作嚴密地區別出來。”（註七六）這是馬氏教戒我們，應嚴密地用自然科學的精密方法，所能證明的，以區別上層建築與下層基礎，已算是十分注意地在叮嚀我們了，無如現在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常把這個區別忽略了。

（註七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判序言。

（註七五）同上。

（註七六）同上。

上面這些意思，即人人都知道的，所謂唯物史觀的定律，凡馬克思主義者，起碼即應該澈底了解的，本用不着這樣諄諄然來解釋。不過中國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濟學上，發生了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兩派的爭論，即由於沒有澈底了解這種定律，竟公然違背了這種定律，才發生這樣的矛盾，才發生這樣極端相反的結論。這由於他們，或則不知道下層基礎，——經濟基礎，常有變化；不知道此下層基礎的變化，與上層建築物的變化，應該有嚴密的區別。或則雖知道下層基礎有變化，且已變化了；但不知道上層建築物的變化，不是與下層基礎同時變化的，牠的變化，常要遲延一些時間。因此，他們或則認定上層建築沒有變化，以為下層基礎，亦沒有變化；遂按照上層建築物的形態，以解釋下層基礎的狀況。或則認定下層基礎既已變化，以為上層建築的形態，也必定同時變化；遂按照下層基礎變化的狀況，以解釋上層建築物之未變化的形態。於是當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各走極端，絕對相反的結論。故我們欲分析他們在經濟問題上的這些爭論，不能不先把這個定律，作一個稍詳的說明。

中國數千年都處於黑暗的封建勢力之下，封建勢力當

然異常濃厚，數十年前，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當然都是封建的。在帝國主義未侵入以前，資本主義未發展以前，中國的經濟，當然是建築經濟，即自給的自然經濟，和家庭工業手工業的經濟佔優勢。下層基礎既是封建的，上層建築物，自不待說，自然亦是封建的。上層建築物之一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是封建的，而上層封建之二的宗教，美術，哲學等意識形態，亦必是封建的。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已一世紀以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將近一世紀，封建的下層基礎，確已摧毀；我們在上面已作了詳細的研究，和事實的證明，已成為不可辯駁，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上層建築物是怎樣呢？是封建的嗎？抑非封建的呢？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問題了。以唯物論的原則說，下層變化了，上層當然也要變化，但牠的變化總是在下層變化之後，決不能在下層變化之先。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封建經濟，變化的事實，人人都可以知道，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所以這是不容否認或懷疑的事實。至於上層的建築物，那就不然了，我們逐處都見着是異常濃厚的封建勢力，雖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關係，雖不免有一部分的變化，然而保持封建的舊勢力未變化者，還要佔最大的一部分。所以凡說到中國有封建勢力，無

人敢加以否認，李立三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所說的那一切封建剝削，完全是社會的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認。我們在前面摘錄嚴靈峯述彼封建的那段文字，也是社會上的事實，只有遺漏了的，沒有過於鋪張了的；所以就是杜洛斯基，以左傾自居的人，也不敢否認中國的封建勢力，足以證明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已成為鐵案。由此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現在社會的下層基礎，即封建經濟已摧毀了；不過上層建築物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識形態，尚保存有很濃厚的封建勢力。所以中國現在，在政治上仍然是封建勢力在當權，這是客觀的事實，不能由主觀的願望去否認。

以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說，資本主義發展了，即是資產階級發展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必有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建築物，以適合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發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識形態，所以馬克思說：“於是自由競爭，便來代替了牠們的地位，適合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也就跟着出現，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也就跟着到了。”（註七七）他又說：“資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

個武裝的自治的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自由都市，（如德意）有的變成君主政治下納稅的‘第三階級。’（如法）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的工具；且是事實上大王國統一的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的產業和世界的市場成立了，他們就成為資產階級，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議制度國家的政權。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只算辦理他們公共事務的一個委員會罷了。”（註七八）由這樣看來，封建時代的上層建築物，是貴族政治，資產階級當是被壓迫的階級；一到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就發展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也跟着發展了，且把持近代代議制度國家的政權；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只是替他們辦理事務的委員會，完全受他們的支配。試看中國現在是怎樣呢？資本主義誠然發展了，資產階級發展了沒有呢？沒有，牠的勢力微乎其微，尚在受封建勢力的支配。近代代議制度的國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特徵，中國現在是否是代議制度的國家呢？中國的行政機關，是否受資產階級支配呢？只要稍有心肝的人，都不能說中國現在的國家，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國家的政權，是由資產階級在支配。所以中國現在社會的下層基礎，雖已變化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而上層建築物，仍沒有完全變



化，所以中國現在仍沒有完全的資產階級政權，仍由封建勢力在支配政權；至多或由封建勢力和資產聯盟在支配政權罷了。

(註七七)馬克思和恩格思著：共產黨宣言。

(註七八)同上。

馬氏又說：“從歷史上看來。資產階級也曾有過革命的功勞，資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牠消滅了。結合人和牠的生來的上層的封建的線索，也被牠盡情地剪斷了。人和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簿寡情的，金錢主義外，再也找不出甚麼別的聯結關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無數永久特許的自由，換了單純的無理的自由，——自由貿易；總之，資產階級，是將從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具的掠奪，變成赤條條的，沒廉恥的，迫切的，殘忍的掠奪。”(註七九)馬氏這段話，證明資產階級社會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代替了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國現在，社會的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是怎樣呢？是封建嗎？抑是資本的呢？自帝國主義侵入和資本主義發展以來，近代科學思想和資產階級意識，自然

也跟着侵入，以摧毀封建意識，以變化封建意識。但被摧毀被變化者，僅一小部分，而封建時代之神權的玄學的思想，孔教的階級觀念，宗法思想，及封建社會的一切風俗習慣，仍然保存者，尙異常濃厚。除工業的大都市而外，不獨農村是這樣，即很多的城市，亦是這樣。這又證明中國的下層生產關係，雖已變化，而上層建築物的意識形態，仍沒有完全變化，仍受封建勢力的統治。

(註七九)共產黨宣言。

上層建築物自然是跟着下層基礎變化，但牠怎樣跟着變化呢？變化的次序是怎樣呢？只要我們把資產階級出世以來的歷史知道以後，就可以知道這種變化的次序了。自蒸氣發明和工業革命以來，資產階級就露頭角了；他們首一步摧毀城市的行會和手工業，農村的自然經濟，代以大工業和農村商品化。更進而奪取世界市場，使殖民地資本主義化。他們要達到這種目的，都須國家替他們去執行；此時國家政權，當在封建的貴族手中，貴族的經濟基礎，是農村的封建經濟；當然與資產階級立於利害衝突的地位。於是資產階級，或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如法國；或由議會和平的手段，如英國；將政權奪取過來，使完全受他們的支配，務使適合於

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不獨需要資本，並又需要科學；於是由國家在城市設立大學，專門學校，和勵行普及義務教育，人人都能讀能寫。新聞事業也異常發達，人人都能讀報，國家和社會的一切狀況，都載在新聞中。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委員會，凡新聞中載有本國和世界關於他們的事件，都要責令國家負責去辦理，科學和教育，既發達了，於是神權的玄學的思想，就不相容了；所有封建時代的一切風俗習慣，和宗教觀念，都竭力摧毀，期其消滅無遺。

資本主義發達後，交通亦隨着發達，城市與農村的交通，密如蛛網，頃刻即可往返；農人的消費和生產，既已商品化，自然要隨時來往城市。城市工業發達，人口增加，農村生產品的交換價值，亦隨而增加。農業工業化，農人生產的額，自然也要增加。於是農人的生活，異常充裕，既有資財，常需要到城市去實行交換，而又有閒暇，常需要到城市去圖娛樂。因此，常與城市資產階級周旋；城市資產階級，既常留心於國家政治，而又與伏赫變了封建意識，農人亦因而亦留心於國家政治，——知道國家政治，密切地關係於他們的生活，——與伏赫變了封建意識，且又常有工業資產階級，住於農村，或他們的親戚戚友，住於農村；於是他們遂常注

意增進農村文化，農人的經濟狀況，既已進步，他們也有實力增進文化，且需要增進文化。因此，農村中的學校，圖書館，博物館，遊戲場，體育場，亦如星羅棋布。由是農村中的文化，雖不及城市，然而亦未過於落後。此其所以各帝國主義的國家，農業已工業化，農村已城市化；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未曾判若鴻溝，未曾築有萬里長城。此其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封建勢力，消滅得異常迅速，下層基礎變化了，上層建築物亦隨着變化了，資本主義發展了，資產階級亦同時發展了，而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亦跟着發展了，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完全不同。我們若忽略了這個不同之點，那末，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觀察，就不免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

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既已百餘年，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將近一世紀，所以社會的下層基礎已變化了，而上層建築物，則尚沒有完全變化，尚殘留很濃厚的封建勢力，這是甚麼原因呢？此即由於中國係半殖民地和受帝國主義統治之故。

中國封建經濟被摧毀的第一力量，為對外貿易，據海關報告，一九二九年，中國的進口貿易，為十二億六千五百餘

萬兩，出口貿易爲十億一千五百餘萬兩，合計對外貿易總額約爲二十二億八千一百餘萬兩，合銀幣三十四億二千餘萬元。以這樣巨大無比的力量，向着中國封建經濟，朝夕不斷地摧毀，那怕中國的封建經濟，有萬丈高和厚的銅城鐵壁，經過這百餘年的摧毀，也要被帝國主義的商品，摧毀的毫無遺跡。何況帝國主義的商品，價廉物美，受一般人的歡迎，無所抵抗呢？此其所以自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以來，中國封建經濟的手工業，家庭工業農村自給經濟，遂如山崩地裂地，日趨於傾覆，迄今只餘一點殘餘，幾將達於完全消滅了。

中國的封建經濟，誠然被帝國主義的商品摧毀了，但是，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其影響如何呢？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此十二萬萬餘萬兩的輸入，除極少的一部分原料和機器，是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輸入外，其餘的大部分，都是外國工業製造品，且多係個人消費品，很少生產消費品，因此，只算是摧毀封建經濟的動力，不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力；故外國商品的輸入，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雖不能說無影響，然而影響極少。至於輸出品，中國工業比較落後，製造品雖也有輸出的時候，然而極少，十之九以上，都是原料品；此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少關係，只算對於摧

毀封建經濟有絕大的力量。中國農村，現在自然有很多的消費品，是由蒸汽機的大工業製造的，自然是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然而是由外國蒸汽機的大工業製造的，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支配。農村中所生產的原料，也是供給蒸汽機的大工業的製造，自然也是要受資本主義的支配；然而供給外國蒸汽機的大工業的製造，仍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支配。(註八十)此兩方面，都只算是摧毀中國封建經濟的最大原因和動力；而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上，關係甚少，僅於交通運輸，擴大商業，擴大買辦階級方面，有相當的影響罷了。

(註八十)我的鄉村，是生產桐油的地方，近年因金價的關係，桐油滯銷，桐油商業的買辦破產，生產桐子的農人也破產；今年上海百餘家絲廠的破產，江浙兩省養蠶的農人，當然亦將破產。這是中國自然經濟摧毀後，受國際市傷和國際資本主義支配的明證。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未達到最後階段，然而亦有了相當的程度，這是我們在上面由統計數目證明過的；如此，則中國的資產階級，亦應有相當的發展，足以掌握政權，克服封建勢力。但我們又在上邊，由統計數目，證明過中國資本主義的勢力，佔外國十之六七，中國只佔十之二三。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能力，異常薄弱，不能獨立掌政權；只



能投降於封建勢力，或與封建勢力聯盟，以維持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的富力亦有限，不能供給較多的經費，擴張科學和教育，克服封建意識。任何國家，農村常受城市的領導，中國城市資產階級，既如此怯懦，如此萎靡不振；農村資產階級，更不能有所作為，不能發達他們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責任，更奴顏婢膝地，屈服於封建勢力之下。此其所以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即封建經濟，雖已摧毀，被資本主義代替，而上層建築物，即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仍受封建勢力的支配。

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半殖民地和受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不明白這種特徵，對於中國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決不能有澈底的瞭解。斤斤然分別中外資本主義，洋土資產階級，固然是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者的事件，不是無產階級的責任。無論中外資本主義，洋土資產階級，固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一的敵人，應加以同一的看待，無所用其區別。但是，我們欲澈底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資產階級的成份，不注意帝國主義，不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的數量上，作一個測量，那末，決不能達到圓滿的目的，所得的結論，定將是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因此，我們的區

分中外資本主義，不同於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者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他們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是爲他們的階級的利害，我們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乃在於藉此使澈底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資產階級的比量，以便爲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建立正確的理論和策略，故我們對於中外資本主義，有時不應區分，應同一看待，有時則又不可不區分，以別真僞。若以區分中外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的事件，我們遂因噎廢食，完全不許作此區分，那末，這又不免陷於教條式的機械唯物論，而不是辯證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

第三，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中國新式的資本主義的大工商業，皆偏於東南，而西北的大工商業極少，差不多等於沒有，如四川爲交通較便利，財產較豐富之區，輕工業發展如紡織的大工廠，亦沒有一個，西北工業之不發展，已就可以想見。故西北的下層基礎的封建殘餘，固較東南爲甚，而上層建築物的封建勢力，更較東南爲甚。所以中國近年的革命運動及政治變遷，常由東南領導西北，而西北幾別爲一天地，大類於歐洲的東南。

現在我們看一下，中國農村的上層建築物，究竟是怎樣

情形，中國的農民，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識字，他們幸而受教育識字者，亦不過三字經，百家姓，孔孟四書，紳士的子弟，或多受一點五經罷了。這完全是封建教育，自然也有採取新式教科書的國民小學，但教員既沒有充分的常識，而家庭和社會的環境，復無處不是十二分濃厚的封建意識。故布爾喬亞的意識，很少侵入農村。所以農人富於神權思想和命運觀念，信仰一切的神怪，只希望神怪保佑他們，免災納福，他們不獨視貪官污吏，有很好的命運，羨慕他們；並視土豪劣紳，都有很好的命運，要羨慕他們，恭敬他們。至於大軍閥，更視為天上的神仙下凡，故十之八九的農人，都希望再有皇帝出現，天下才得有太平。他們自身受土劣貪污，封建軍閥的剝削，和凶年天災的痛苦，都以為是由於他們的命運，應該如此，上天注定了的厄運。這真是受了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的封建教育。他們決不敢說一句反抗有權勢的人的話，不知道現在的政府，是幹的什麼事，不知道政府同他們發生了什麼關係。科學本可以破除他們這一切觀念，但他們很難有接受科學知識的機會，西北的農人，自然沒有見過鐵路，乃連輪船亦少有人見過，他們幾乎完全是無懷氏葛天氏的逸民。他們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雖然如此，然而他們

的經濟生活，却又是資本主義化了，這種矛盾現象，就是中國的農村狀況。

我們在上面已將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轉變的事實，上層建築物，沒有轉變的原因，已有較詳的證明，想來讀者已可以明白這種意思了。本來這一切的事實，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人人都見着，都可以知道的，怎麼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這樣極端相反的兩派，或主張封建制度經濟，或主張資本主義經濟呢？這種原因，我已在上面說明過一次，這就由於他們沒有澈底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的定律，第一，他們沒有注意將社會的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物，嚴格的區別清楚。第二，他們沒有知道下層基礎物和上層建築物的轉變，不是同時進行的，上層建築物的轉變，有或遲或速的不同；所以下層基礎物雖已轉變了，而下層建築物常暫時沒有轉變。因為他們沒有注意這兩個定律，所以才發生兩派極端不同的主張。

我們把他們兩方面的理論，對照着一看，就覺得主張封建經濟的，在政治上的理論和策略，多合於中國的事實，而在經濟上的理論，就不免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據，不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主張資本主義的，在經濟上的理

論，固然異常漂亮，富於馬克思主義的根據，不過依據他們的經濟理論，所發生出來的政治理論和革命策略，就不免不合於中國的事實，且亦不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了。這就由於他們或則認識了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物（所以他們在上層建築物的理論，多合於中國社會的事實），遂依據上層建築物以說明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或則認識了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所以他們對於下層基礎物的理論，不獨合於中國社會的事實，尤其合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遂根據下層基礎，以說明中國上層建築物；他們都只認識了中國社會的半截，都只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半截，他們都只算是半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不是整個的完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主張資本主義者，以為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既是資本主義了，遂以為中國的上層建築物亦必是資本主義化。於是就由他們主觀地認定中國已有了強大而獨立的資產階級和由資產階級獨立支配的政權，似若中國無處不是資本主義了。主張封建制度經濟者，以為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物，既是封建勢力了，遂以為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亦必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於是遂謂農村完全是自然經濟城市不是以支

配農村，似若中國全社會，無處不是封建化，他們兩方面，都太機械了，都只算是機械的唯物論，不是辯證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根據下層基礎說明上層建築物，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在通常資本主義的國家，本應遵守這個原則。不過他們沒有顧及上層建築物的轉變，有或遲或速的關係，只算是機械地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陷於機械的唯物論，非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上層建築物說明下層基礎，不獨是機械的，非辯證法的，且違背了馬克思說的“我們不能本着變革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變革時代；反之，這個意識，毋寧從物質生活底矛盾，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來解釋。”（註八一）那個定律，這算是黑格爾倒立的辯證法，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顛倒了。故他們除了是機械的非唯物辯證法的而外，更多了一層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至於著者證明中國的下層基礎轉變了，上層建築物尚沒有完全轉變，仍是由下層基礎去證明的，即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去證明的，並不是截然分成兩段去證明的。不過機械的唯物論者，只知道機械地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照通常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樣地去解釋，不知道以唯物



辯證法地去解釋，他們只知道是——是和否——否，不知道是——否和否——是，才陷於他們那種的錯誤。

(註八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

社會的下層基礎，已轉變到資本主義，而上層建築物尚滯留於封建勢力，中國的事實，既是如此，根據馬克思的學理，亦應如此去解釋，而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亦多是由如此的經過。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列寧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然而他對於當時的俄國之上層建築物，仍認定是封建勢力，所以當時布爾塞維克，認定工農民權革命的主要的敵人，是代表封建勢力的沙皇，(中國現在應認定代表封建勢力的軍閥，為工農民權革命的主要的敵人，方算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策略，)(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兩個策略”，中心問題，是臨時革命政府，因為要推翻封建勢力的沙皇，才能實現民權革命，故不能建立臨時革命政府，)不但俄國是如此，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即實現了土地革命建立共和國家，即算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了。然而自拿破崙至波拿帕特，法國的上層建築物，又經過幾次的封建復辟。在十九世紀中葉，發表共產黨宣言以後，德國當然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了。然而德國此時的上層建築物，不獨是

殘餘的封建勢力，並且是整個的封建制度。此時的英國，亦是貴族院佔優勢，即上層建築物仍是封建勢力佔優勢。但牠們此時的下層基礎，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的，可見中國現在的社會這種矛盾的發展不一定完全是例外或特殊的。

只有上層的封建建築物，沒有下層的封建基礎，（下層基礎既已轉變成資本主義，上層殘餘的封建勢力，不獨是矛盾的，且又是衝突的，）此等社會，必定隨時都是動搖的，隨時都有政變，隨時都在發生革命。十九世紀上期的法德，是如此，廿世紀初期的俄國，亦是如此，近二十年的中國，更是如此。且現在不獨中國是如此，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歐洲東南各國，南美各國，都是如此。皆因帝國主義的商品，在此等地方，摧毀了下層基礎的封建經濟，只殘留上層建築物的封建勢力。於是這些國家，都是些沒有基礎的封建統治成爲空中樓閣的上層築物，當然隨時都在動搖，隨時都有政變，隨時都在發生革命，所以中國的革命，是必然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亦是必然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是必然的。牠們的革命的勝利亦是必然的。

我們的結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但是變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了，無產階級已發展了，只殘留上層建築物的封

建勢力，此即爲半殖民的特徵，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因我們已證明資本主義發展了，無產階級已發展了，所以我們應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民權革命，推翻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不然，倘主張封建經濟，此不獨與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民權革命是矛盾的，而與主張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更是矛盾的，沒有根據的。我們不能主張封建經濟者，同時復主張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以什麼作根據，得出如此矛盾的結論，如俄國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幾個月的轉變，當幾十年，由八千餘的布爾塞維克，轉變到十餘萬的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中，由少數轉變到多數，主觀的條件，由如此迅速的轉變，是可能的；但客觀的物質條件，不是幾個月可以轉變的。試問主張封建經濟者，有什麼魔力，可以由封建經濟，幾個月就由空中樓閣，轉變到非資本主義了呢？這樣的推理，實在令人百解不解，故中國現在，不獨事實上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社會了，而革命的理論上，亦應證明是資本主義，一切革命的戰略和策

略，方才有根據，方合於無產階級現在和將來的歷史任務。

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過了辯證法的發展，譬如主張封建經濟者為肯定，主張資本主義者為否定，我的研究——變態的資本主義，即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則為否定的否定。這又譬如由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轉變為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由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再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是一樣的情形。

## 5. 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學批判

中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的多數的國家，故土地問題，亦為中國經濟問題中最重要問題。茲將拙著——怎樣幹——第七章土地問題中，摘錄一段，附在此章後發表，以補充此章中不足的意思；以下即是在土地問題中摘錄來的一段：

中國現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無論封建經濟派，無論資本主義派，都不免陷於機械的唯物論，主張封建經濟者，把資本主義完全抹殺，專站在封建經濟的立場，眼中只看見一個封建關係，於是凡中國社會中，無事無物，不是封建的，逐處都給以封建的口號，逐處都以封建的關係來解釋。殊不知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封建經濟，只是一種殘餘，

一天一天地逐漸滅殺，逐漸消滅，惟反動的保守派，終日頑固地向後看，才斤斤不捨地，留戀於此種日漸消滅的殘餘。無產階級是進步的階級，應該向前看，無產階級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的立場，毫不容懷疑地，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馬克思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向資本主義方面研究，凡馬克思主義者，無不竭力闡明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凡馬克思主義者，唯一的目的，專在於說明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因此，凡離開資本主義，即等於離開無產階級的立場。離開資本主義來談經濟學，即等於非無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

資本主義產生於封建的廢墟，在資本主義的時代，自然不免尚存留不少的封建殘餘，但馬克思主義者，絕不能，且不應因此種封建殘餘，而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而即離開資本主義方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資產階級在掌握權力，不過百年的時期中，”然則在發表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資本主義的時期了，我們現在姑且退一步，只認定發表宣言時為資本主義的時期，然而在此時期，歐洲的封建勢力，比中國現在還濃厚得多。我且舉出幾種事實，請讀者去看一

下。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上說：“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的農民，形成法國人口的大多數。在全國中，他們生活，差不多在同一狀況中，但相互間很少發生關係。他們的生產方法，使他們隔離，使他們不能互相交通，這個隔離，因法國交通手段的惡劣，與農民的困窮而更厲害。他們的耕種極小，因之沒有應用分工勞動，科學耕種的機會，所以在農民中，不能有進化的層次，技術的差異。社會關係的財產，每一個農民家族，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給的，大都分的需要品，生產於自己的土地上，就這樣使牠多半是與自然交換，而不由社會的交通機關，以取得生產的資料。所以在這裏有一小塊土地，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家庭，在那裏有另一小塊土地，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妻與子，由幾十個這樣的家庭，集成一村，又由幾十村又集成一縣。”——圈是著者加的——（註一九八）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的農村狀況，請問中國主張封建經濟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姑且這樣稱呼，其實站在封建經濟的立場，已經沒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氣味了，——你們把中國現在的農村狀況，與法國當時的農村狀況，兩相比較一下，究竟那一個的封建勢力濃厚些呢？我看法國當時的農村，無論由經濟關係方面說，由上層建築物方面說，都比中



國現在的封建勢力，還要濃厚得多。然而馬克思絕不因法國的農村，尚殘留有封建關係，而即離開資本主義方面，趨向於封建經濟的地位，來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可見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即使尚殘留不少的農村封建經濟，仍無稍妨害於馬克思主義者，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去研究經濟問題。

(註一九八)馬克思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譯本，p. 167—168

不但法國如此，德國的封建制度，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才廢止，（但實質上尚沒有完全廢止）（註一九九）共產黨宣言，所指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德國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在一八四八年，德國是怎樣的情形呢？我且把“德國共產黨的要求”關於農業政綱，摘錄兩項來作證明，“第六項，從來課於農民之上的一切封建的負擔，如租稅，力役，十分一稅等，均不須補償而即廢止之。第七項，君侯所有的，以及其他封建的領地，一切鑛山，鑛坑，都收歸國有。……（註二〇〇）請讀者看一下，發表共產黨宣言時的德國，不獨尚殘留有封建勢力，且尚殘留有整個的封建制度。然而馬克思此時，絕不因德國的封建制度，而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發揮封建經濟的關係，不，絕不，他完全是相反的，完全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竭力發揮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可見即使

在封建制度的國家中，只要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亦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不應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留戀於殘餘的封建關係。

(註一九九)見威耶，科因斯特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問題。

(註二〇〇)馬克思著：德國共產黨的要求。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即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的，仍不免同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的一樣，陷於同一的錯誤，即同陷於機械唯物論的錯誤。他們以為既站在資本主義方面，逐處均應由資本主義去解釋，乃連農村經濟，也以為逐處都應由資本主義去解釋，逐處都是資本主義的關係，決沒有殘餘的封建經濟的關係了，遂硬說關於土地使用權的租佃關係，和地租關係，完全是資本主義的關係，絕對不是封建的關係。

試問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是不是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應以農民為唯一的同盟者呢？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同盟者之唯一的目的，是不是在於幫助牠，謀經濟上的解放呢？欲為同盟者謀經濟上的解放，乃對於同盟者的經濟關係，沒有正確的認識，反為封建勢力作辯護，這也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家，對於同盟

者應有的態度嗎？這也只有托洛斯基派，否認農民在革命運動上的作用，才有這樣違背事實的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分析——我們應把本章中駁托派關於地租的錯誤，附錄一小段在後面，讀者始易了解上面這兩段的意思。

凡馬克思主義者，固然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作經濟的分析，但不能因馬克思主義者，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分析經濟，即絕對不應說明封建經濟的關係，完全否認封建經濟的關係了，所以著“資本論”的馬克思，在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時，仍不妨描述法國農村中的封建經濟的關係，在作“德國共產黨的要求”時，仍必須替農民提出廢止封建制度的綱領。列寧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在第三章中，仍不妨證明封建殘餘的工役制。(註二〇一) 列寧說：“擺在我們面前的，在歐洲的文明的近代資本主義的意義上，完全不是佃農，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的，是半封建的，半奴隸的佃農。”(註二〇二) 列寧自是澈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想來必不因他證明了封建經濟的關係，即否認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乃是相反的，反因此證明他是辯證法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別於機械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

(註二〇一)參觀列寧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三章，p. 207—228。

(註二〇二)列寧全集(第九卷,p. 192.)

“生產品的地租，各種經濟，以及其落後地租的形式，在某種條件下，縱使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亦可於殘廢了的生產方法之殘餘的性質中生長着。一九一〇年，在北美合衆國，曾有百萬以上的黑奴佃農。南美黑奴佃農的形式，是廢除農奴的結果發生的，但結果農奴並沒有完全廢除。此種黑奴佃農，‘曾是發展於俄國式的完工的制度，即所謂佃奴的基礎之上。’(註二〇三)可見在資本主義最高度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的美國，仍殘留有封建經濟的殘餘，我們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分析經濟，即應否認此殘餘的封建經濟，或用資本主義的法則，機械地去解釋此種殘餘的封建經濟，以主觀的人爲的，證明牠是資本主義的；亦不應因殘留有此種封建經濟的殘餘，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去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張由封建經濟支配社會經濟的全體。必如此立論方不失辯證唯物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

(註二〇三)馬札亞爾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p. 305.

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最可憐的莫過於他們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

係和政治關係，都要曲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死公式底範圍。主張封建經濟者，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期必曲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公式範圍，無論在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公式去解釋；不管社會的事實是怎樣，是封建的關係，也是封建的關係；不是封建的關係，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說是封建的關係。因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於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的死公式。至於社會的事實是否如此，是另一問題，是不關重要的事件，他們的死公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主張資本主義者，亦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期必曲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公式範圍，無論在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死公式去解釋；不管社會的事實是怎樣，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也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說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因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於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死公式。至於社會的事實是否如此，是另一問題，是不關重要的事件，他們的死公

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所以他們這兩方面，由中國經濟上和政治上分析出來的理論和策略，大多數不是社會的事實，不合於社會的事實，只是他們的主觀的幻想和機械的公式。凡這一切，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發明出來的，妙盡天下的，唯一的，妙極無疆的革命理論。“倘警察不禁止人，在街市發笑”（列寧），那末，俄國的無產階級聽着如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定要在街市中發出幾天的大笑。

現在我們又把駁托洛斯基派關於地租的錯誤理論，附一小段在此：

在現在的中國，嚴靈峯和任曙兩君，算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中的鳳毛麟角，他們兩人，對於中國的經濟問題，都有相當的貢獻，他們把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統一地研究，證明城市的資本主義，已足以支配農村經濟，這是對的，這算是抓着了經濟問題的重心。不過他們仍不免陷於機械的唯物論，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辯證法的研究問題。社會中任何問題，都有統一與對立，普遍與特殊等相互關係，我們研究問題時，從統一和普遍研究後，仍須從對立和特殊方面去研究，然後才知道牠們彼此相互的關係。他們知道注意統一和普遍，常忽略對立和特殊，遂不免發生



了極大的錯誤。嚴靈峯君對於地租問題，也由這種關係，發生了錯誤，他以為資本主義，既支配了農村，則農村中所有的一切經濟關係，都是資本主義了，無一不是資本主義的，——他與李立三一様，由封建經濟出發，遂覺得全中國，無地不是封建關係，逐處都由封建關係去解釋，他在他著的“職工運動概論”上，論工人待遇時，也屢說封建剝削，封建待遇，每一個人，得着了一個法寶，就以爲是萬應靈藥，逐處都拿去應用，——他由這一點出發，關於地租問題，亦由這樣去解釋。

所以他說：“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註一八七）我們已在上面，證明中國多數地租，不論形式或程度，都不只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並剝削了農民的工資，不但工資，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之一部。嚴氏說的地租不是中國事實上的地租，只是嚴氏主觀上幻想的帝國主義國家內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地租。嚴氏又說：“至於這地租，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所創造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須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註一八八）噫！中國的地租，既剝削到

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或七十，尚只是農民的剩餘生產物，由他的剩餘勞動造成的嗎？那末，我請問，農民作工比城市工人，加倍的勤勞，農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加倍的惡劣，他還要受高利貸的剝削，因而破產失業，這是什麼原因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嚴氏又說：“佃農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則任何地主絕沒有強迫農民佃地的可能，這種佃農與新式地主之間，無論如何，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雙方同意為前提。”（註一八九）嚴先生是深瞭解馬克思主義者，難道沒有瞭解馬克思說：“社會關係的綜合，構成所謂現在的私有制，超乎此關係，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便只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律的騙局，”這幾句話嗎？嚴先生在此地也不免太拘於形式了。

（註一八七）動力，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33。

（註一八八）同上註，p. 34。

（註一八九）同上註，p. 36。

嚴氏又說：“至於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這並不是證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要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為重，資本家所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常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註一九〇）嚴氏在此處，更有重大的錯誤，不知地租，是地主與

佃農的關係，佃農具有企業家的關係，他自有工具和資本。工人的工資，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單在於工資和剝削的關係；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百分之五十以上，只是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只是剝削工人每日的勞動生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對於佃農剝削到百分之五十或七十，那就大不同了，乃是剝削農業的總收入百分之五十或七十。此不單是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乃是對於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以及利潤底比例。故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只剝削剩餘勞動的剩餘生產品，至多不過必須勞動的必須生產品底一部；而中國地主，現在對於佃農的剝削，不止剩餘生產品，常剝削及必須生產品的一部，且不止於必須生產品的一部，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家的利潤。有時并剝削到佃農的資本。這種區別如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一個是十分之五，一個是百分之五。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迥然不同，怎能說是一樣的呢？嚴氏橫直機械地要替封建剝削辯護，要把資本主義的法則，普遍地應用到農村經濟方面去。才陷於融九州之鐵鑄不成的一個如此的大錯。

(註一九〇)同上註，p. 59.

上面這兩段摘錄的文字，讀者見了，一定覺得首尾不

貫，莫明其妙。但此種片段的摘錄，莫可如何，必俟將來將土地問題全章發表後，始能使讀者瞭解作者完全的意見。

## 國際政治概論

周 鯁 生 著      精裝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平裝實價大洋二元

國際政治是歐戰後各國大學新的科學，是現代國民應有的政治常識。在周鯁生先生這本概論裏面，所有關於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國際法庭等，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秘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項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不獨大學專科可採為教本，凡留心世界政治的，均不可不讀。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廣州

神州國光社印行政治哲學書目

版初	版再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二	版二	版三	版二	版二	版七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中國哲學史(上卷)	歐洲哲學史	西洋哲學的發展	哲學概論	哲學大綱	政治學說史(上中下卷)	政治思想史(上下卷)	政治制度淺說	國際政治概論	政治學概論	政治學綱要
李季著	馮友蘭著	馬爾文著	瞿世英著	金子馬治著	霍世英著	謝義偉著	戴克光著	其台爾著	張慰慈著	周鯁生著	楊公達著
實價一元	精·實價二元五角 平·實價一元八角	實價二元	實價九角	實價八角	實價一元五角	上·中·下每册實價一元五角	上·實價一元二角 下·實價一元二角	精·實價二元 平·實價一元四角	精·實價一元五角 平·實價一元	實價八角	精·實價二元二角 平·實價一元五角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參用書的最高峯！

# 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

鏡 園

中國經濟研究 任曙著 上海東明書社發行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這兩本書，都是想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據著者的聲明，是他們將來的系統著作之“緒論”，或“發端”，他們都是歡迎人們的批評和指示的。本來，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研究中國經濟，是十分迫切的工作，可惜這一工作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十餘年之後，至最近二年始有人着手去做。“雖是遲些，比不做好些”，所以我們對於牠



應當歡迎，應當同情的與善意的指示出他們著作中之缺點與錯誤，希望他們能在將來的統系著作中有所改正。

任著的“中國經濟研究”之內容大意認“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鑠的”(八四頁)，“中國經濟已經發達到俄國戰前的狀態(?)，亦即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經濟基礎”(一一三頁)。“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一四六頁)。“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一五〇頁)，換言之，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可與世界各國資本主義並駕齊驅，因此他認為說中國資本主義幼稚，落後的，是“非科學的錯誤見解”，(一四六頁)，不，而且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在盡其為資本主義掩護的任務”(同上頁)。他認為在國際的與本國的資產階級間，“一些小小的矛盾和區別”，我們不應管牠，而應“中外一視同仁”(一二六頁，一五二頁)。帝國主義並不阻礙中國工業之發展，如果說中國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衰敗，不振，進步微弱，那便是“資產階級的同情派”，“資產階級的擁護者”，“小夥計”(一五八——一五九頁)。“中國……非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生長起了，並正在成長之中，大可以作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一五二頁)，在革命主張上……只叫

打倒帝國主義而不叫打倒中國資本主義……還不是很巧妙的掩護資產階級麼”？(一五一頁)。

以上是任君研究中國經濟的結論，或者在我看，這是他研究中國經濟的前提，於是他搜集許多材料以證明，或者適合於他的前提。

我以為任君在中國經濟研究中，雖然自己認為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即唯物的辯證法，但實際他是很一偏的，只看見現象之一部份而未窺其全。辯證法即是說運動發生於矛盾。如果照任君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事實之陳述，則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一直摧毀封建經濟，帝國主義亦不阻礙牠。如果是這樣，則我們只有問，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幾十年的結果這樣可憐，如在南京武昌等城市還沒有自來水的供給，像甘肅那樣的省份還沒有鐵路，像四川那樣的省份只有九五·六三基羅米突的鐵路，中國海關每年進口，為什麼仍以棉紗疋頭為大宗呢？因此，假如有人認為“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工業的發展是絕對的不可能”（二三〇頁）這是錯誤，但任君之走向另一極端，認為資本主義可以無阻礙的或阻礙很小的在中國發展，亦絕不是事實。實際的情形是：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之一最重大

的因素。關稅(不幸任君在那本著作中無一字提及)的不自主是中國工業不發達的一最大原因。牠使中國每年入超平均四五萬萬，即是有幾十萬幾百萬中國的農民與手工業者破產(Expropriated)，而本國的工業發展所吸收的工人，遠不及失業的工農那樣多，所以他們流為兵匪，形成軍閥制度之基礎，年內戰，以妨害全國範圍內之商品流通，使工業難以進步。至於帝國主義在華設廠，一方面固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一部份，因為牠集合中國工人於工廠，使中國工業化，但在另一方面，牠也含有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成份，例如中國鐵和煤的出產有許多是運到日本去消費，而非供給本國工業。整個說來，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工業之發展，試看去年進口，棉織品以外，甚至米麥棉花煤鐵均係仰賴國外供給，十九年度進口入超為四一四·九一四·一四八兩。不唯中國的工業因受了外貨的競爭，難以發展，甚至農業的危機亦到了可驚的程度了。

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中國工業絕對無發展之可能。中國的輕工業(紡織，麵粉，煙草)可以利用賤價之勞力，運費之節省等關係，相當的代替帝國主義輸入之商品，尤其金貴銀賤，關稅增加，能相當刺激本國工業之發展。其

他有些工廠亦可因營出口業(絲業,蛋業)而發達。此外帝國主義亦因避免關稅,減少運輸費,而移殖資本,在中國開設工廠。不過中國工業發展與衰落,常是受國際的因素所決定罷了。

照任君的意見,便是中國沒有民族問題,即沒有國家之獨立與統一問題,或者這只是資產階級的事,與工人階級無干。實在這是很錯誤的意見。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平民所受的痛苦比資產階級還大得多。資產階級不開工廠,可以將資本放在銀行生息,或購買公債或作投機生意,資產階級是最怯懦,自私和沒有遠見的。但是中國工人因為失業者增加,找職業甚至要出運動費,於是抵抗力減弱,更容易為資本家摧殘,農民更易受高利貸者的剝削。所以他們爭國家之統一與獨立,與爭他們的生活之改良有密切的關係。

任君既然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得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了,那麼在中國之前的革命即是社會主義革命了,為什麼還是“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非資本主義一名詞是列甫在俄國革命後,期望世界革命很快能夠實現,於是可以領導許多落後國家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到社會主義。所以這是有條件的說法。如果任君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則非資本主義前

途還有何意義？未必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還有一非資本主義的過渡嗎？

任君對於將來中國革命性質的了解是不正確的。任君主張中國革命的民衆應當叫出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中國的經濟，對於封建關係說來，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但是對於純粹資本主義說來，牠還受着封建的剝削形式所束縛，不能自由的發展。就其客觀的任務說來，中國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即是對外爭得獨立，對內實現土地革命，這二者乃是革命的主要內容，而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廢止私有財產。但是什麼人能夠貫徹這種革命呢？我們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在上面與世界財政資本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在下面與封建的剝削形式也是密切的聯繫在一起，換言之，中國各派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放農民，只有工人才能這樣做，所以革命成功後將是一階級的政權，這一階級只是在取得政權後，才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

記得馬克思在“法國的階級鬥爭”中說過，在法國，小資產階級所完成的是大資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所完成的是小資產階級的任務（大意如此），法國無產階級本身的任

務，只有世界無產階級來完成。列寧亦說過，十月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是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列寧和托羅茨基有時稱十月革命是最澈底的民主革命，只是在以後史大林才把十月革命看做是在俄國有了足夠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而進行的革命。至於列寧，他認十月革命之發生，是因為俄國的其他階級都不能肅清封建關係，給農民以土地，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滿足這些要求。所以俄國革命以後，有一年的時期仍在民主階段。

任君以為中國各派，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都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實際是各派都抓着問題的中心，不過因階級的立場，而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只有任君才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否認帝國主義防礙中國工業發展，否認中國問題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因此得出一些安那其的結論。任君在本書中搜集的材料很多，用力頗勤，我們以為假使他的觀點更正確些，他可以得到更豐富的結果。

\*

\*

\*

嚴君的著作，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關係占統治地位和駁斥那種認封建關係佔統治地位的意見，其理論根據和事實分析都比任君進步。可是他的著作有兩個缺點：第一，他



不注意指出中國現有的封建剝削形式，如他在該書一一七頁所舉的種種，現在是由資產階級所保存。現在榨取農民，徵收農民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以及用苛捐雜稅，拉夫派餉掠奪農民的，不是封建勢力而是資產階級，他們提倡尊孔復古，甚至恢復科場的考試制，用中古時代的刑罰。除了資產階級用這些封建的剝削形式以外，沒有其他封建勢力。史大林派及其他資產階級各派提出封建勢力一名詞，無非是開脫資產階級之罪過。第二，嚴君亦不甚注重帝國主義妨礙中國生產力之發展。如他說：“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排擠民族企業，……並不是證明國民經濟不能發展，反而更趨發展”（一二二頁），又說：“在先進國的境內每多是發展重工業，在後進國發展輕工業，這種現象很類似各個國民經濟中某一企業生產生產工具，另一企業生產生存方法的現象一樣”（一二一頁）。關於前者，例如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航業，鐵路，排擠民族企業，並不證明中國國民經濟更趨發展。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三省之鐵路政策，不許中國資產階級所建築的鐵路與牠的鐵路平行，正是保障東三省只做日本的殖民地，農民供給日帝國主義以原料，商人做日貨的經紀人，壓抑東三省的大工業不能發展。至於外國在華的航業，工

廠，銀行，鐵路投資，牠的發展正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損失。據楊先鈞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太平洋書店印行)的估計，以上數者連合入超，使中國每年約共損失九萬萬三千萬元，“至於政治方面之借款，賠款之本利等尚完全未列入估計之內”(見該書一一七頁)。這十餘萬萬元是中國人對財政資本之貢禮，正因為此，中國陷於貧窮，而帝國主義者在倫敦，東京，巴黎，紐約，便可以脫離生產職務，坐食利息，窮奢極慾。我們能片刻的想像帝國主義整個說來，現在中國是使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而不是使他衰敗，在中國盡的是進步作用而非反動作用麼？至於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輕重工業之分工是極不自然的分工，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分工。假使殖民地要求獨立，必須先打破這種分工。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不能出產煤鐵，不能練鋼和製造機器的國家，能夠維持牠的獨立。正因為此，俄國現時賴國外貿易獨占之助，極力地發展牠的重工業。

此外嚴君不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方面相當地發展中國之工業，但在另一方面，牠保存着中國的落後關係。帝國主義在把持中國的財政(關鹽稅收)，航業，鐵路，和開發中國以後，一切重要收入和財源都在帝國主義者手中，於

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生產投資範圍，變得極其狹隘，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爲高利貸，商業資本；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地產投機等等，剝削人民，使中國人民日趨於貧困化。中國人民趨於貧困化，便是沒有國內的市場（何況還有帝國主義商品的競爭），所以上海的百餘家絲廠，在國際經濟危機發生，國外定貨減少以後，以及中國的蛋廠在美國提高關稅以後，都有停工的恐慌。假使戰前帝俄時代的資產階級在日俄戰爭失敗，即開闢國外市場的計劃失敗以後，知道用斯托里賓的政策，關於農民問題，實現某些改良，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開闢國內市場；中國資產階級直到現在還沒有意志，而且也沒有方案去進行關於土地問題的改良。中國革命的延期，這樣看來，也是不會很長久的。

嚴君又說“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五〇%或七〇%），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一〇三頁）。此地我們相當同意孫倬章先生（見其所著“中國經濟的分析”）的意見。孫先生說“中國多數地租不論形式或程度，都不只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並剝削了農民的工資，不但工資，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之一部”（見“中國經濟之分析”一〇六頁）。孫先生應當是

說地主和高利貸者，將中國農民的一切都掠奪了（包含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只留給他最少維持生活的生產品。這正是說明中國資產階級所用的是封建剝削形式，所以農民沒有改良生產的可能，所以資本主義的農業在中國不發達。

\*

\*

\*

以上我將兩本在今年出版的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做了一個批評。我希望任君不致說這是資本主義擁護者或機會主義者的意見，因為研究經濟是在發現牠的客觀趨勢，而不是拿牠去適合先入的幾個教條。如果照這些教條，則現在是資本主義世界，社會革命已經成熟，我們更不必去費氣力研究半殖民地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別規律，發現其與先進國的一些不同的特點。其次，我認為關於中國經濟的研究，我們此後應當深入。現在可以不再爭論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抑封建制度經濟，而應研究資本主義在中國各種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影響，及其前途的種種問題了。

九月十五日，上海。

神州國光社刊行經濟書目

版初	版初	版初 一九二九年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初	版二	版初	版新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世界經濟概論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	國富論(上卷)	馬先爾的經濟學說	財政學本論	經濟學入門(上下卷)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政治經濟批判
馬札亞爾著 陳代青彭桂秋譯	何漢文著	瓦爾加著 李一氓譯	陳邦國編譯	里加圖著 郭大力王亞南譯	亞丹斯密著 郭大力王亞南譯	鄭學稼著	希爾費丁著 王伯平譯	米哈列夫斯基著 朱鏡我譯	汪馥泉著 考茨基著	卡爾馬克思著 郭沫若譯
實價二元二角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八角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五角	實價五角	實價一元三角	上·實價七角五分 下·實價七角五分	實價一元二角五分	實價一元

大學及專門學校教科參用書的最高峯！

# 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

陳邦國

中國歷史的研究，是研究中國一切其他問題的前提。

雖然，這個研究，目前尚在幼稚時代，可是已經先後出版了幾本很可寶貴的小冊子——這裏，他們都一致的認為中國社會並不是一個神祕不可解的“悶葫蘆”。

解剖歐洲社會的手術（這積有幾十年的工夫，已達到成功了），也同樣可以解剖中國社會。這，就是說明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是與一般的歷史發展的定律相符合的。但是，當我們這樣說着的時候，必須注意，我們不能，也不應抹煞



一個國家由於某種特殊條件所決定的歷史發展的特點。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夠呆板的把西洋史譯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堯，舜，湯等等人物的名稱，就可以塞責的。反之，他的發展是受着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所限制，與其他各國不盡相同。

因此，中國歷史發展的特徵，要求我們加以審慎的分析。

中國的古代社會——包括原始共產社會與氏族社會——因為沒有充分的材料，使我們不能提出確定的意見。但于封建制度的發展，我們是有足夠的史實可以做我們的論據的。

很明顯的，封建制度的發展，在中國存在着兩條道路。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因帝國主義的關係，也有其自己的特點。我們的注意力，將集中到這兩個問題：

——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當然，這兩個問題，是不能單純的來研究的；因為研究前一問題，對於古代社會不能不作一簡單的說明，而後一個研究，又不能不把整個歷史發展的問題，作某種程度上的推斷。

因此，在我們論述這兩個中心問題時，將不時顧到前與後的因果關係。

這是在我們未開始正論前所應當說明的。

## 一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

在歷史學上氏族社會的發現與在生物學上細胞的發現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當然，發現氏族社會的功勞，是不能不完全歸之於摩爾根的。自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社會之後，影響到唯物史觀的作者——馬克思與恩格爾斯對於歷史發展的整個概念，在基本上有所變更。氏族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組織呢？給這個問題一個簡單的解答，在我們以後解決問題上有決定的意義。氏族社會研究專家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說：氏族乃是聯繫於一個血統——有時也不是這樣——的人的集團，這些人共出於一祖，同敬一神，公一姓氏，對於民事與刑事共同負責；有時是公有或公共使用財產的家族之總合體。不過，我們必須指出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是沒有與圖騰形式分開的，是與摩爾根在古代社會與恩格爾斯在家庭，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的定義不同。如果不預先說

明這一點，考瓦列夫斯基在原始社會學中的定義，我們便不能利用。氏族社會，在本質上是以氏族為單位的一種社會組織，是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之後，生產經濟代替了採取經濟的一種新的社會形式。井田制度的神話，其實便是氏族社會的末期的一種生產形式，在歐洲歷史上也有過類似井田制度的生產形式的存在。

在一般的歷史發展上，氏族社會是到封建社會的先決條件，猶之乎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發生資本主義是一樣。這一個“轉變”——由氏族社會向着封建社會的轉變——的經濟形式是氏族社會本身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然而隨後他自己又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結果了。氏族社會的崩潰，因為生產力更高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使鄰居的聯繫加緊起來。這樣，已經接近了各自獨立經營的“大家庭”制度，並且開始使用公共的財產：住宅及牧場。

鄰居關係的奠定，將昔日氏族聯繫根本推翻，於是氏族公社就為鄰居的，或農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換於是偶然的發生。管理的選舉已經不按照氏族的單位。生產工具也由石器發達了金器。最初，首先便是用銅。

生產力的發展更向前進了一步，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

加起來，開始利用不自由的勞動，於是發生奴隸。奴隸的發生有兩個來源：第一，部落間的鬥爭中的俘擄，在昔日完全殺死，至現在已經使他活着，為主人作工。因為利用奴隸勞動，剩餘生產品又增加起來，因為剩餘生產品的增加，在人類社會中構成了貧與富的分野。第二，社會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結果，發生了借貸關係，在收穫不豐，牲畜病亡，或青黃不接之時，便有平時沒有積壘的向有積壘的借貸之事發生。如果沒有能力償還債主之債時就拿勞動去抵補，甚至成了終身大累，淪為奴隸。

奴隸與農奴是不同的東西。後者是發生於大農業領有制度的時期，而奴隸經濟是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的一個過渡。郭沫若君沒有懂得這種過渡，他誤認封建社會是直接由奴隸制度推移來的，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鑄下了大錯。實在不特是大錯，簡直是個大笑話。他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一節之開端便說：“在易經和易傳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出我國古代社會的兩個變革的時期：便是易經是由原始共產制變為奴隸制時的產物，易傳是由奴隸制變成封建制的產物。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的完成是在東周以後。”並且，他在該文

中製成了一個社會進化表：“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他完全忽視了“氏族社會”一個發展階段，並且把“奴隸制”代替了氏族社會，由此可見他的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觀點，仍舊是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前的馬克思與恩格爾斯的觀點。然而，在古代社會出版之後，他倆已放棄了過去的觀點，而用摩爾根發現的氏族社會對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作了一個大的補充。郭沫若在現代研究中國歷史尚忘記了這一階段，怎麼不是大笑話呵，歸結郭沫若的錯誤如下：

第一，沒有正確的規定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誤把氏族社會一個階段忽略了；

第二，殷周之際是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他誤為是原始共產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

第三，中國封建之形成是在西周，東周時代已在崩潰的過程中，然而他說封建社會是東周以後形成的。這幾點以後我們還要說到。

封建社會的先史條件 另外一種形式是軍事部落的國家。中國封建社會在發展被否定之後，會又重新興起的原因，便是因為外族侵入，軍事部落國家構成後轉變而來的。

會在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了一定階段之後，國家形式在原始狀態上發生出來。這是因為社會分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後必定發生出來的。恩格爾說：“只有在經濟發展的相當階段上，社會分成了階級，國家才有發生的必要。”

軍事部落的國家，有時領域也很廣闊，如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帝國，日耳曼人的佛蘭克王國都是例子。五胡亂華時中國北部也有過大的軍事部落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漸漸形成的軍事領袖，擁有多量的生產品，財寶及多量的土地。在這個範圍中，不用什麼人封他，他便是一個郡主。郡主的發生亦有兩個來源，第一，就是前面說過的由軍事領袖直接轉變，第二，游牧民族侵入農業民族之後，由於軍事領袖與農業領主相互結合形式而形成的。封與不封是很少經濟的意義的。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了封建社會的發展有兩條道路，第一，是由氏族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個過渡，直接的封建社會發展；第二，由軍事部落的國家中軍事領袖或軍事領袖與農業領主的結合，構成了發展封建社會的經濟條件。

恩格爾

## 二

在實際上，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比了理論的敘述更為複雜。



在殷時期，已表示出氏族社會的完全崩潰，雖然在社會關係上尚有某種氏族社會的殘餘，但這是不能視為重要的，即在今日的英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在社會關係上還保持許多封建社會的遺跡。郭沫若認為殷仍是氏族社會，他的論證是：殷仍是兄弟相及。他說：“殷代都是兄弟相及的制度！這正是氏族社會的表現；因為是亞血族婚姻的關係，兄弟是整個的嫁來，兒子要整個的外出的，所以只能夠兄弟相承，所以氏族社會的制度在我國歷史上可以說直到殷代末年都還沒有消滅。”這當然是穿鑿附會。因為，殷時期，奴隸已存在，農業已成為固定的了。商書盤庚上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文，汝共作我畜民。”

“商其淪喪，我國百臣僕。”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馬。”

如是相信這是可靠的話，在殷初期，便已成為固定的農業民族，咸不願東遷西移了。郭沫若是相信的，但是他引證的與他證明的恰是兩件東西。

殷末期，已充分的具備了發展封建社會的條件，周只是作了歷史的槓桿，完成了這一個轉變。

周是黃河西北部的一個部落式的國家，還是在游牧的

狀態中生活。以郭沫若的意見，在生產力發展上周比殷進步，殷是比較落後的，所以，殷被高度生產力發展的周消滅了。其實不然，就各方面說，周不能高於殷，殷的末期，已有了固定的農業，具備了直接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先決條件，完成了那個過渡，奴隸制度已完成，然而，周在初——雖然不是同時——“還是母系的社會”。他引證大雅綿第一章：

“古公亶父陶後陶穴，未有家室。”

並且他又說：“文王……是亞血族婚姻。在文王的祖母一代還是女酋長制……。”我們相信這是對的，但是在結論上根本不合。郭沫若以為周比殷先進，我們以為周比殷落後。在周討殷時，處處表現對於殷之奢侈不滿亦是證明這一點。

在歷史上，落後的戰勝先進的，實不乏先例。希臘征服克里底，完全與周征服殷是一樣。在那時，希臘本是一個游牧民族，而克里底則已有高度的文明。

武王伐殷之後，把殷人當作自己的奴隸，發展了不自由的勞動，且承繼了殷的文明，所以結果比了殷的發展更快，直接完成了牧畜與農業聯合的封建經濟。郭沫若以為殷是用銅，周乃用錢，遂斷定周是比殷的文明高。其實這正是比較

低的文明的民族侵入比較高的文明的民族後，在整個歷史進化上更高發展之證明——這是辯證的發展。然而，郭沫若的發展則是機械的。實際的過程是：周滅殷之後，成了一個頂強大的民族，征服了四圍的小部落，於是形成了一種實際的土地的主人，這就是郡主，這種郡主在名義上是封的，其實是征服一個部落之後，那個軍事首領，便自立起來，各自為政。

另一方面，因為在經濟上廣大的利用不自由的勞動，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加起來，一般的土地領主與農民間的對抗亦隨着增加；手工業發展，成為商品的生產，但是大部分仍為自然經濟。

末了，封建社會之特點，便是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在周時亦是如此的。不過，郭沫若以為周是大一統的皇帝，這也是一種浮淺的見解，其實，那些諸侯本不是大皇帝封的，是他們在征服了一個部落之後，自己立起來的，並且這些部落原來與周也無關係，是獨立的，在被征服之後，因為這些軍事領袖與周是同宗或其他親屬關係，所以名義上服從周的統治，尊周為天子而已。集權的君主國，如秦始皇，這已經不是代表封建，而是商業資本的政權形式了。

## 三

從經濟上——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與從政治上——沒有集中的中央政權，各地諸侯各自為政——這兩方面看來，西周之初便是封建社會了。我們現在再看西周之末及東周時生產力發展的情形并解答秦始皇的政權的實質這二個問題。

封建社會之崩潰的原因，第一，是諸侯之間不斷的戰爭。封建的諸侯爲了擴充他剝削的領域起見，舉行一種侵掠的戰爭，結果就有所謂大吞小的現象，西周時期，據中國古書說有一萬多國，至開始了戰爭之後，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了。在春秋時期之初，已經是只剩三十多國了，最後到戰國竟只剩了七國。從一萬國到七國這一個戰爭的過程，使封建主與天子之間，封建主與封建主之間，未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變更了。第二，貨幣經濟的發展，這是由手工業與商業發展的結果。在東周時期初，已不是“純粹的”封建社會了，在歷史上即所謂農奴制度的國家。關於這一點，郭沫若以爲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其實是不對的。貨幣經濟發展，貴族——土地的領主——破產是接踵其後的，高利貸及商人資本抬高，正是封建社會末期，向着另一個過渡——

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過渡——即是向着城市手工業制度轉變的現象。他自己的引證，也只是證明這一點。

(一)“維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候人)。

(二)“式夷式己，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撫仕”(小雅節彼南山)。

(三)“彼有旨酒，又有嘉餼，洽比其隣，婚姻孔之。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似似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合之無祿，天天是椽。芻矣富人，哀此惻獨”(小雅正月)。

(四)“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小雅十月之交)。

(五)……

以上的引證，就按照郭沫若的說明，也是證明了與他的結論相反的東西。貴族破產，有錢的人起來，土地被有錢人買去了，貴族成了窮光蛋，……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因爲高利貸及商人資本抬頭之後，在社會上表現出來的變革。

在經濟學上，我們知道，商品經濟是破壞封建經濟（自然的生產形式）的。在中國歷史上，自西周末年便已開始了商品生產的形式，這是不能牽強附合的，貨幣經濟乃是商品

交換達到相當程度才出現的事實。由這些事實，我們在結論說：

西周時期末，封建社會已開始崩潰。東周時期已發展到城市手工業制度的時代了。

城市手工業制度之特點是什麼呢？

生產的性質是商品的，在家庭需要的生產上仍保持有自然經濟的形式；在城市中有了手工業的作坊，分工相當的發展，這是經濟上的特點。在政治上是諸侯的崩潰。在土地關係上，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隨着客觀上發生了國家統一的要求。

秦始皇的統一，便應運而生，而絕非是集封建之大成。郭沫若以為秦的統一，是封建社會的完成，這是絕大的錯誤。在當時，因諸侯戰爭，相互吞併的結果，剩了七國。這七國因經濟上的要求都有統一國家的企圖，秦始皇只是完成了這個歷史的企圖而已。在歷史上，統一的集中政權之形成，是因為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侵蝕了封建貴族的土地。土地集中，造成了經濟的中心城市，他們與農業的比重已大大的超過了。在此時，中央政權集中才獲得了經濟上的基礎。同時，人口增加，貴族失了管理的能力，遂發生了官吏。



這也是中國官僚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

秦的統一，是商業資本的統一。他是代表商業資本的政權。然則，爲什麼秦不能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完成一個更高的轉變呢？就是說，商業資本統一了國家之後，爲什麼不能發展成爲工場手工業制度，而不久便崩潰了呢？

促成秦統一的原因是商業資本發展。但是待解決的社會矛盾則是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這正是秦始皇不能解決的任務。即換言之，秦始皇不能解決土地問題。這是秦統一之後，不能向前發展的原因。而他的崩潰也正爲了不能解決這任務，致在四起的農民暴動中沒落了。

漢高祖是農民暴動的首領，他是相當的解決了土地問題的。

#### 四

秦不能解決當時社會的矛盾，只是把一切社會矛盾集中起來，所以，他很快的又矛盾下去了。

漢高祖解決了當時的一個主要問題，然則漢不能完成那個歷史的過渡的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這是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問題。

商業資本的發展沒有向工業上走，而向着另一條道路

走，這條道路便是土地投資，發展高利貸，於是工業的農業基礎亦沒有建立起來。同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很殘酷的破壞了農民生產，土地不斷地由農民手中失掉。他的發展與社會矛盾成正比例。所以結果，漢又走了秦的覆轍。拉狄克，稱中國這一歷史過程為“循環”，是有特別見解的。差不多每一個朝代之亡，都是亡於同一個原因，甚至，在元以後仍是這樣。

商業資本向土地上發展是在東周之末開始有的現象，不過在西漢時期，在土地重新分散之後，商業資本又向土地發展是值得注意的問題。這裏是在要求我們找尋中國社會“循環”的原因。

對於中國不能及時由商業資本時代轉變成為工業資本時代的原因，有很分歧的見解。最好笑的是郭沫若的見解。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說中國所以不能轉到商業資本時代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關於這一個問題，拉狄克說的很好，他說：“中國之所以沒有發明蒸汽機，和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一樣。”在這一點上，我也以為不是中國社會的特點。為什麼意大利，荷蘭——當時最有發明蒸汽機的條件的二個國家——沒有發明蒸汽機呢？為什麼蒸汽機只發

明於英國呢？這一個問題有很多的原因。在這裏，我們無用重複拉狄克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已解決了的問題，因為這一個解決是比較很正確的。

現在，我們只來找一找這個原因吧。

中國沒有由商業資本轉變到工業資本的原因，首先便是地理的條件，以唯物史觀的觀點說，地理條件在歷史發展上有決定的作用。中國的河流是直接的流入於大洋的，商品的轉運只限於內河航行。自然，由內河的航行達到海洋的航行，在技術上相差很多，沒有若干發展的階段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中國沒有完成這第二步。因為商品轉運上受了限制，所以阻止了市場的擴大。我們知道，市場之擴大對於生產量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時，北有沙漠，西有大山也是阻止市場擴大的地理因素。

雖然商業資本很發展，有克服這些阻礙的動力，但是都未達到成功。漢的張騫，班超之通西域，明之鄭和下南洋，都是歷史上的企圖。但是都沒有成功，至於不成功的原因，底下還要說到的。

很多外國人，在中國找到了許多手工業很發達的事實，然而，市場是狹隘的，生產受着限制，而單是這樣的發達是

無補於事的。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出路，走上了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的另外一條道路。於是，又開始了土地集中，農民破產，手工業破壞……。末了，農民又暴動起來。秦時的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以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的叛變，皆照明彰著的歷史事實。

農民暴動，如果在城市領導之下，可以轉變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是，當時却沒有工業資產階級；而商業資產階級是農民底直接的敵人，所以，暴動總是淪於原始狀況之中，頂大是達到平分土地。農民是沒有獨立作用的，更談不上政治領導的作用。這在什麼時候都是如此。

## 五

中國因為地理的及社會條件的限制，不能走到工業資本，自秦以後沒有跳出那“循環”的圈以外，但是不是在一個很軌道的圈中循環呢？不但不是這樣，且有數次曾企圖倒退於封建社會去。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在後來走的第二條道路。這條道路最明顯的表現是蒙古人的侵入後中國的歷史所走的道路。

在晉末，所謂五胡亂華時期，在北方形成了一種很大的軍事部落式的國家。這些國家，在理論上說——如上述——

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先更條件，在這時中國有重入封建社會的可能。

最後，到元時期。這一種可能竟成爲歷史事實了。就是說，理論上的，發展上的可能實現了。現在我們來分析元時中國封建社會恢復的過程。

當蒙古人未侵入時，在宋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很高的，手工業的精細，商業範圍有相當的寬大，貨幣經濟發展到極可觀的程度，一般市場上流通着鈔票；在工業生產上達到了工場手工業制度——固然不甚普通——的階段，很知道利用水力；農業上也有不少的克服自然的工具，如轆轤（水車）等已普遍的使用。總之，他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簡直不是蒙古人所可比擬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農業是與牧畜有關係的，尙不是獨立的固定的經濟形式。然而，高度發展的中國，被蒙人攻落了——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個特殊時期的發展。這便是封建社會又得以發展的時期。蒙古人到中國時，是憑依着武力的，就是所謂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這種軍隊中的首領，攻到中國之後霸佔着一個地方，握有那個地方的土地所有權及一切財富及人民。這樣形成了土種封主。他的實質就是封建諸侯。況且在經濟上，

大地主既先存在，在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侵入之後，直接變成了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這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形式。

元時期初，封建社會是如此復興的。但是，中國生產力發展本比元高，所以，元初時的封建經濟基礎，無有繼續存在的條件。因為牠不能克服已經高度發展的商業資本，反正在經濟上更發展起來，資本積蓄更快，於是又使土地集中，農民破產，又陷入了“循環”的命運。

最後，我們當指出，西周時期封建社會之形成是帶有進步的意義的，他的發展是向着更高的階段進行的。在元時期，封建社會之形成是退步的，是由貨幣經濟退到自然經濟。雖然，這一時期，為時很短，但終於是個退步的過程。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一問題，除去作者知道郭沫若的意見之外，因為很少流覽其他作家的著作，他們的意見，我還不大清楚。不過，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封建社會二度復現的這一特別問題，是本文中提出的一個新的問題。這一個問題，是需要我們給以充分的研究的。

現在，我只是提出來，而不敢武斷的說，這樣的結論是絕對



正當正確的。

以後我們來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個問題更是一個爭論不決的問題。有人說，中國是封建社會，又有人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再次，還有人說，中國是半封建社會，末了，還有人不同意這三種說法，而有其他的說法。

我們的任務，當從歷史發展上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而給各種錯誤意見以反駁。

——本段完——

## 西伯利亞的戍地

匈牙利馬可維思著

林疑今譯 實價大洋一元四角

作者是匈牙利著名的作家，於一九一五年被俄國捉為俘虜，在西伯利亞各處獄中流瀝五六年。階級的意識與驚人的天才，使他不加思索地寫了這部三十萬言的巨著，前年在匈牙利出版，銷路方面打破匈牙利出版界最高紀錄。作者因而一躍為當代有數的文豪！現已譯成十三國文字，與雷馬克的‘西部前線平靜無事’同受全世界熱烈之歡迎。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廣州

# 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

劉夢雲

## ——評任曙君的“中國經濟研究”——

我很佩服任曙君，他能夠把他的時間，利用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上，他能夠很有計劃的，很有次序地去研究這問題，企圖找到對於這一問題的正確的了解。但是在欽佩之餘，我總覺得任曙君的這本書，並沒有能夠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任曙君在他的這部著作中，同他所批評的許多著作家一樣，同樣的表示出了他缺乏政治經濟的常識，與正確的階級的立場。

任曙君這本書，祇是他整部“中國經濟研究”的大書的一部份，所以他定名為“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內容方面，主要的是在批評各派對於這一問題的錯誤的見解，提出他自己的立場。所以這本書是任君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的出發點與方法論，也可以說是他的全部大著的理論的基礎。他以後的幾本書，大概不外乎把更多的具體材料來證明他這一立場的正確吧。

因此，我對於任君此書的批評也不能不帶有較多理論上的辯論性質，說明他的出發點，他的方法論與理論基礎的謬誤，說明他這樣並不能找到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正確的了解。

這是在開始批評任君這一書時，所必須首先說到的一點。現在請言歸正傳。

一，把握着問題的中心？還是不了解問題的中心？

我想在任曙君大作出世以前，早已有人說過，要了解中國經濟問題，必須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說帝國主義，不但統治各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也統治全世界（當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除外），我想這也不是什麼任曙君的發明，而已是公開到再不能公開的事實。但是我們對於帝國

主義本身的了解，對於帝國主義如何統治着中國的經濟，怎樣剝削着中國民衆的了解是同任君很不相同的。因此，我們互相間所得出的結論，當然也是不能一致的。

在任君看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最大作用，是帝國主義商品的輸入，因此任君寫道：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這是因為由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解決中國整個經濟問題中，在過去的一切糾紛，在將來的一切疑案，特別是農村經濟的性質問題。不但這樣，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關於失地失業，和農村的逃亡，目前最嚴重的糧食問題，以及農民運動不平衡的發展，農村中各種各式的鬥爭，我們都可以拿對外貿易爲出發點來作說明。”（中國經濟研究八九——九〇頁，著者加圈——夢雲）

在任君看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經濟的問題，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即所謂帝國主義的投資問題，在任君看來，也不過是一個投貨的問題，一個入超的問題，即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任君寫道：

“在投資問題中，亦不是簡單的投資而有輸入商品的問題在。輸入商品關係中亦不是簡單的輸入商品而

有投資問題在。很顯明的事實，關於前者，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向中國投資，必然附有購料的條件。例如航空借款之與飛機購買，軍事借款之與械彈進口，都是不可分離的——投資就是投貨。”（同書一〇八頁，夢雲加圈）

這樣從任君看來，所謂帝國主義，實不過是商品的輸入與輸出，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這當然是簡單與明瞭的事！

因為任君有這樣簡單明瞭的帝國主義“理論”，所以他很容易的解決了被“各派”所鬧得烏烟瘴氣的中國經濟問題。只要把海關“華洋貿易冊”翻翻，問題就完了。一切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與對於中國民衆的侵略，都被確實實的記載在這幾本寶貴的海關冊中間了。你們還要些什麼呢！？

但是可惜這種帝國主義的“理論”，騙不了稍有政治經濟常識的人！普通的讀者，讀了任君大著之後，一定會問，這樣說來，不是帝國主義在幾百年以前早已存在了嗎？因為那時也有商品的輸出與輸入，也有對外貿易。這豈不是鬧天下之大笑話，豈不是使任君十分“科學的”，莊重的面孔，變成了滑稽可笑？！

謹告任君與讀者諸君：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的產物，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轉變，簡單的說，帝國主義就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它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同工業資本主義不相同。這種侵略，不單表現於商品的輸出與原料的輸入，而尤其表現於它的財政資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表現於為財政資本所控制的銀行，工廠，礦山，交通工具以及商業機關的統治，表現於勢力範圍的奪取，表現於利用並經過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地主軍閥，買辦資產階級等來剝削與奴役廣大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工農羣衆。所以要研究帝國主義怎樣統治着中國的經濟，必須要從這許多問題着手。而任曙君在“把握着問題的中心”時，竟完全把這些問題，拋到九霄雲外！這未免太令人掃興了！

照任曙君的全書看來，他不但表示了他對於帝國主義的偉大的不了解，而且他是有意的要躲避開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而不說。他是在企圖用各種各樣“左”的空談抹殺統治中國經濟與剝削中國民衆的帝國主義。

任曙君在中國經濟研究的第四章內一方面寫道：“中國資本主義問題，是要從帝國主義問題去求解決的”但他同時



說，我們用不到談什麼帝國主義。他說：

“我們爲什麼必欲這樣提出問題：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沒有發展。這只有資產階級學者，才去分別這些是他們的，那些是列強的。中國的工人是不應該這樣那樣替別的人劃分界限的。他們只曉得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是不分開的好弟兄，打打夥夥的壓榨他們，剝削他們，使得他們衣食爲難，他們的農友失業失地。在緊急關頭，就是在平時在合股公司內，他們顯然沒有分別，誰勞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別人強分賓主，去當資產階級的應聲蟲！”（原書一二三頁）

橫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與中國本國的資產階級，他們同樣的壓迫中國的工農羣衆，那我們還用得着談什麼帝國主義？！研究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如何剝削中國羣衆，這在任君看來，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應聲蟲”！

我想任君在這裏顯然是充當了帝國主義的辯護士，他顯然是想否認統治着中國全部經濟的帝國主義。他這樣做了之後，還說這是“把握問題的中心”，這真是天下之大滑稽！

任君根本沒有了解，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分別開來，可以變成資產階級的應聲蟲，也可以變成工人階級的戰士，如若說，中國祇有帝國主義，而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就是說，因為帝國主義壓迫着中國經濟，阻止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應該擁護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就因此勸告工人們參加造產運動：這是資產階級的奴才們所說的話。但是，當我們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帝國主義如何剝削中國民衆，是爲得要組織工農羣衆，打倒帝國主義，是爲得要沒有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是爲得要消滅與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是爲得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就是工人階級的戰士所說的話。他們這樣做，不但不擁護資產階級，而且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投降妥協，要揭破資產階級一切嘴上反對帝國主義的欺騙，要根本推翻投降帝國主義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

祇有這些工人階級的戰士，才把握着了問題的中心，才能真正的動員廣大的工農羣衆，做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統治的工作，把中國的勞苦羣衆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任曙君雖是嘴上說得很“左”，似乎祇有他才掛記到工人

的利益，實際上也就是他投降了帝國主義，做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辯護士的工作！

當然世界上有不少嘴上講得“蠻好”，而實際上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任君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這實是不足為奇的吧！

二，只看見商品關係，而不看見剝削關係，這是任曙君這類人的基本錯誤

任曙君所以要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作用問題，祇看做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無非要經過這一橋樑，以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來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以發揮他所崇拜的“世界大革命家”托洛斯基所說的中國目前的革命不是民主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偉論。

實際上，對外貿易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的中心，而是任曙君這本“中國經濟研究”的大著的中心的中心。任君這部書的全部理論是建築在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上。既然如此，任君的成功，當然是無疑的。或者說，不會發生問題的。任君所以這樣容易地宣佈了他的對手的破產，與他自己的勝利！

只要看那一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是經過或是不經過商品，我們就可以斷定那一社會是資本主義的或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就是封建的經濟，這就是任曙君所發現的新大陸。至於那一社會中剝削的方法，階級的關係，在任曙君看來，是對於那一社會經濟性質的決定絲毫無涉的。

任曙君引了關於中國經濟上是封建剝削占優勢，政治上是封建勢力占統治等類的兩段話之後，寫道：

“上面兩個意見，都是從剝削方式來說明中國的經濟性質的。這很不對。我們只能用經濟性質去說明剝削方式，不能用剝削方式來說明經濟性質。並且從社會階級來分析經濟問題，我們上面曾經說過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至於說富農是封建的，帝國主義維持封建殘餘，那更是荒謬絕倫。”（同書，四九頁，著者加圈——夢雲）

“至於以統治階級的性質及其剝削方式等等為出發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性質，毋乃太過滑稽。”（同書，八五頁）

這種把一個社會的經濟性質，看做完全同這一社會中的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離開，不去拿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

來決定經濟性質，而是什麼經濟性質，去決定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這實是完全離開了階級立場的資產階級的“理論”！

照任曙君的高論，讀者就會發出這樣的問題：在希臘羅馬時代，商品經濟有過很大的發展，難道那時希臘羅馬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在中國歷史上，遠自秦朝以迄清朝，曾經有過不少時期，商品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難道那時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現在，商品經濟在蘇聯也還存在着，難道那裏也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只要發出這樣簡單的問題，我們就可看到商品經濟的本身還不能決定那一社會的經濟性質。

要決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我們如若單單問這一社會有沒有商品經濟，我們還不能決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我們必須要問這一社會中有什麼階級，他們中間剝削的關係怎樣，祇有知道了這些，我們才能斷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譬如我問你，羅馬帝國的經濟性質是什麼？你一定要回答我，那裏有奴隸主與奴隸，奴隸主不但壟斷了一切生產工具，而且壟斷了奴隸的身體自由。他除了奴隸的死亡的界限以外，可以無限制的剝削。那時不但農場上的大批生產品商品化，而且奴隸也變成了商品，同牛羊沒有任何的區別。我

根據你的回答，我才能說羅馬帝國經濟性質，是奴隸的經濟。但是如若根據任君的理论，那羅馬的經濟是商品的經濟，所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我想普通中學校的學生，都會告訴任君，說這是在給人家開玩笑。

不過我覺得任君是一個很莊嚴的學者，他決不會同人家開玩笑的。他祇是在他的莊嚴中間，表示出他對於工人的政治經濟學沒有絲毫的了解。讀過初步政治經濟學的工人，一定會告訴任君！在階級的社會中，剝削的關係，也即是階級的關係，是每一社會的經濟基礎。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壟斷土地的諸侯與地主用地租與徭役來剝削農民與小手工業者。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壟斷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用資本來剝削工資勞動者。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間，離開剝削關係與階級關係，就沒有法子了解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

祇有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擁護者，才會離開這一中心問題而不談。他們可以給你講很多很多的東西，而且也許是會非常有趣的東西，但是對於這一問題總是要保守沉默的，因為這是剝削階級的祕密！世界上從沒有過，除了極少數之外，剝削者，承認自己剝削過任何人。資本家祇是把飯給工人吃，但決不剝削！地主祇是把土地給農民種，但決不



剝削！地主與資本家是工農的救命主！可不是嗎？！

替帝國主義做辯護士的任曙君，那裏再肯揭發出地主資產階級的祕密呢？！

當然，我並沒有說，商品經濟的社會，同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任何關係。却正相反，凡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必然是商品經濟的社會。譬如資本論的第一章，就開始於商品的分析，正是如此。但是商品經濟的社會，決不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拿海關貿易冊上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決不能證明這就等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拿它們的商品破壞中國的農村經濟，使中國農民的農產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國農產品的種類依照世界市場上農產品的價格而變動，決不就等於帝國主義促進了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發展。

有了社會的分工，有了私有財產，就有商品的交換關係。這交換關係，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去，也可以更其增加地主對於農民的封建的剝削。

三，帝國主義的侵略，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封建剝削的加緊

雖是任曙君在他的大作中間，不斷的說人家是機械論者，而他是辯證法大家，然而要在世界上再找到一位比任君

再機械的機械論者，恐怕很難了吧。固然在他的對手方面，有不少機械論者，然而在這方面，他的確比他們要更加高明。

照任君的邏輯，帝國主義把商品輸入了中國，所以帝國主義幫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假使誰以為帝國主義不但不幫助而且阻礙着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那他就是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樣一來，任君就會到中國年鑑一類書上抄下很多的表，表示出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至中國工廠數目的增加，洋洋得意地來證明他所犯的“資產階級意識”的錯誤！於是他同阿Q一樣，又得到勝利了！

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目的，是爲了要投資，是爲了要推銷他們的商品，是爲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給。要達到這些目的，它必須利用政治的，軍事的，與經濟的力量，奪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與政治權力。在中國，它們利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借款以及軍事失敗後的賠款，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取得了它們的勢力範圍，使各地的地主軍閥，以至資本家，變成了它們手中的工具，爲了壟斷與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它們在經濟上必須設立它們的銀

行，工廠，交通工具，商業機關。它們就依靠這些東西（非經濟的方法，我們這裏不說）推銷它們的商品，搜括中國的原料，與奴役中國的工農羣衆。這些東西的設立，無疑的，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且大大的擴張了商品經濟的領域。但正是因為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在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變成它的原料出產地，它的商品的市場，與它的投資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且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他不但不消滅鄉村中間的封建式的剝削，而且加緊了這種剝削。

這種議論對於任曙君當然是“荒謬絕倫”的。一方面說，帝國主義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係，擴大了商品經濟的領域，另一方面，它又在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加緊着鄉村中封建式的剝削。這對於任君，當然是天下之大矛盾，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

爲什麼？這是因爲任君對於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沒有絲毫的辯證法的了解。

帝國主義爲得要加緊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與對於中國民衆的剝削，不能不相當的造成了資本主義的關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他們不能不建立他們的銀行，工廠，交通工

與商業機關。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是爲了要更其能控制中國的經濟，更其能使中國的經濟變成他們的附庸。

我們只要一看帝國主義的銀行，在中國的作用，我們就可明白這一點。這些銀行的“營業”，不是在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而是在舉行各種各樣政治的，軍事的以及名義上是實業的借款，借款利息之高，條件之苛刻，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它們更利用中國金銀比價的時時變動（其實變動的操縱者還是它們）。做賣出買進的投機事業，一舉手之勞，可以有數百萬以至千萬的收入。它們可以發行大批的紙幣吸收現金，再拿現金去投機，去放款。它們更利用它們所有的特權與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力量，吸收中國官僚軍閥的低利，無利以至賠利的現金。一切對外貿易，也完全在它們的掌握之中，它們更經過中國的錢莊，當舖，以及各種各樣的經紀人（地主，商人資本家。高利貸者）用很高的利息，貸款給小商人以至貧苦的工農羣衆，用很低的代價去收買農民的農產品。它們就是這樣控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剝削中國的民衆。它們對於某一資本家的幫助與否，就會決定這一資本家的生死。照例，它們祇是對於它們本國的資本家給與助力與擁護。祇是

因為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的背後，有這樣雄厚勢力的後台老板，他們才能在競爭中取得勝利。沒有這種銀行做後臺老板的中國資本家，自然祇有失敗之一途。

這些銀行，尤其是匯豐銀行，在中國營業的利息，往往高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這樣高的利息，在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是不會有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是證明財政資本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是寄生蟲的，高利貸資本的作用。它祇破壞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生產力，而不能發展生產力。

不錯，帝國主義在中國除了銀行之外，還有工廠，還有交通工具與商業機關。但是工廠的建設，大部分限制於紡織工業，烟草工業等輕工業的部門。鐵路的建築，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起後，差不多已經完全停頓。現在交通方面發展得比較快的，是汽車，輪船，電話，無線電以及航空等等。這些東西的發展，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絕對必要的。有了比較便利的交通，帝國主義者才能把他們的商品運入中國內地，才能把內地的原料運到外國。一切這些東西的設備，祇是爲了要更其控制中國的經濟，使中國走向殖民地的道路上。（軍事的目的，我們這裏不說。）

帝國主義所以在中國創造最小限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不是爲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爲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成它的附庸。爲了這一點，它不但不願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盡量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這一點東西，我想除了任曙君之外，不會有什麼異議吧，當然，單看到對外貿易的任曙君，決不能看到帝國主義如何的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却正相反，在任曙君看來，正是帝國主義幫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任曙君的所以變爲帝國主義辯護士者蓋以此。

其次，帝國主義這種殖民地政策，當然使商品經濟在中國農村中得到了急速的發展。帝國主義商品（不但是工業品，而且也包含農產品）輸入中國的農村，中國農產品以及原料輸出外國，自然會使中國農民出賣自己的農產品而購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商品。但是這種發展，祇是加緊了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於廣大農民羣衆的剝削，造成大批的破產失業與空前的大饑荒，正因爲生產力的不發展，所以數千百萬破產失業的農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萬的餓死，數千百里的沃野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沙漠。正因爲生產力



的不發展，所以他們不能不去當兵，當匪，以至當人家的牛馬。同時，正因為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生產力不能發展，所以中國的有些民族資本家不能不改弦易轍，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中去，對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就是農民分化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富農階層，因為他們的剩餘資本沒有發展的餘地，所以也樂於購買土地變成半地主與小地主。

雖是一切這些，在任曙君的腦筋中是“荒謬絕倫”，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的確是如此。在中國農村中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於中國農民的剝削，只要稍為知道一點政治經濟常識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是封建式的剝削，因為這裏對立的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資本取得平均利潤的資本家，與得到工資的工人，而是將土地出租給農民，向農民那裏收到地租的地主與農民。這種地租不論是生產品的或是金錢的，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至於這裏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的作用，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業資本與借貸資本也是性質上不相同的。

帝國主義利用它在中國經濟上的指揮地位，就是這樣經過中國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推銷它的商品，搜括農民

的財富。帝國主義祇是因為在鄉村中有它的同盟者，所以它不但能夠統治通商口岸，而且也能統治中國的鄉村。所以在鄉村中間，帝國主義維持着封建的剝削，也就是經過這種剝削，奴役着廣大的中國勞苦民衆。

至於帝國主義者怎樣擁護中國的軍閥，這些軍閥怎樣“非資本主義地”(就是說封建式地)剝削着中國的民衆，這是人所共見的事，我想這裏用不到加以說明了吧。

一切這些在任君看來，都不免是怪誕離奇的，然而現實常常比任君頭腦所想的，要更其複雜些，那有什麼辦法呢？！

#### 四，死的數目字與活的解釋

現在我要研究一下在任君大作內所有一些數目字，看任君對於這些數目字的解釋是否正確。

任君最得意之作，即是引用海關冊上的中國對外貿易表。他就用這些表證明中國現在的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甚至同戰前俄國與戰後蘇聯的經濟不相上下。但這些表所能證明的，祇是中國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正因為帝國主義，地主軍閥官僚，資本家對於中國農民的剝削一天一天加緊，所以農民把他們所

有的一切東西，甚至于老婆小孩子，都拿來出賣。很明顯的，這種農產品的出口是農村破產，生產力降低的結果，而不是資本主義農莊發展，即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如像在美國與德國等）。這是一。第二，中國輸出品中，主要的還是原料，而不是工業品。這表明出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業的國家，而不是工業的國家。第三，那些輸出輸入的工業生產品，不是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

我想只要我們把中國農村經濟加以絲毫的考察，就會看到中國農村中主要的生產方法，還是手工的而不是機器的，還是封建式的生產，而不是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主要生產者，是小佃農，小自耕農或半自耕農，而不是農業資本家與農村工人。他們因為受到軍閥，地主，高利貸者的剝削，因為要完納苛捐雜稅，地租利息等等，不能不盡量的並且廉價地出賣他們的生產品。這同農業資本家為了取得利潤，而耕種土地，而出賣農產品有根本不同的意義。中國的小農一年勞動的所得，養活一家人口還不夠，還說得上什麼利潤？！這些具體情形，是為任君所看不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發展”！

其次，只要看一下中國對外貿易的細目，就可以看出，

中國主要輸入品，是工業品，主要輸出品是農產品。我們現在也引用一下一九二九年海關冊上的表：

民國十八年海關外洋進口貨比較表

類別	百分數
棉貨	一三·七六%
棉衣	七·二〇%
麵粉等	五·〇六%
煤油	四·三六%
糖	七·八〇%
五金及礦物	五·六〇%
米	四·六六%
毛製品	三·五三%
化學產品	二·七一%
燭等	二·六二%
木材	二·二〇%
魚介海產	二·〇八%
糧食等	一·八二%
紙煙	一·六四%
人造綫	一·三六%

人造絲	一·二三%
絲貨	一·〇八%
汽車	〇·九一%
紙	二·七〇%
機器	二·三六%
菸	二·一二%
蘇貨	一·八四%
小麥	一·六九%
煤	一·五一%
染料顏色	一·二六%
棉紗	一·一三%
食品等	一·〇一%
其他貨物	一四·七六%

民國十八年海關出口往外洋貨品比較表

類別	百分數
豆及產品	二二·六二%
蛋及產品	五·〇九%
茶	四·〇六%
餅子, 仁子	三·二六%

棉衣	二·九二%
綢緞	三·〇七%
棉貨(除棉紗)	一·七〇%
花生及產品	一·三六%
豬鬃	一·一八%
桐油	二·三二%
絲類	一六·二六%
皮貨,生皮,熟皮	四·四八%
五金等	三·三一%
煤	三·〇四%
糧食	二·五九%
髮毛,毛羽,絨毛	二·二三%
棉紗	一·八一%
木,木材	一·六七%
紙煙	一·二一%
鹽	一·〇九%

從這兩張表上，我們可以看出外國進口貨中日常工業用品占進口的一大半。出口貨中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原料。同時在進口貨內，食品也占不少部分。這並不是表示因為中國



工業化了，所以需要從外國輸入食品，而是因為中國農民一方面因為要適應世界市場原料的需要，所以不能不少種稻麥，而多種其他農產品，如豆子之類，另一方面（這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為農村經濟的破產，災荒區域的擴大與收成的減少，致使食品不敷應用，而依靠外國的輸入。但這種食糧輸入的增加在任曙君看來，都是中國資本急速發展的結果。同一事實，但所得結論却是完全相反的。

最後，在外國的輸入品中，機器的輸入，祇占全輸入百分之二·三六，共值二九，八八六，五〇三海關兩。同時中國又沒有洪大的製造生產工具的工廠。那中國是怎樣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國輸出品中，工業品輸出者，主要的為綢緞，棉紗與棉貨。除綢緞的輸出逐年減少外，棉紗與棉布的輸出是增加的，尤其是棉紗的輸出。關於這一點請看下表：

最近中國棉製品輸出表

年 代	棉 紗(担)	綿 織 品(海關兩)
一九二一年	二五,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八八,〇〇〇	九,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六四,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三二五,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三三〇,〇〇〇	一一,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三四五,〇〇〇	一七,三〇〇,〇〇〇

這類工業製造品輸出的增加是否如像任曙君所說的是中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表現呢？不是的。這是表示出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原因，即是國內市場的缺乏。祇有四百萬錠數的中國紡紗工業（其中二百三十萬是中國資本家的，一百六十四萬是外國資本家的）的生產品，不能完全銷售於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而必須到南洋羣島，印度，以至日本等去找求市場，這表示中國民衆的購買力是如何的低微。但這在任曙君看來，這種輸出，當然是中國經濟繁榮的象徵！

此外，任君在論對外貿易時，大罵有位姓潘的朋友，說他把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減低了，說“他爲要證實中國經濟落後這一主張，以便他說明中國還是封建經濟的理論，意識的引用過去五六年乃至十餘年的事實，而不引用在突飛猛進的中國對外貿易中關於近年的事實”（前書九十七頁——夢雲加圈）在另一處，他又說：“中國資本主義還在繼續發展中。它不因內戰，災荒，革命，以及所謂封建剝削的阻礙，而致停止其前進。”（同書一五七頁）

然而，在這裏我們也想拿一點小小的事實，證明任君的所謂近年來“突飛猛進的對外貿易”，實在是吹牛的。

根據海關的報告（這在任君是最可靠的報告），一九三〇年進出口總額爲二,二〇四,五九九,三三六海關兩（金銀不計在內）。較十八年度的進出總額二,二八一,四六六,〇三九兩減少七六,八六六,七〇三，即百分之三·三。但這祇是拿銀子來計算的時候是如此。如若拿金價來計算，則相差更甚。十八年度海關兩之換算率爲二先令七便士十六分之十三。則該年進口貨，應值英金一六七,七八一,六一七磅。十九年度海關兩平均換算率爲一先令十便士十六分之十一，該年進口貨祇值英金一二三,八一〇,一一九磅，計減英金四三,九七一,四九八磅；即百分之二六。

這就是任君所說的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在不了解中國經濟恐慌深入的任君，當然這是不可思議的！這在任君看來，恐怕又是有意替資本家造謠，而不是事實。因爲祇有證明一切都在發展的數目字，才是任君的事實！……

現在，我再來同讀者研究一下，任君在“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一章中的一些數目字。

我想祇有傻子，才會和任君爭論，說中國資本主義沒有絲毫的發展，說今年沒有增加過一個工廠，或是二個工廠，增加過一個工人或是二個工人。我們所爭論的，是中國現在到底是什麼社會，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或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占統治的地位，還是封建的剝削或是封建的關係占統治的地位？所以任君的好些數目字，並不能夠幫助任君，證明他的主張的正確。

譬如他寫道：

“如果我們說中國的帆船可以表現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則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請大家注意下列的記載：

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

年 代	輪船	帆船	合 計
一八七五年	八五	一五	一〇〇
一九〇五年	九一	九	一〇〇
一九一五年	九三	七	一〇〇
一九二五年	九七	三	一〇〇
一九二六年	九八	二	一〇〇

(見同書一四〇頁)

任君利用這樣的數目字證明他的結果，真不免令識者啞然失笑。即稍有常識者，而不是呆子，看到了任君這個像煞有介事的統計表之後，一定要問，難道在一八七五年中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五為輪船，百分之十五為帆船嗎？這真叫做白天見鬼！可笑的，是這位學者，把“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當做全國輪船與帆船的百分比。而且到底一八七五年中國有幾個海關？設在那裏？登記的是外洋船還是內河船？我想這位學者自己也莫明其妙。這位學者祇是為得要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所以亂用數目字，把數目字的原意完全拋開，這也不免太難為情了。

然而這種亂用數目字，在任君的大作上差不多連篇累牘的都是如此。譬如接着這種有趣的證明之後，他又寫道：

“如果說由錢莊和銀行的興替，亦可以相當的看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程度，那我們就介紹出如下的數目字來：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中國銀業投資的百分比

	錢莊	銀行	合計
一九一二年	六八	三二	一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三七      六三      一〇〇

這一個小小統計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十年之間，銀行和錢莊表現了決定了新陳代謝的關係。銀行投資日多，錢莊投資日少。這裏我們很明白的看到中國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沒有兩樣；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人們再也不能拿歷史上商業資本主義一語來比擬今日了！”（同書，一四一——一四二頁——夢雲加圈）。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不知道這一統計，是講上海的還是講全中國的？但是這一位科學家就可根據這類統計，說中國經濟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這就是說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時代，這就是說，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真是在任曙君的筆上突飛猛進的發展着。我們前面說過，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的經濟，當然這同任君所要證明的，中國經濟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完全不同。我們說，帝國主義經過買辦階級，錢莊，地主，軍閥官僚，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來剝削與奴役中國的民衆，而任君說，中國的銀行已經大部分排除了錢莊，中國已經變成了財政資本（或金融資本）的國家！



這位任曙君在這一統計表的下一頁，又用了一張統計表，證明出中國資本主義是如何的發展。這是一張“一九二八年各種生絲出口的數量和貨價的比較”，其中：

土絲占百分之九·七(數量)百分之五(貨價)

半廠絲占百分之九(數量)百分之五·八(貨價)

廠絲占百分之八三·四(數量)百分之八九(貨價)

“這個統計表示了什麼呢？很顯然的告訴我們：中國農家原來生產的土絲在數量上不到百分之十，在貨價上不過百分之五，而廠絲半廠絲合計，無論在數量與貨價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表示：資本主義的生產將要奪去生產的全部領域，封建手工業的生產將要完全消滅。”(同書，一四三——一四四頁，——夢雲加圈)

拿生絲出口的比例，看做是中國全國內手工業的生產品與資本主義生產品的比例，這當然是最好不過的戲法！

任君就是這樣拿數目字來證明他的“理論”！這就是他應用數目字的“科學方法”！

讀者諸君，我們現今已經完全看破了任君所玩魔術的手法，爲了時間與精力的寶貴起見，想來沒有再看下去的必要了吧！

五，是中國經濟的繁榮？還是中國經濟的恐慌？

在任曙君的腦子中間，決不會有經濟恐慌的觀念存在：  
我想這是可以斷言的。

任曙君在論“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一章內，差不多到處都看到中國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照他看來，“經濟的繁榮”，現在是從美國轉到中國來了。

譬如關於絲業的發展問題，任君先引用了下列的表：

歷年上海絲廠發展概況表

——一九三〇年四月調查——

創辦時間	廠數
民元以前，時間未詳	二十
民元至民五(1 12—16)	一二
民六至民十(1917—21)	一一
民十一至民十五(1922—26)	二〇
民十六(1927)	一一
民十七(1928)	十三
民十八(1929)	二五
民十九三月(1930,3)	二
合計	一〇七

“這統計告訴我們——任曙君說——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廠，比以前任何年份都加得增多。本年三月止，亦增加二廠。”(同書，一六五頁)

除了上海之外，任君還引用浙江的無錫的絲廠的發展，結果自然是都有增加。於是任君勝利地說：

“由上面三個重要區域的統計，已經把小夥計們一切非科學的，空想的，布爾喬亞的反動理論的基礎摔毀無餘了。”

這位只看見樹身而不見樹林的任曙君，引了這些數目字之後，就洋洋得意，覺得又可以把人家大罵一頓了，也不問這些工廠現在還是開着，還是關着。這同他有什麼關係呢？工廠總還是工廠，不論是關着或是開着。

然而我們不能認關閉着的工廠為工廠呵！照我們所知道的，中國絲業不但沒有繁榮的前途，而且正陷在嚴重的經濟恐慌的深溝中。我們也看看資產階級的學者所說的老實話吧。(很奇怪，有時候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比任君所說要靠得住些！)

“中國生絲產量，向來推測，應有四十萬担上下，年來逐漸減少。十九年度計祇二十七八萬担，較之十八年

度，約減少八九萬担。其減產之重要原因，不外乎蠶繭歉收及繭質不良，致出口欠佳，而成本反貴。同時復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國絲織廠大半減工停業，生絲銷路大減。日本絲貶價出售，華絲無法競爭。故絲業之衰敗，為數十年所未見。上海絲廠百〇六家中，年終時停業者約達七十家，無錫絲廠七十家中停業者四十家，廣東絲廠情形之困難亦復相類。”（中國銀行民國十九年營業報告書）

這就是任曙君的中國絲業的發展！

除了絲業之外，任曙君講到中國航業的發展。雖是任君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受內戰，災慌等而受停頓，並且根據一九二九年海關報告上所載“上述英船噸數，較民國十三年最高之數，亦超過二百萬噸，實為空前紀錄之價值”而不禁狂喜，然而中國航業界的不景氣的事實，任君想來還是不能否認的。

據招商局的報告，該局最近幾年來的營業。差不多陷在完全衰落狀態。即以去年上半年而論，招商局輪船因應差與零星裝兵之損失，一月份計遺二，五四三兩，二月份三，八三三兩，三月份一六〇，六三五兩，四月份一八〇，三二〇兩，

五月份一六〇，八一七兩，六月份一二三，四二五兩。至于應差各輪所應收入之租金，還不在內。合計招商局在去年半年之內，就損失了六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三兩。其他各華商航業公司，也莫不受到大的損失。所以年來所謂華商的船業，也同樣處在嚴重的恐慌的情形之下。

至於鐵路工業又怎樣呢？任君說：

“一般布爾喬亞的份子認爲最痛苦的莫過於內戰的延長，使鐵路的交通大受影響。但這裏我們應當知道在帝國主義干涉和監督之下（對於帝國主義應如何感恩不盡！——夢雲，）鐵路交通不但在內戰一停止即有恢復的可能，而且必然會有或多或少的進展。”（同書，一七〇頁）

任君的證明，當然又是那本寶貴的海關報告冊。他選出了如下的數目字：

近兩年鐵道車輛進口的比較

	民國十七年(兩)	民國十八年(兩)
鐵路機車煤小車	一,五六四,〇〇〇	三,五〇一,〇〇〇
鐵路客車貨車 (電車在內)	二,二八九,〇〇〇	二,九三五,〇〇〇
未列名鐵路電車 路材料	三,九五—,〇〇〇	四,二五三,〇〇〇

合計 七,八〇四,〇〇〇 一〇,六八九,〇〇〇

不看中國鐵路工業的實際情形如何，而拿這點數目字來證明鐵路工業的發展，這是任君所說的形式主義者的最好的標本！

實際上，以一九三〇年而論，據國民政府鐵道部統計，全國鐵路除平漢隴海不計外（但這兩路所受的損失實最大）營業上的損失達三百六十萬元。但這還是不重要的部分。主要的，就是各鐵路，年來因不斷戰事的關係，都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現在預算各路車輛材料之補充，橋樑軌道的整理約需五千萬元。據美人滿台爾計算，則需七千七百萬元。恢復鐵路原狀需要五千萬元到八千萬元，而任君却想拿幾百萬元的進口貨當做鐵道工業發展的標準！對於這類中國資本主義贊美者的布爾喬亞的分子有什麼辦法呢？！

至於拿一九二四年北京農商部所發出的礦業執照，以證明中國重工業之發展，真是開關“科學方法”的新紀元！外國械器輸入的略有增加使一九三〇年中國機器工業減少了百分之五十的事，對於任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主要民族工業部門之外，尚有絲綢業，在民族工業中也占過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來，這一工業竟



有一落千丈之勢。如杭州區，在民國十四十五兩年中間，絲綢業還比較發達。民國十六年底，杭州絲綢廠亦尚有五十二家，但到十八年已剩下十三家了。在湖州在最盛時期，城廂內外，共有絲織廠二十餘家，零機二千餘架，每年絲織物的產額有九十萬疋。但是到十八年底綢廠倒閉已過半數。十九年實存者，僅三十家，零機開工的，已不滿千架，全年出產額不滿五十萬疋了。

此外如像火柴業，糖業，麵粉業，製油業等，現在都處在嚴重的恐慌中（爲了節省篇幅，不再舉例，）除了任君的腦海之外，找不到任何出路。恐慌原因雖各有某種不同，但總括起來，不外沒有國內的市場（即廣大民衆的貧窮化），國外的市場（世界經濟恐慌），外貨的競爭（屯併政策包括在內），金價上漲使外來原料昂貴，本國原料的缺乏（惡化與歉收），國內戰爭與捐稅的繁重等等。這些原因不解決，中國民族工業的長期恐慌是不可免的。這就是說，在目前的情勢之下，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前途，是沒有的。

但是各主要民族工業部門的長期恐慌，並不就是說，在任何民族工業部門中，都不能有某種程度的發展。最明顯的，即爲紡織業的發展。據華商紡廠聯合會最近的調查：

華商紗 錠線 錠布 機

前次調查 二,三二六,八七二 六八,九二〇 一五,九五五

最近調查 二,三九一,〇七四 八八,一四四 一七,〇一八

此外在一九三〇年內如橡膠業，化裝業，調味業，製帽業等都有相當的發展，但除紡織業外，這些企業都是新興的，規模很小的，因為特殊原因而發展的。正像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當機器工業消滅着手工業時，手工業者從這一工業部門逃到另一部門，以保持他們的運命，而且在有些特殊的企業上，如像製帽業，可以得到相當的發展一樣，在中國這些小規模工業所以能夠得到發展，祇是因為這裏的一些利潤並沒有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注意，或是因為特別的原因，帝國主義所製造的一時不合於中國人的口味。

所以這些工業的發展，決不能說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它們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意義是非常微小的。而且這點發展也不過是短期間的，它們也將碰到其他工業部門所碰到的同樣的障礙。

到這裏，反對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特別提出的任曙君，一定要站起來說，民族工業雖是不能發展，但是帝國主義工業是能夠發展的。如像在紡織工業方面在最近一年

內全國紗錠增加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六枚，其中華商計增六萬四千二百零四枚，日商計增九萬九千四百十六枚。全國線錠增加九萬另三百六十四枚，其中華商計增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枚，日商計增七萬一千一百四十枚。全國布機增加三千二百二十六台，其中華商計增一千〇六十三台，日商計增一千五百八十三台。（見紡織週報，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

不錯，各國帝國主義者因為國內經濟恐慌的深入，因為銀價的跌落與工資原料的特別便宜，所以盡量的把他們的資本移植到中國來。只要有利潤可得的地方，當然他們沒有不來的。

在這裏我並不想很具體的說出帝國主義如何在經濟上控制了中國。因為關於這問題的材料比較的多，除了任曙君之外，一些明瞭的讀者中間，都比較的還有相當了解。但是我必須在這裏指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主要的還在政治借款方面。他經過借款，控制中國國家的收入（最主要的如海關鹽稅，烟酒稅，）取得各種各樣的特權。經營這些借款的就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的各帝國主義銀行。其次，投資之用於建設事業的，最主要者為鐵路借款。鐵路工業以及各種交通工業的“建設”，差不多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重要使

命之一。因為祇有這樣，才能輸出中國的原料，出賣他們的商品，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更能統治中國。

當然除了交通工業之外，帝國主義在中國還開設了一些工廠（如紡織工廠），開採了些礦山，但這些企業的資本，在帝國主義全部對華投資中實是比較微弱的。尤其在煤鐵礦的開採方面。至於大的機器製造廠，簡直一個也找不到。帝國主義比較更願意投資的地方，却是那些土地，房屋，碼頭，旅館，棧房，信託，保險，遊戲場，貿易，橡皮，大都市的所謂公共事業各部門。即以上海地產公司而論，英籍的有十五家，法籍四家。在一九二八年收入資本已達一〇二，一三〇，二八六元。（見統計月報二卷五期，七十一頁）這些企業，都是取得極高度的利潤，但對於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沒有關係的。

帝國主義怎樣掠奪中國而不發展生產力的最好的例子，即為各帝國主義銀行的營業報告。（我常常說到在華的帝國主義銀行，祇是因為這些銀行是扼住中國經濟咽喉的魔手！）我手頭沒有去年各帝國主義銀行的營業報告，我祇能根據統計月報上劉大鈞所摘錄的一九二八年的情形。在這一年內，匯豐銀行的資本共為二千萬元，公積金為銀一千

四百萬元，及金鎊合銀五千九百三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元。除公積金內大都作為外國存金或投資外國票據外，該行手內却有印度證券及殖民地證券達一萬一千七百萬元。匯豐銀行如此，其他銀行差不多也是如此。劉大鈞先生在那裏更寫道：

“麥加利銀行之資本及公積金共有七百萬鎊，持有政府證券及他種證券共九百二十萬鎊，又於大英銀行占有股本二百二十萬鎊。東方匯理銀行持有法國國防公債十五億九千三百萬法郎，又有國庫長期債票等一千六百七十萬法郎，而資本及公積金僅一億一千七百萬法郎也。大英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百七十萬鎊，而持有之英印兩政府證券共達二百九十萬鎊。華比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億四千六百九十萬法郎，持有之政府公債及政府擔保證券四千六百七十萬法郎，於聯號銀行占有股本一億一千萬法郎。橫濱正金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億零六百萬日金圓，持有政府證券及公債二億七千八百萬圓。”（同月報，二十一頁）

除銀行之外，再譬如外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之各種保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的資本雖是專為中國業務募集，但大

部份仍投資外國證券，收入的保險費也是如此。劉大鈞先生說：

“據某公司報告，其款項五份之二，存於中國境內之銀行，五分之三投資於抵押及證券。而證券之中半為外國政府之債票及外國公司之股票。該公司之資本與盈餘，合併計之，猶不及上述款項總數之半，故其資本完全投於外國可斷言也。

“萬國中法兩儲蓄會及外國信託公司亦頗有上述情形，甚至中國政府設立之郵政儲金機關亦嘗以收入之存款購置外國證券，是真可謂中國對外之投資事實。”（三十五頁）

這些事實表示什麼呢？這表示出帝國主義盡量的利用各種方法剝削中國的民衆，盡量的破壞中國的手工業與農村經濟，盡量的吸收中國的財富，但這些財富他們並不用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却用在保効本國的政府，用在發展自己母國的經濟。這在任君看來，又是荒謬絕倫的（凡是任君不了解的東西都是荒謬絕倫），然而在帝國主義，這是再自然沒有的。

但是當我們說，帝國主義，投資的主要部門，是在借款，



銀行業，交通工業等等，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的資本完全不投於其他工業的部門。只要有高度利潤可得，帝國主義者當然是不會客氣，不會落人家之後的。在這一方面，近來表示特別積極的，即為日本帝國主義。最明顯的是在紡織工業，以及雜貨業方面。關於紡織工業方面，我們已略略說過，關於雜貨工業方面，據大阪市產業部調查自去年五月至本年一月，日資本家在上海設立的有：

廠名	預定資本 (日金)	製品種類
上海紙業工廠	五千元	包裝箱
泰山橡皮工廠	十五萬元	橡皮鞋
美芳工廠	四萬元	琉璃器
河野罐頭廠	二千元	罐頭
冠麗製帽廠	三萬元	帽子
金屬精煉廠	十五萬元	鉛製品
日華手染廠	三千元	手染
金水熱水瓶廠	三千元	熱水瓶
加藤電線廠	五千元	電線類
仁和琉璃廠	一萬元	琉璃器具
中華工廠	五千元	製鞋業

安川電機廠	十萬元	汽車類
大阪機器製作工廠	五萬元	紡織用品
東華織廠	一萬五千元	領帶類
泰昌機器廠	三千元	機器
自一月至五月；日人在天津設立的有：		
怡豐工廠	二萬元	橡皮鞋
泰山膠皮工廠	三萬五千元	橡皮底
世戶工場	一萬元	肥皂
田中工場	五千元	橡皮管
清水工場	二萬元	煤油混爐
高橋工場	二千元	獸腸象皮製膜
宮崎洋行	三千元	日本酒
高橋洋行	二千元	領帶

(見五月底上海日日新聞)

我有意把這些廠名，資本額與產品排列出來，是為得要使讀者看到到底這些工廠是怎樣的工廠，他們在中國經濟上有怎樣的影響。如若我們仔細的把這些數目字研究一下，那我們就立刻可以看出，這些都是規模非常小的，主要的都是出產些日常用品的工廠。這些工廠的廠主，都是一些被日

本國內大資本家所排擠的小資本家，他們或是在國內爲本國的大資本家所吞併，或是移植他們的資本到中國來，利用一些特殊的條件，發展他們的企業。這些小資本家同中國一些土着的資本家競爭起來却常常能夠得到勝利。但統治中國經濟的，自然不是這些小規模的企業。這些企業的資本同最近成立的歐亞航空公司德帝國主義的資本，中國航空公司的美國資本等比較起來，真是相差天地。（即中國航空公司，就有資本一千萬元。）

但是就是這些外國工業的發展，同樣的受着中國國內市場，即中國民衆購買力的支配。我想除了任君等這些人之外，誰也不會夢想在貧窮的沙漠裏，會生長出資本主義的薔薇花。這些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時因爲特殊條件而產生的，將同樣遭到嚴重的經濟恐慌的影響。破壞中國經濟，使中國廣大的工農羣衆貧窮到無以爲生的帝國主義，以中國經濟的破壞，與中國廣大民衆的貧窮化而爲生的帝國主義，當然不能在中國造成資本主義的宮殿！

總結起來，現在不是中國經濟的繁榮，而是中國經濟的恐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祇能破壞中國經濟，而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它祇能使中國的經濟殖民地化，而不能使

中國的經濟獨立發展。祇有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如像任曙君其人者，才會閉着眼睛夢想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

#### 六，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任曙君，當然很容易拿海關冊上的一些數目字來“證明”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而不是封建剝削占着統治的地位。關於這一點，我想現在不必再同這位中國資本主義的贊美者多費唇舌。我們在這一節中所要批評的是任君所說的：“我們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經濟之中心問題的土地問題來，證明牠的關鍵也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關係”。（原書，二〇一頁）

我們現在就同任君來談談土地問題。

一開頭，任君又表示了他玩弄數目字把戲的特別能力。他在他的大作二百零二頁上，引用了這樣的一張表：

	戶口的百分比	佔有土地面積的百分比
中農	(一〇至三〇畝)二四%	十三%
貧農	(一至一〇畝)四十四%	六%
富農	(三〇至五〇畝)十六%	十七%
中小地主	(五〇至一〇〇畝)九%	十九%

大地主(一〇〇畝以上) 五% 四十三%

這張表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現在姑且不去管它。我們現在只要看任君如何解釋了這些數目字。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顯然的事實。貧農戶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農村爭鬥的中心爲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僅建築在貧農之失地，而且建築在中農的失地。中農佔有土地之少，不是自給自給經濟破壞的證明嗎？所以土地之集中，與貧農與富農地主之對立，都完全由於封建生產之破壞，即資本主義關係之形成”  
(著者加圈——夢雲)

這裏任君所看到的，祇是中農佔有土地之少，自給自足經濟的破壞，所以完全是封建生產之破壞，即資本主義關係之形成。這就是任君從這張表上所能得到的唯一結論。但是土地集中到誰的手裏呢？這對於任君是沒有興趣的。

就是從任君所引用的表上，我們也可看到佔戶口數祇有百分之十四的中小大地主，却佔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土地的面積。這就是中國的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裏，不是很顯然的嗎？下面他又列舉中國佃農所占全體農民的百分數。他說，佃農在

“福建和浙江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間；其次是江蘇，遼寧和湖北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間，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龍江等省區……這是表現因封建剝削關係而土地集中嗎？抑或因資本主義關係而土地集中呢？問題亦是不待辯而自明的”。（原書二〇四頁）

接着他又拿廣東與江蘇佃農數目的增加證明：

“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愈發達。反之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與資本主義相依為命”。（原書二〇五頁，著者加圈——夢雲）這就是任曙君對於中國土地問題的全部“理論”！

從上面任君自己所引用的表看來，這些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裏。但是誰是地主階級呢？任君除了肯定這一地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以外，似乎沒有什麼具體的說明。

我為得要說明這一問題，不能不從最近在新生命社出版的嚴靈峯先生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上，找到一些說明。雖是在這一部書內嚴先生大發雷霆，大罵任君為“偵探員”，為“機會主義者”，然而任君與嚴先生的基本觀點，實際上並無兩致。（很抱歉，我的文章做到這裏，才拜讀了“有



特殊見解的”嚴先生的大作。“別開生命的動力雜誌”，我雖也見過一兩次，但總沒有拜讀過裏面諸位先生的大作)。

嚴先生對於中國今日的地主階級這樣的寫道：

“中國今日的地主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於農民直接供給他們一切必需的消費品，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給地主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流行而時髦的商品——生產物或貨幣——至於這種地租，由地主看來，是他的耗費購買土地的資本上應有的利息；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力所創造的一部份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

嚴先生更接着說：

“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商品侵入農村更急劇地促使廣大的農民破產，農民破產的給果脫離土地，農村生產更趨衰落，於是乎使舊時靠着農民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領主，貴族，官僚，也因此站腳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經濟侵掠而結果之貧困的農民，要出賣自己的田地，即舊式的貴族宗室也要將自己的土地整批出賣的。其次，城市的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已開始

發展，但大部分還是操在帝國主義手中，民族工業以資本積累的薄弱，不能與帝國主義工業對抗，於是擁有一小數貨幣的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者，便趁土地上投資輕，本利厚的機會，出買其土地來了。這是新式地主發生的重要原因”。（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〇五——一〇六頁）

如若把嚴君的主要意見總括起來，那就是說，中國舊式的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經同他們的農民一起破產了。現在的地主是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同城市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

雖是嚴君在有些地方表現了罵人的特別才能，然而在骨子裏，嚴君同任君同樣的對於初步的政治經濟學沒有絲毫的了解。

任君難道會忘記，遠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商業資本已經得到不小的發展。遠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商品經濟已經使某一部分地主破產，而出賣他們的土地，某一部分商人，高利貸者，或是官僚，因為貨幣的積累而購買了土地。或者因為某一部分地主，因為同時經營商業，經營高利

賃，而更擴大他們的土地。在那時，難道這些地主已經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

我想我們研究中國的地主階級，不是在研究他們的出身，而是研究他們怎樣剝削中國的農民，祇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判斷中國的地主還是資本主義化的，還是封建的。不然，你研究一輩子，還是研究不出一個結果來。因為誰也沒有法子專研究中國每一個地主的家世，考究他們的出身呵！

但是中國的地主，究竟怎樣剝削他們的農民呢？是否像嚴君所說的，同城市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的呢？當然不是的！

集中到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實際上並不由地主拿來利用新式的機器，雇用勞動者來耕種，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租佃給無地與地少的農民。所以在中國農村裏，土地的所有權雖是集中到地主階級的手裏，但是土地的使用權却是分散給千百萬農民的。這難道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所做的勾當？難道這同過去封建時代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利用新式生產技術，雇用工資勞動者經營自己的土地：這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的唯一記號。然而

正是這種記號是中國地主所沒有的，這也說明，爲什麼任君嚴君等不能不從地主的出身去證明他們的“理論”的緣故！

至於這些耕種地主土地的農民，每年要把田地上所生產出來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奉獻給地主。如若屆時不能交納時，地主就能用武力強迫佃戶交納。這種不用任何工資的代價做掩庇欺騙的公開露骨的剝削形式，請問同封建時代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形式，有什麼區別？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第一，必須在法律上是“自由的”；第二，必須對於一切生產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說，他必須沒有任何生產工具；第三，資本家付給他的工資是拿恢復他的勞動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但是中國佃農呢？第一，在法律沒有任何“自由”，就是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們自己還有一些原始的生產工具，他們就拿這類原始的生產工具耕種他們的土地。第三，他們把田租交納出去之後所剩下的經常的不夠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經常的利用高利貸度日。換句話說，田租不但取去了他們的一切剩餘生產品，而且也取去了他們工資的一部分。難道我們能稱這類的農民爲工人嗎？

至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地主的一部分政治的特

權為貨幣的權力所代替，使農民的田租，一部分（祇是一部分）從自然品的轉為貨幣的，但是這對於剝削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中國的商人，資本家，高利貸者，軍閥，官僚，所以要購買或掠奪（掠奪的形式，現在還是很普遍）土地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實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正是為了實行封建式的剝削。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投資到土地中間，同投資到工業中一樣，為的是要取得平均利潤。在中國農村中間，這種平均利潤是沒有的。可惜關於這種政治經濟學上的專門名詞，任君嚴君完全不懂，所以也祇馬馬虎虎說些什麼“由地主看來”，“由農民看來”是“資本上應有的利息”，是“他自己的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剩餘生產物”這些似通非通的話。所以同這類人辯論，有時恐覺得有些對牛調琴的不快的感覺。

然而不必要怎樣豐富的科學知識，就是普通的一個稍有頭腦的人，也會明白，中國民族資本家不能在工業方面立足以至把資本拿來購買土地，收租過活，一定是因為在鄉村中間他可以更利害的剝削農民。他現在不必像工業資本家那樣，要天天提心吊膽的去經營，他現在只要安安靜靜的坐

着吃就行了。當然土匪來的時候，農民起來搗亂的時候，他還是不能不用一些心思專同土匪與暴徒做鬥爭！他還是要設法組織團防與民團，來保護他自己，以繼續他對於農民的剝削。當然這不是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化”，而是資本家的封建地主化！

對於農民的剝削除了地主之外，還有商人與高利貸者。這些商人，他們利用農民的困難情形，廉價的收買農民的生產品，再轉賣給比較大的出口商或城市的商人。他們在這中間所賺的錢，同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資本家所分得的一部分利潤帶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他並不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業資本家那樣，因為他代替工業資本家，把商品從工廠傳達給消費者而分得利潤的一部分，而是由買價與賣價的相差中來的。這種商人，在封建社會中是常有的。至於利重至於每月二分以至十分的高利貸，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借貸資本完全不相同，那更不用多說了。

在中國農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時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真是無孔不入。農民今年如若交不出田租，那就當做農民對於地主的借款，拿高利貸的利息來計算。農民要出賣穀子或棉花時，



他在鄉村中所能碰到的主顧又是地主，又不能不廉價的出賣給他。不論在那一方面農民都受損失。這種各方面的剝削，當然使農民祇有破產，或者變為地主的奴隸，或者流為乞丐，土匪，以至凍死與餓死。

但是我們這種意見，當然是嚴君所反對的。嚴君說：

“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的性質，而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為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這種商業利潤，只是從工業部分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買辦形式專門為帝國主義即直接屬於外國資本家的買辦或本國工業資本家，由生產部門中抽取一部分資本向農村購買材料；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已失去自力的‘獨立’和‘優勢’了”。（同書，一二九——一三〇頁）

嚴先生真是善於創作似是而非的文章的大匠！他的整本大著就是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的傑作！我們同他爭論，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怎樣剝削農民，他就會同你講許多

“城市的大商店”，許多變成工業資本家的商人；以及什麼“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等等牛頭不對馬嘴的話。然而他究竟怎樣證明中國商業資本是資本主義統治時代的商業資本呢？他說，一方面因為“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性質”，都是為“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另一方面又因為“取買辦形式專門為帝國主義……向農村購買材料”，所以它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只是從工業部門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

實際上，這樣曲曲折折的“絕妙好詞”，無非說，中國商業資本帶有給帝國主義和民族工業做出賣工業品與購買材料的買辦性質，所以它的利潤不是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的，而只是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部分。

我現在要問一下嚴君與讀者，為什麼商業資本而一帶有買辦性質，就立刻會從封建時代的變為資本主義時代的商業資本呢？

這除了證明嚴君這一段議論，是在給中國的商業資本家或買辦階級做辯護士以外，不能證明任何論點！

研究中國商業資本的性質，主要的不在問它給什麼人做買辦，給帝國主義者或是民族資本家，而是問它怎樣做買辦。如若嚴君少做些罵人的“鬥爭”，而肯虛心地專一研究這一問題，那對於嚴君關於中國經濟的了解一定有絕大的幫助，因為這問題的解答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國商業資本的性質，而且也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如何剝削中國的農民羣衆！

同帝國主義有直接關係與間接關係的買辦，以及一切在中國鄉村中間來來往往的商人高利貸者，他們利用他們的貨幣，利用同國內國外市場不能直接發生關係的農民的困難與他們對於他們生產品市價的無知，尤其是他們對於貨幣的急迫需要，用壟斷，欺騙以及強迫的方法，廉價購買農民的生產品，這是人所共知的普通現象。我想這除了給中國買辦做辯護士的嚴君外，誰也不能否認的。譬如在我手頭所有的僅少的普通的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書上，也可以找到不少這類普遍事實的敘述。

“中國農家常以經濟困難，又無合作的習慣和組織，遇着急需款項或物品的時候，往往賤售農產品或預售農產品或舉行賒欠，買賣均受莫大的損失。……分析研究，居間的商人固是一個剝削的拿手，而交通不便，

運輸困難，苛捐……也是同樣的損害農家。閱者如不相信，可以事實證明，下表便是烏江農家出售棉花的損益：

烏江農家出售棉花每包損益的比較		
售價	改良棉花	普通棉花
在本地出售	三二,〇〇元	三〇,〇〇元
售與無錫紗廠	四二,〇〇元	三八,〇〇元
打包,運輸,保險 入棧等費	三,一六元	三,一六元
實收利益	三八,八四元	三四,八四元
由合作社代售 所得的利益	六,八四元	四,八四元

“觀察上表，可見由合作社代售的價格比較農家在本地出售價格，改良棉花每包可多得六，八四元，普通棉花每包也可多得四，八四元，……然此種售價，據報告所說，還是價格低廉，運輸困難時的標準，若在平常年份所得可以更多。由此足以證明農家所受的損失一定不小了。這種損失，必為居間人所剝削無疑”。（見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古棣編著，二〇四頁）

同書作者，更引用了民十八年十月立法院統計處在各

鄉村調查的“上等粳米在鄉村和市鎮出售價格的比較”。表很長，我現在只摘取其中最能表示出這一相差的幾處吧。

地方	鄉村的價格	隣近市價格	百分比
江蘇省句容縣土橋村	一三,〇元	一四,〇元	九二,八
全,揚中縣,三圩埭	一四,〇元	一五,五	九〇,三
安徽省宿松縣	九,八元	十四,五元	六七,五
全,秋浦縣占村	八,〇元	九,〇	八八,八
湖南省臨湘縣涇港	一〇,〇	十二,〇	八三,三
浙江,義烏,東郭聯合	一〇,〇	十二,〇	八三,三

……………(見全書,二〇五——二〇九頁)

但是這些統計還祇是一些市鎮價格與鄉村市價的比較,實際上商人高利貸者對於農民的剝削,還不止此。

我現在想從我手頭所有的一本關於東三省金融的書上,找一些普遍的例子,給嚴君與本文的讀者看看。當然,在嚴君等看來,東三省是全中國最富庶,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省區吧。

侯樹彤先生在他的東三省金融概論上講到錢莊與農民的關係時寫道:

“錢莊之貸款營業,恆限於接濟城市商民。中小各

錢莊，間亦有貸資於農人者，惟另以一種‘批糧’辦法行之。每年舊歷六七月頃，年景豐歉，大體分明，而時正青黃不接，農民需款孔亟。錢莊於此，常以現資接濟農人，預約俟秋成後，以糧豆抵償。實際本為一種貸款，而形式則為購買期糧。凡糧豆之價格，及交代之日期，皆預先議訂。其期限愈長者，糧價愈小。其期限愈短者，糧價愈昂。蓋此種‘現錢期貨’交易，糧價以內，須扣除貸款利息。故期限愈遠，所扣之利息愈多，糧價亦從而愈低賤也。此種貸款辦法，在錢莊名曰“批糧”，在農人名曰“賣青”，風行吉黑兩省，可謂農村金融中最主要之制度。錢莊而外，糧棧，燒鍋，當舖及雜貨商為之者，尤夥。所獲盈利，以月息計之，率在十分左右。就哈爾濱附近言，十七年舊歷七月一日批糧，每車（中東路貨車容糧七十石）大豆，平均行市約值哈大洋一千三百元，比至十月一日，新糧上市時候，最高行市曾至一千七百五十元。是以一千三百元本金，於三月期內，竟獲利四百五十元。約略言之，合月利十一分五厘強，可謂駭人聽聞。然此猶非極端之例證也。瀋海路沿線，東豐西安各地帶（俗呼東山裏），十七年舊歷七月一日批糧行市，大豆賣



青，平均每斗價奉小洋二十二元。迨十一月一日新豆上市時，市價便為每斗四十七元。計四閱月間，可獲純利，已超過母金，約合月利三十分弱。農人所受之剝削，可想見矣”。（東三省金融概論，一九四——一九五頁，夢雲加圈）

中國的錢莊，糧棧，燒鍋，當舖以及雜貨商等等當然是中國鄉村中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標本代表者，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是否像嚴君所說的，“只是從工業部分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我想除了嚴君以及他的朋友之外，稍為了解一點中國實際情形的人，都不會這樣說的。

帝國主義者在通都大邑，就經過那些大買辦取得高度的利潤，而這些大買辦又直接間接的經過這些統治鄉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不論是三位一體，或二位一體，以至一位一體）來剝削中國的農民，譬如帝國主義者要把中國的大豆，運往外洋，帝國主義者，就把資本給中國的大買辦，而大買辦就經過這些居間人，到鄉村中去賤價收買。結果得到高度利潤的，不但是帝國主義者，而且也是中國的買辦，以至一切這些居間分子。帝國主義者，不必要想種種方法，

把資本投到中國土地中間，改良生產，以取得廉價的生產品。他們經過這一剝削的系統，就能夠在中國取得廉價的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實際上，帝國主義除了利用買辦，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以間接剝削中國的農民羣衆外，它還親自出馬，對於中國的農民實行高利貸的，封建地主的，以及奴隸式的剝削。最明顯的例子，是東洋拓植株式會社在滿洲所做的營業。這一組織在東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種種特權，用高利貸放款給貧苦的農民，強迫農民給它做苦工（實際上這與封建時代的徭役無異），使農民不能自由行動，把農民變為它的奴隸。

這當然不是帝國主義對於我們大中華民國，特別的賜與，這在非洲，在南美洲，以及亞洲的印度，南洋羣島等許多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上，差不多是很普遍的現象。南洋羣島荷蘭資本家對於中國的“豬仔”的剝削，難道是資本家對“自由”的工人剝削，這是奴隸主對於奴隸的剝削！

所以，在我們看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經過買辦（或是不經過），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中國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同這些鄉村中的封建勢力結成同盟，擁護他們的統治，同他們共同宰割中國的民衆，實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對於嚴